Wang Guowei

Ershi Shiji Wenhua Mingren yu Shanghai

王国维

悲情学人

陈同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扫码免费领取资料



房中术(www.zuihaoziyuan.com)专注于男性增大增粗增长、阳痿、早泄、壮阳、延时、强肾、回春、健身。女性缩阴、丰胸、减肥、化妆、瑜伽、保养、产后修复、盆底肌锻炼。两性健康,夫妻按摩,房中术,性姿势,性技巧,性知识等

更多免费教程：英语学习，技能提升，PS 教学，投资赚钱，音乐教程，口才教学，情商提升，风水教学，心理学，摄影知识，幼儿学习，书法学习，记忆力提升等等......

扫码加微信lax988988领取资料



==

全站课程下载

课程不断增加

本站现资源容量已超 10T

入群联系 QQ：167520299 或添加微信：1131084518（备注PDF）

阳痿早泄训练
皇室洗髓功视频教学
女人驻颜术
泡妞约炮万元课程
足疗养 SPA 教材
玉蛋功
马氏回春功
房中术张丰川
哲龙全套视频
增大盼你增大
国际男优训练
亚当德永早泄训练
洗髓功真人内部
皇室养生绝学道家洗髓功
【铁牛人会员课】男人必备技能，理论讲解
实战高清视频
随意控制射精锻炼 视频+图片+文字
价值 1440 元第一性学名著<素女经房中养生
宝典视频>12 部
洗髓功修炼方法视频教学
陈见玉蛋功视频教学 女性缩阴锻炼
男性自然增大增长指南
强性健肾保健操 1-4
道家强肾系统锻炼功法
马氏回春功
12 堂课，全面掌握男性健康问题 让你重燃自信
联系微信：1131084518

1、东方性经
2、印度 17 式
3、口交技巧 3 部
4、港台性姿势 3 部
5、365 性姿势 6 部
6、泰国性爱密经 17 式
7、花花公子性技巧 6 部
8、阁楼艳星性技巧 7 部
9、古今鸳鸯秘谱全集 7 部
10、夫妻爱侣情趣瑜伽 2 部
11、古代宫廷性保健系列 14 部
12、汉唐宋元明清春宫图真人
13. 柔软性爱宝典 日本 9800 课
14. 李熙墨 3999 全套课
15. 妖精性爱课 2888
16. 李银河全套性课
17. 领统统性课
18. 德勇男性篇
19. 德勇男性篇
20. 缓慢性爱
21. 亚当多体位搭配篇
22. 亚当多体位结合篇
23. 德勇克服早泄讲座练习
24. 德勇以女性为中心得爱抚
25. 加藤鹰接吻爱抚舌技
26. 加藤鹰指技
27. 加藤鹰四十八手入门
28. 佐藤潮吹教学
29. 佐藤男人体能锻炼+保健品介绍
30. 佐藤男人早泄对抗训练
31. 阿拉伯延时训练
32. 田渊正浩秘籍
33. 异性性快感集中训练教学
34. 自我愉悦锻炼密宗
35. 铁牛全套延时训练课
36. Pc 机锻炼真人视频教学
37. 印度性经全集 8 部
38. 21 世纪性爱指南
39. 香蕉大叔男女训练馆全套
40. 中美真人性治疗教学+理论
41. 女性闺房秘术
42. 幸福玛利亚性课
43. 陈见如何释放性魅力征服
44. 性爱技巧讲座全套
45. 性爱秘籍全套
46. 性爱误区讲座
47. 性病讲解大全
48. 性博士讲座合集
49. 性健康和性高潮合集
50. 性教育讲座合集
51. 性能力课堂合集
52. 性生活问题解析合集
53. 意外怀孕和避孕处理课堂
54. 性感地带探索
55. 性技巧讲座
56. 性健康与性卫生讲座
57. 性生活专家答疑
58. 性心理与性道德合集
59. 性爱宝典合集
60. 性爱技巧合集
61. 完美性爱演示
62. 完美性爱技术讲解
更多精品等你来解锁哦............

Ershi Shiji Wenhua Mingren yu Shanghai

二十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

WANG GUOWEI

王国维

悲情学人

陈同 著

方全林 主编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国维：悲情学人 / 陈同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20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 / 方全林主编）
ISBN 7-5320-6677-0

Ⅰ.王...　Ⅱ.陈...　Ⅲ.王国维-生平事迹
Ⅳ.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11260号

20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

王国维：悲情学人

方全林　主编

陈　同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政编码：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75　插页 6　字数 119,000

2000年5月第1版　200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100 本

ISBN 7-5320-6677-0/G·6832　定价(软精)：14.80元



清华园里的王国维



王国维（右一）、邹适庐、姬觉弥合影



王国维（左）与罗振玉



王国维海宁盐官镇故居

序

方全林

20世纪这一百年，在中国，实际上都可看作是一种文化转型期。这是一个文化上承先启后的时代。新旧共存、争斗、交替，中西碰撞、排斥、融汇，使文化呈现出十分复杂的面目。现在，20世纪只剩下最后一年了。在21世纪的门槛前，回首一番20世纪的文化历程，应该是很有意义的。21世纪的文化建设，无疑有必要从20世纪的文化历程中吸取经验，也吸取教训。而上海，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在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不但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由于有了上海这样一座城市，20世纪中国文化的流变便有了不同。上海与20世纪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课题。对这一课题的探讨，当然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而“20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对于观察和思考这一问题，应该是一种十分富有意味的视角。

由于"江海通津"的地理位置,由于上海经济的繁荣和文化市场的发达,也由于旧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格局,使上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全国的文化人聚集之地。中国进步新文化的先驱和奠基者鲁迅、郭沫若、茅盾,中国革命音乐的开拓者聂耳、冼星海,中国现代出版事业中商务印书馆的创业者张元济,中国进步新闻工作者的杰出代表邹韬奋,中国电影的最早现实主义表演艺术家赵丹,中国现代京剧开宗立派的大师周信芳,中国现代美术巨匠刘海粟——都在上海留下了自己深深的文化足迹。在20世纪上半叶的数十年间,上海为各种文化人提供了其他城市所没有的生存条件,也为从事各种文化事业提供了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环境。在20世纪前期的几个历史阶段,都出现过文化人从全国各地向上海汇集的现象。五四新文化运动,揭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由此起步。这一运动初起时虽然以北京为中心,但由于北洋军阀的箝禁与镇压,再加上其他一些历史因素,不久以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便开始向上海转移。与此同时,各方面的文化人也纷纷奔赴上海,把上海作为从事文化活动的场所。1927年,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中国社会的政治情势发生剧变,而上海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又成为各类文化人求生存和求发展的最佳之地。从1927年到1937年的整整十年间,在中国,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那样活跃着那么多的作家、艺术家和其他的各种文化工作者。数量众多的各种文化人常年集中在上海并积极开

展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遂使这一时期的上海文化呈一时之盛。“卢沟桥事变”后,文化人汇聚上海又掀起一次高潮,那一时期,上海的抗战文化活动声势十分浩大。上海抗战时期的“孤岛”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爱国主义、不屈强暴的一种象征,成为海内外关注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

由于上海在这几个时期都成为各种文化人从事活动的舞台,就使得许许多多的文化人都与上海发生过深浅不一的关系。在20世纪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留下辉煌业绩的文化名人,多数都在上海这个城市留下了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脚印,多数都与上海有着或长或短的因缘。上海之所以能在很长时期内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之所以能在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几代全国最优秀的文化人士都曾经生活在上海,并在这里从事文化创造活动密切相关。这些文化名人与上海之间,实际上是一种相互创造同时也相互制约的关系,上海为他们提供了生存和从事文化创造活动的场所和条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生存和从事文化创造活动的方式,而他们每个人的存在和文化创造活动,又直接构成上海文化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和文化创造活动,在总体上营造了上海的文化氛围,左右着上海的精神面貌。这是一种双向同构、相辅相成的关系。以鲁迅为例,鲁迅是20世纪的文化巨人,他对中国现代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和所作出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而鲁迅从1927年定居上海到

1936年辞世,都一直生活、劳作和战斗在这座城市。鲁迅文化生涯中的一半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的九年间,鲁迅不但写下了大量的文字,还办刊物、出丛书,介绍外国文学和美术。在这九年里,鲁迅与上海之间决不仅仅只有一种外在的关系。上海特定的社会政治格局和文化气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鲁迅文化活动的方向和方式。最后九年的鲁迅,关心什么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形成怎样的思想观念,等等,都与当时上海的政治和文化状况不无关系。另一方面,鲁迅的存在,也对上海当时的文化气候和文学状况产生着明显的影响。由于有了鲁迅,在那九年间,上海文化界,尤其上海文学界,多了一点正气而少了一点邪气;多了一些积极健康向上的东西,少了一些消极病态恶浊的东西。曾经有人指出,由于有了鲁迅的存在,当时上海的某些文人生活上都要检点些,惟恐丑行劣迹遭到鲁迅的嘲讽、斥责。于此也可见,鲁迅与上海文化之间,实在有着很内在的关系。

说到上海当年的文化地位,说到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与上海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提到上海当年所具有的那种文化精神,那种文化襟怀。文化上巨大的包容性,是这座城市能为中国现代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重要原因。数十年间,许多在其他地方不能存在的思想观念可以在上海存在;许多在别的城市被排斥的文化潮流、艺术风格,可以在上海显露峥嵘;许多在其他环境里不可能办成的文化事业,可以在上海办成;许多在别的地域无法生存的文化人士,

可以在上海立足、发展……正因为上海具有这种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雅量，才使得怀有不同文化理想和艺术趣味的文化人士都能在上海找到自己的位置。

一个地域有一个地域的文化精神。上海这块地域则是在进入20世纪后才开始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精神的。上海文化精神的形成，与众多的在这里生活和创造过的文化名人有密切的关系。每一个在这里生活和创造过的文化名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上海文化精神的形成产生过影响，而上海的文化精神又反过来影响着在这里生活和创造的各种文化人——上海特有的文化精神不只是使得这些文化名人能够在这里生活和创造，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他们怎样在这里生活和创造。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文化名人与上海之间是一种相互创造的关系。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强调："必须有某种精神气候，某种才干才能发展；否则就流产。因此，气候改变，才干的种类也随之而变；倘若气候变成相反，才干的种类也变成相反。精神气候仿佛在各种才干中作着'选择'，只允许某几类才干发展而多多少少排斥别的。由于这个作用，你们才看到某些时代某些国家的艺术宗派，忽而发展理想的精神，忽而发展写实的精神，有时以素描为主，有时以色彩为主。时代的趋向始终占着统治地位。企图向别的方面发展的才干会发觉此路不通；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辙。"丹纳在

这里说的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的精神气候对艺术创作的左右,这种看法也同样适合于总体的文化创造。上海这座城市曾经具有的精神气候,对栖身于此的文化名人的文化创造活动无疑起着制约作用。由于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中的大多数,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上海这座城市精神气候的制约,研究这些文化名人与上海之间的关系,也就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20世纪中国文化的面目。事实上,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过程,而不断曲折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海曾出现过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出现过各种思潮,各种力量,最后历史选择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样一条道路。研究上海与文化名人的关系,有助于文化人、青年人进一步看清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必由之路,对塑造新一代文化人的健全人格,选择正确的人生方向,起着积极的影响,因为贯穿文化名人与上海关系中的主流因素,是知识分子与党与人民与祖国在一起,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品格。同时对于上海未来的文化建设也自能提供有益的启示,比如我们能从邹韬奋的新闻生涯中总结出进步新闻工作的规律;从张元济办出版社的过程中,抽象出出版如何保持高品位,保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从周信芳舞台活动中,领悟出民族文化的保存、发展的若干做法。回眸既往世纪的文化历程,正是着眼于未来世纪上海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可以少走弯路;同时,能激发上海市民、文化人对上海的自豪和热爱,激励和增强建设上

海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自信心，更好地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跨世纪的历史使命。

20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之间的关系，虽然在一些基本的方面，具有一致性，但在每一个人那里，情形又都不尽相同。只有对每个人与上海之间的关系进行专题性的微观研究，才能在总体上对这些文化名人与上海的关系有全面、准确和深入的把握。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我们决定组织力量，撰写出版一套“20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丛书。

1998年12月

目　录

序 …………………………………………………………… 方全林

第一章　从家世说起……………………………………（ 1 ）
第二章　初到上海………………………………………（ 16 ）
第三章　崭露头角………………………………………（ 33 ）
第四章　《人间词话》与《宋元戏曲史》……………………（ 57 ）
第五章　东渡扶桑………………………………………（ 77 ）
第六章　重归沪上………………………………………（ 97 ）
第七章　甲骨学上的新贡献……………………………（125）
第八章　南书房行走……………………………………（139）
第九章　享誉清华园……………………………………（155）
第十章　诀别人间………………………………………（175）

［附］　王国维生平简表…………………………………（197）

第一章

从家世说起

浙江省海宁县位于钱塘江口，杭州湾北岸。气势磅礴的钱塘江海潮在此撼天动地，汹涌澎湃。千百年的地理变迁使海宁县城（今海宁盐官镇）东南一段海塘，成为近代闻名中外的观潮胜地。海宁地理环境优越，河道畅通，近代以来，这里的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均较发达。悠长的历史，也为海宁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潮起潮落，几换人间事”。近三百年来，钱塘江潮水哺育了海宁几代风流人物，在王国维之前就已涌现了像陈世琯、张廷济、蒋光煦、李善兰等著名学者。其中特别要提及的是陈世琯，他出自海宁盐官陈氏家族，这个家族在明清时期享有盛名，仅在清代三百年间就先后出举人 103 人，进士 32 人。所著书籍的数量也十分惊人，在家族第 6 世到第 10 世，以及第 14 世到第 19 世的著述辑录中所收著作约 1000 种，其中碑

刻还不算在内。[1] 海宁的这种文化背景对于生长在这里的王国维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

1877年12月3日，光绪三年，农历丁丑十月二十九日辰时，一代文史大师王国维就诞生在这涛声阵阵的钱塘江畔——海宁盐官镇双仁巷。

王国维，初名国桢，后改名国维，字静安，一作静庵，号礼堂，又号观堂、永观。王国维的先祖并非世代居住在海宁，而是从河南省开封府迁徙到江南的。据说其远祖珪被称为光祖。光祖的后代禀，北宋时任太原府副都总管。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金军进攻北宋，禀为抗击金兵坚守太原。此年冬，金军大举进犯中原，宋都东京（今开封）被攻破。禀在太原守城战中恪尽职守，英勇无畏，最后随太原城陷殉难。靖康之变后，禀被追谥忠壮公，赠赐安化郡王爵衔。此时王家四代都以显赫武功闻名朝野，而且三代中都有为国捐躯者，他们的事迹在史书中也有记载。直至禀的孙子沆随宋高宗渡江南下，并被赐封为盐官，才在海宁定居下来，这是王家迁至海宁的第一代。此后的800年，他的子孙没有再迁徙他处，成为土生土长的海宁人。沆的儿子恕，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登进士。恕的孙子辉，

---

① 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第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陈氏著作辑录见《海宁渤海陈氏著录》、《海宁渤海陈氏著录续编》。

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登进士。辉以下世系不详。与远祖的境遇相比,王家后来的境况显然是差得很远。王国维的曾祖父、祖父及父亲都是读书人,但都没能中举,社会地位颇为低下,其祖父还兼乡间行医的职业。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连年战伐,社会动荡。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当时只有13岁,便中止读书跟着自己的祖父和伯伯离开家乡到上海谋生。不幸的是,没过多久其祖父和伯伯相继死去,年少的王乃誉只能靠做学徒维持生活,在茶漆铺里学习经商。以后王乃誉随店铺的搬迁,从上海又回到了海宁硖石镇。出生于读书世家的王乃誉深受家庭的影响,尽管为维持生计放弃了举业,但是仍不忘读书学习。在经商之余,王乃誉继续专心于书本知识,研习书画篆刻、诗词古文。因此他不仅旧学基础很好,勤于作诗,而且擅长金石书画。他书法先学褚遂良、米芾的字体,中年以后专学董其昌,一些学人看了他的字,都认为王乃誉颇得董其昌书法的神韵。他的画也很受当地人们的赞赏。王乃誉留下许多文字,虽然不能和儿子王国维的成就相比,但他所著的《游目录》10卷,《娱庐诗集》2卷,还有留下的《日记》30余册,都充分说明他是一个颇有文化素养的人。正是由于这种素养,才在家庭中营造出了浓厚的文化氛围,这影响着王国维未来发展的方向。其间,有亲戚在江苏溧阳任县令,请王乃誉帮助出谋划策,于是他开始了十多年的幕僚生涯。

王国维的母亲姓凌,是同地区三里桥乡绅凌岫云的女儿,排行第六。凌氏生一女一子,长女叫蕴玉,子即王国维,他们之间相差5岁。姐弟俩与母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长。1880年10月17日,凌氏抛开了终日游宦在外的丈夫,丢下了年幼的一双儿女,带着病痛撒手人寰。这一年王国维只有4岁,他的姐姐也才9岁。母亲病逝后,父亲王乃誉仍在溧阳任幕僚,不能经常在家照顾抚养年幼的儿女,只得将王国维姐弟俩托付给其姑母和婶母,让她们帮助照管。于是这对孤苦伶仃的小姐弟就依赖着祖姑母和叔祖母的爱抚长大。钱塘江潮的涛声依旧,而王国维却再也得不到母亲的关爱。少小失去母爱,又不能与父亲朝夕相处,成长中的王国维一时难以得到一个正常家庭的温暖。生母逝世5年后,父亲王乃誉时年38岁,又续娶同邑叶砚耕的女儿为妻。家庭的变迁,给王国维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痕。“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若干年之后写下的诗句,浸染着他幼时的孤寂和哀愁。虽然在父亲再婚两年后的1887年5月,家中又增添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国华,但那年王国维已11岁,两兄弟年岁相差太多,彼此之间很难沟通。在王国华的印象中,其兄是一个“寡言笑”的人。幼年时的家庭环境不仅使他成年以后仍囿于孤僻之中,不善于同别人交往;而且,对他终生的悲观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

1883年,王国维7岁了,按照传统教育常规,该是男孩启蒙之

时。他父亲自然很重视这一点，便将王国维送到邻近的私塾教师潘绶昌处接受中国传统启蒙教育。在当时中国近代新式学堂还未广泛兴起的时候，私塾是乡间学童唯一就学的地方。王国维在那里开始了中国旧学的第一课，接触到了四书五经，他“生而歧嶷，读书通敏”，沉静的性格使他较其他学童更沉稳地专心听讲和阅读，所以他的领会能力和接受程度都是其他学童所不及的。放学以后，他仍然会找出家中的藏书来阅读，不过这时的阅读就完全随自己的兴趣，而不必受约束了。他曾在《自序》中说：“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其儿时所不喜外，其余的书，晚自塾归，每加泛览。”[①] 由此可见，王国维少年时的好学与勤奋求知。

王国维 11 岁那年，祖父去世，父亲王乃誉从溧阳回海宁奔丧，看到儿子已从幼童长成少年，便决定从此不再出远门，把主要精力倾注在儿子身上，以弥补他和儿子多年分离的损失。从此，父亲每天在家中教王国维读书，家中的许多藏书成了父亲给儿子讲授的教材。王国维每天自私塾回家后，父亲便利用晚上教他骈文、散文及古今诗词。父教子习，每每至深夜不辍，这不仅给少年王国维带来了父爱的温馨，也寄托了王乃誉望子成才的殷切期望。在父亲的悉心指教下，没有多久，王国维“诗文时艺，皆能成诵”。尤其是

① 《自序》(一)，《王国维文集》第 3 辑第 470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年版。

王乃誉对金石书画的爱好和擅长，使王国维深受熏陶，他日后精于书画鉴赏决不是偶然的。王国维渐渐长大，父亲的教育也愈来愈严格，其原因也是很容易了然的，一方面因为王国维是王家的长子，另一方面父亲王乃誉由于自己没能在科举之路上获取功名，便更强烈地希望在儿子身上实现自己未能如愿的梦想。儿子是他的希望，是他的安慰，他把作为父亲的一片苦心点点滴滴融入对儿子每天每时的教诲之中。从王乃誉的日记中可见儿子王国维的生活几乎成了他记事的主要内容。如每天父亲"改静儿字"、"为静(安)指示作字之法"、"为静儿书扇"等内容都一一记载在为父的日记中。父亲对王国维的教育和指导从不懈怠。王国维 15 岁那年的大年初一，王乃誉也没有因为过年而放松对儿子学习的督促，仍要王国维拿出前一阶段所写的作文，予以查看。当叶氏的父亲来王家作客，王乃誉恳请颇有书法功力的岳父叶砚耕留下多住些日子，以便指点王国维练习书法。王国维 18 岁成人时，王乃誉仍如此要求王国维。他看到儿子诗词作得草率马虎，就反复告诫儿子；当儿子没有马上按父亲的要求去做时，王乃誉便心急如焚，在日记中用"可恨"一词来表达他那种"恨铁不成钢"的心境。

在强调学习的同时，王乃誉还特别重视对儿子进行为人处世的教育。也许王乃誉已经看到儿子性格方面的不足，为此，在多少个夜晚，王乃誉"为静(儿)话为人处世之方"。尽管此时父亲苦口婆心所阐述的处世之方，王国维将来未必照其而行，但却反映了父

亲在王国维的成长道路上所付出的努力。

王国维在私塾读书4年之后，改从同乡的庠生陈寿田学习。陈寿田可不是一个只懂"之乎者也"的先生，他既是秀才，又是近代著名科学家李善兰在任同文馆天文算学教习时的学生。实际上，王国维在此前已开始跟从陈寿田学习古文和学习怎样作诗了。陈寿田就学的同文馆建于1862年，直接附属于总理衙门，是清政府为培养翻译人员而设立的最早的洋务学堂。最初同文馆开设了英法俄文3个班，后又陆续增设了天文、算学及德文、日文诸班。同文馆不同于中国旧私塾学馆的是，它的课程范围广，并包括一些近代自然科学课目。课程有英文、法文、俄文、算学、天文物理、医学生理，还有外国公法、外国史地等。尤其是除汉文外，其他课程的教习大多是外国人。李善兰曾于1868年在同文馆任算学总教习，他的数学水平很高，"自谓精到之处，不让西人"。陈寿田在同文馆学习过，又是李善兰的学生，他接受的教育已是近代式的科学教育。在当时众多的乡间塾师中，他的知识结构要远胜过其他人。王国维在陈寿田那里学习了数年，这无疑对他将旧学与新学兼收并蓄有着重要的帮助。他后来到上海决意坚持学习外语，与这时受老师陈寿田的影响不无关系。

塾师可以选择，但是一个青年人在那个时代的前途，大多是无从选择的，科举之路几乎是唯一的道路。科举制是中国古代自隋朝废除"九品中正制"以后，各王朝以设科考试来选择官吏的制度。

它以分科取士而得名,在诸科中进士科为常设,最为重要。宋代以后科举均用经义,明清两代的科举则用八股文取士。作八股,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并规定文章格式须固定。在文章开头的破题、承题两部分之后,必须要有起讲、领题(入手)、提比(起股)、中比(中股)、后比(后股)、束比(束股)、落下等部分。文章中的提比、中比、后比、束比为正式议论部分,其各自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成八股,八股文因此而得名。文中的解释必须依照朱熹《四书集注》等书,因此八股文也称四书文。当时的王国维同样无法回避科举道路的选择,而且必须参加科举考试,用八股文敲开仕途的大门。由此一步步地由秀才、举人、进士一个阶梯一个阶梯而进。如果取得了殿试一甲的前三名,即为状元、榜眼、探花,这就是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在学业上获得的最高荣誉。但更重要的是随之而来的高官厚禄,那句古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全部含义正在这里。数百年来,多少读书人为达到这一目标皓首穷经,拥挤在科举这座独木桥上,人满为患,其中很多人耗去了一生的精力终未如愿,因而哀叹终生。

其实要踏上科举之路的第一个台阶也是不容易的。按照清代的考试制度,所有没通过生员(秀才)资格考试的士人,不管年龄大小都称为童生,因此其中常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一个童生要获得生员的资格需要经过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其中规定颇为复杂。县试一般安排在农历二月进行,由县官任考官,共设五场考

试,第一场考试称之为正考。临到考试这一天,童生拎着装有笔墨和食物的长耳考试篮进入考场,要完成两篇700字的四书文,一首五言六韵的试帖诗,限当日完成。通过者可免考余下几场直接参加府试。府试的时间多定在农历四月,考官为知府,设置两场考试,其类型与县试相仿,通过正场考试的就可应考院试。院试的主考官府初称学道,故院试又名道试,后称学院;主持者是朝廷派往各省的学政,自雍正之后多由翰林官充任,也称提督学院,院试因此得名。学政一般在考试年的农历八月派出,考试时间根据学政派往各省的路途远近而酌情确定。由于院试是获取生员资格的最后一轮考试,因此考场禁律比县试和府试更严。在正式考试以前,童生们需先预考经古一场,内容主要是解经、史论、诗赋、算术(同治年间新增),考生各认一门报考,通过者才可继续进行考试。院试的正式考试为正复两场,正场作二文一诗,复场作一文一诗。王国维正是为通过这种枯燥而烦琐的考试而埋头苦读了整整10年。1892年,王国维最终以第21名通过了生员的资格考试,中了秀才。他当时考的一篇八股文题目为“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此句出于《论语·先进第十一》篇。原文是:“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这题目是按照惯例出的,但却毫无意义。要学子们钻在书堆里去专门应付这样脱离实际的考试,既无补于现实,同时对他们的身心也是一种摧残。其实自明末以来人们对八股取士就多有抨击。清初康熙皇帝对此还有所举措,公元1663年(康熙二

年),康熙发布上谕说:“八股文章,实于政事无涉,惟于为国为民之策、论、表、判中出考题。”规定乡、会试停止考八股文,改用策、论、表、判。[①] 但是新办法没有实行多久就因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反对而被取消,随后康熙只得又颁发诏令,恢复旧制。于是八股取士的老办法又延续了近240年,直至1905年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还在考中秀才之前,王国维因经历了多次失败而感到莫大的压力。对此,父亲王乃誉不无怨言,他在一则日记中写道:静儿从杭州回来,知道他没能考取。原因在于他不能振作起来用功于平日,自以为什么都难不倒,结果数次临场失败,就垂头丧气了。王乃誉在这里所说的情况是年轻人很容易犯的通病,少年王国维也不例外,情绪不免有所起伏。但父亲说儿子平日不用功并不准确,关键的问题是这种束缚人的考试,枯燥乏味的经义无法激起王国维的兴趣。与应付考试相比,王国维对阅读历史书籍表现出了明显的热情。就在考中秀才这一年,他偶然在朋友处看到了《汉书》,十分喜欢,于是就用幼时所储存下来的钱买来了前后《汉书》、《史记》、《三国志》等书,倾心地阅读起来。十多年以后,他在一篇自述文章中提到了这段往事,把读这些书称为“平生读书之始”,话语中包含了他对科举考试的厌恶。当时,王国维在读书之余,经常与好友叶宜春、褚君嘉、陈守谦在一起纵论古今,校勘疑误,被乡里人称

①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二年。

为四才子,而四人中又推王国维为第一。他在少年时代已显露出自己的才华。

1893年,王国维就读于杭州崇文书院,又开始在科举之路上进行新的跋涉。从他的思想状况看,这并非他自己的选择,毫无疑问是子从父命。这时的王国维已登上了秀才之阶,下一个奋斗目标当然是举人了。1893年8月和1894年的2月,王国维先后两次赴考乡试。如果说在争取获得秀才资格的考试中他还是认真对待的话,那么他在这时的考试中已显得有些漫不经心。8月的考试,他虽然入闱,但未等考试终结,就中途放弃了。次年2月,王国维再次赴考。父亲在送走儿子的当天,于日记中写道:"不知此行于学于考有益有得否耳。"他惴惴不安地期望着儿子能有所收获。结果,王国维5月归来,带回的消息仍是名落孙山。也许是望子成龙心太切,也许是对王国维的心不在焉有所察觉,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父亲真的生气了。他指责儿子既不用功也不明事理:"此时极好机会,再不努力惜光阴以从事,后日何所望。于是时老大伤悲,犹小无学业,无功力,不振家声,不能顾家处事,胥在此偷闲好逸,自是之弊耳,可不戒哉!"① 在父亲的眼中,儿子的考试绝不是他一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振家声"、耀祖光宗的大事,因此绝不能

① 《王乃誉日记》,引自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第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马虎应付。正是为了这件大事,他无法顾及儿子的个人爱好及其志向。王国维对父亲的这种指责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已无法知道。然而此时的整个社会大环境在发生着巨变,身处这种环境中的人们,其思想观念都将随着这一巨变而有所变化,王国维是这样,他的父亲也不会例外。

还在王国维努力于科举考试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随着外来势力的日益侵入,整个国家每况愈下。一些青年学子已不再把自己的个人命运拴在科举这座独木桥上了,他们从兴洋务中走出,把个人的前途与国家和民族的存亡联系在一起。他们传播新知,主张通过设立议院,发展资本主义来增强国力,从而形成了一股资产阶级改良思潮。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者有不少来自于浙江,如绍兴的汤寿潜,乐清的陈虬,平阳的宋恕,他们刊行的书籍有《危言》、《治平通议》、《六斋卑议》等,书中主张向西方学习,改革八股取士制度,大力兴办新学校,学习西方新政新学,他们是甲午战争前主张向西方学习,力主变法的先进代表人物。这时的改良维新思潮正似一阵清风吹过了这个在科举考试中穷于应付的知识群体的心田,他们有的还在困顿,有的已经觉醒。可是稍后,中国又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震动,随后改革之风吹得越来越强劲,使得很多昨日还在为功名熬神的举子士人骤然间改变了人生道路。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坚持避战静守的方针,使清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持续8个月的战争中,虽然爱国将

士积极抗战,但却无法扭转败局。最后的战争结局是: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辽东半岛被日军控制,京畿地区受到直接的威胁。战争的败局迫使中国清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政府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这一条约中的割让台湾全岛以及辽东半岛给日本,支付巨额赔款二万万两等苛刻的条款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更让当时的国人们所不能接受的事实是,打败大清帝国的居然是历来被视之为区区小国的日本,这不能不使中国人在震惊之余,更感羞辱而痛楚万分。这一"巨祸"深深地刺痛了中国人的心,正像梁启超后来所说的:"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①] 这年5月,康有为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于松筠庵会议,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割地弃民的后果。指出抛弃台湾将失去民心,割地将招亡国大祸,力主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就此提出了他们全部的变法维新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尽管应试举人们的上书被都察院所拒绝,但却在全国广泛流传。这一事件的发生标志着此前的维新思潮已发展为一场政治运动。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终于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一时间,办学会、办报刊、评西书、倡新学,维新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它感染、启迪着国人,使他们争言时事,畅谈变法,谋求自

① 梁启超:《改革的起源》,见《戊戌政变记》附录一。

强。那些本来潜心于科举的人们也渐渐张目四顾,为种种新学和时论所吸引。

海宁与杭州离得很近,距维新运动舆论的中心——上海也不远,因此王国维尽管身居乡间,仍能感受到这股维新变法的热浪。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他知道了在传统的学问之外还有所谓新学,并开始接触新学,关注时论。他当时是《时务报》的热心读者。《时务报》于 1896 年 8 月 9 日创刊,每旬一期,由汪康年任总理,梁启超任主笔,麦孟华、许勤、欧榘甲等一些重要的维新派人士先后任撰述。刊物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宗旨,畅言启民智、伸民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其销售量成倍增加,初创时销量为 4000 份左右,半年后增至 7000 份,一年后达到 1.3 万份,最高记录为 1.7 万份,这是中国有报刊以来所没有过的。这种前所未有的热销景象一方面说明时代和民众需要这样的报纸,另一方面也说明,梁启超等主要撰稿人所写的切中时弊的激昂文字深深打动了读者,并在他们的心中引起了共鸣。随着变法舆论的广泛传播,"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人不知有新会梁氏者"。[①] 梁启超在这时期最重要的论著当属《变法通议》,它由《变法通议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等 20 多篇论文组成,陆续发表在《时务报》上,前后共连载了 43

① 汤志均:《戊戌变法史》第 177 页,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期。文中以进化论的观点，阐述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变化，推论人类社会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指出这是“古今之公理”。要求清政府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变法，免遭吞并或瓜分的命运。作者主张“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实行君主立宪制。”梁启超以及其他维新人士的言论对王国维这位热心读者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其中有关科举的论述一定是他感触最深的，因为他身受其害。正是在维新舆论的影响下，王国维在参加了他一生中第三次乡试之后，便最终放弃了科举考试。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作出的抉择似乎也得到了父亲的允许，否则严厉的父亲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这与形势的变化以及舆论的影响紧密地联系着。王乃誉的日记中就有他阅读王国维带回的《时务报》第一、第三册的记载，尽管他觉得，要变法谈何容易，这不是小民百姓所能做的事，需要“大人君子”来作决定。但他还是认为，《时务报》中“所陈通变议，颇洽时政，诚此时之要务”。①

1896 年 11 月，20 岁的王国维成亲了，他的妻子莫氏来自于春富庵镇的一个世代经商的家庭，这无疑是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然而成了家还要立业，那么王国维的事业又在哪里呢？当王国维放弃了科举考试以后，他期待着在事业上能开辟一番新的天地。

① 引自《王国维年谱长编》第 11 页。

第二章
初到上海

元旦节刚过，王国维辞别了亲朋好友，离开生活了22年的家乡，开始走上了事业的征途——去上海的《时务报》馆工作。第一次出远门，父亲王乃誉亲自陪伴，父子两人搭乘"王升记"客轮，从海宁硖石起航，次日上午抵达上海。这一天是1898年2月16日，农历戊戌年的正月二十六日。

初春的上海依旧阴冷，湿寒。然而1898年的上海已成为戊戌维新运动的宣传中心，这个孕育改良思想的温床，又是受近代西方文明影响最大的中国城市正期待着一场轰轰烈烈的世局嬗变，这一年对整个中国社会，对王国维个人都具有着时代、人生的特殊意义。

1898年冬，德国借口曹州教案强占了胶州湾，帝国主义纷纷仿效，占据势力范围。中国被瓜分的危局迫在眉睫，民族危机和救亡图存成为维新改良运动高涨的直接动因。1898年新年伊始，康

有为就赶赴北京,第5次上书光绪帝,提出了变法的具体主张,同时向光绪帝指出了亡国危险的严重性:如果现在再不变法图强,“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①] 1月29日(农历正月初八),康有为又向光绪帝上了《应诏统筹全局折》的第6次上书,奏折中引述了世界上因守旧而亡国的实例,主张走日本明治维新的变革之路,请求光绪帝实行变法。《应诏统筹全局折》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改革的全部要求,成为戊戌变法的施政纲领。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置位卑官低于不顾,在上书的同时,继续办学会办报刊宣传维新。继强学会之后,这一年改良派结合时局又成立了保国会,使变法维新的政治空气日趋浓烈,5个月之后,终于促使了“诏定国是”的实现,使维新改良运动达到极盛期。此时的王国维正在开风气之先的上海感受着这股高涨的维新热潮。就个人而言,走出家门,自食其力,对于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来说绝非易事,然而这却是他今后人生发展的重要起点。

其实,王国维这一年到上海,进入《时务报》馆工作是极其偶然的,尽管他在家乡时就向往新学,而且也喜爱读《时务报》,但是如果没有许家惺[②] 为他创造机会,他是无缘来到《时务报》馆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2),第190页。
② 《王国维全集·书信》记载有误。

工作的。许家惺是王国维的同学,浙江上虞人,俩人友情深厚,长期保持着书信联系。在王国维未来上海之前,许在《时务报》任书记,这年2月他因家中有事,急需回乡。为了使报纸发行不受影响,他请王国维顶替他在报馆的工作,于是才有了王国维离开家乡的初次远行。此时创刊于1896年8月的《时务报》早已名声大噪,在这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它已成为维新改良派的宣传阵地,被誉为“报王”。在它的影响下,宣传鼓吹变法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蔚然兴起,一时间全国报馆星罗棋布,从而直接推动了维新运动的蓬勃发展。对此,后人还作过统计,其量化的数据更明确地说明了《时务报》在当时的巨大影响。从1827年中国境内第一张报纸诞生以来,到1894年年底,68年中,总计出现过87家报刊,而每年新创报刊数目不超过5家。这87家报刊中,41家属于教会所办,中国人自办的非官方报刊只有11家。到1894年年底,这11家中,至少5家已经停刊。然而在《时务报》发行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1897年,全国新创报刊上升到44家,其中旨在宣传改革的报刊达20家。[①]《时务报》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是与先后在报馆工作的梁启超、汪康年、黄遵宪、徐勤、麦孟华、欧榘甲等人的努力密不可分的,特别是梁启超的那种“笔端常带感情”的宣传,更为该报增色不少。王国

① 引自《汪康年与〈时务报〉的诞生》,见《学术集林》9卷。

维在家乡拜读《时务报》的时候，正是梁启超任该报主笔，因宣传维新变法而影响日增的时候。但是当王国维来到《时务报》馆，梁启超却因内部意见分歧去了湖南，他未能见到这位声名颇著的改革活动家。但是他绝不会想到，在26年之后，他与梁启超最终成了同事，并同为享誉清华园的名教授。

王国维到达上海的当日，按许家惺事先介绍，他首先去拜见了报馆经理汪康年及其弟汪贻年。汪康年，字穰卿，1896年和黄遵宪一起创办了《时务报》。在《时务报》上撰文宣传改良，力言民权。但因他是经理，主要精力注重于经理《时务报》的业务上，因此具体的宣传工作就做得比较少。王国维进报馆工作，首先见汪康年是自然的。随后，他又去拜见了欧榘甲。欧榘甲此时任《时务报》笔政，专门撰写时论，因他文学功底好，所撰写的评论文笔豪放，很受读者的赞赏，在社会上颇有知名度。王国维慕名而来，原想好好地向他请教，但欧榘甲是广东人，讲得一口广东话，王国维很难明白他讲的全部意思，这使谈话大打折扣。但欧榘甲平易近人，待人热情，给王国维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告诉父亲，自己与欧榘甲的许多想法很相投。初到上海，王国维还受到了其他友人周到的接待和安排，尤其是汪贻年对他更是关心备至，这一切使王国维这个年轻的他乡异客甚感欣慰。更使他感到兴奋的，还在于上海所具有的那种特殊的文化氛围，而这种氛围正是从开埠以来逐步形成的。自那时候起，上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外来的影响，并且逐步成为

向内地传播新学的重要基地和了解外界的重要窗口。在这里他能开阔眼界,接触到很多新知识、新学问,这正是王国维孜孜以求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家乡时他就渴望去海外留学,然而苦于没有旅费,迟迟未能如愿,到上海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

进《时务报》馆工作一星期后,王国维曾想离开《时务报》馆,改入编译西文报刊的报馆工作,这是欧榘甲的建议。欧榘甲对他说:这些报馆内人才荟萃,数月之后便可以有大的发展,届时可再另谋其他更好的地方工作。王国维感到欧榘甲所说的与自己的想法很一致,便为此和父亲商量,但遭到父亲王乃誉的反对。王乃誉不同意的理由:一是因为王国维刚进《时务报》馆,还分文未得,这时离开不适宜。二是认为儿子和欧榘甲"初与交往,恐难得深信",建议王国维以后和欧榘甲常来常往,加以了解。三是如果王国维刚进《时务报》就又去他处,他的推荐人许家惺和家人乡友定要责怪其心思太活。父亲的意见举足轻重且言之有理。王国维只好放弃了离开《时务报》馆的打算。这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可见王国维到上海后便一心寻求自我发展。尽管他常常和父亲通信,涉世不深的他在许多事上还离不开父亲的指点和教诲,但是在上海他自己挑起了谋生和求学的双重担子,远在家乡的父亲是有些鞭长莫及了。

王国维在《时务报》馆每月的收入极其微薄,生活很清苦。他进《时务报》馆是顶许家惺的空缺,照理两人的实际收入也应相等。

但是报馆对王国维似乎有些不公平,他的实际收入每月仅为12元,而许家惺先前的月工资却是20元。对这一不合理的分配王国维极为不满,他在给许家惺的信中抱怨自己的收入太少。可他又顾及与许家惺的这层关系,所以对12元薪水也没有公开提出什么异议,他甚至怀疑和许家惺前后收入差距那么大,是否在于自己的工作有什么办得不妥。

生活的艰辛,常常使青年王国维为此犯愁,而1898年的民族危机也时时牵动着他的心。这一时期,在与许家惺的通信中,国家的前途和时局是他时常谈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当时正值胶州湾事件发生后不久,清政府拟向英俄两国借款,对此,王国维发表议论说:这就如同猪羊被栅栏圈住一样,任其随时宰割而已。3月他又在信中发表了他对时局的看法:英俄各国都说无意瓜分中国,然而俄国在吉林边界的兵力日增,又向东部海域派来头等铁舰,英国舰只也随之而来,各国兵船云集于太平洋,其意实为叵测。不久,王国维得知清政府已允许租让大连湾,但还未允准租让旅顺,他以为俄法不会善罢甘休,并为此而感到不安。5月,法国人继中法战争后又占据了马江,德国人亦占据了马祖澳。王国维在给许家惺的信中就此写道:"瓜分之局已见榜样,如何如何!胸中所欲言于足下者十倍于兹,每一捉笔不知其何以忘也。"① 这番话反映了王国

① 《王国维全集·书信》第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维对国家前途的深深忧虑,他的爱国情怀溢于言表。联系到报馆内部的人事纠葛,他有些难以理解,为什么彼此间学术观点不同会造成那么深的成见,“稍有不合,即成水火”,大家天天讲合群,最终总不能合群,私见是如此的难以泯没。他感叹地说:“大抵合群二字为天下第一难事。其所以难合,实因民质未进之故,斯宾塞尔之言深足味也。”①

到上海的第2个月,王国维曾谒见了改良派领袖康有为,随后他慎重地写信将此事告诉了父亲。王乃誉在给王国维的回信中询问儿子,前信所提的康公是否就是南海先生,并嘱告王国维应“以家累身世计为第一义”,要选择好“明师益友”。②很显然,父亲要比儿子谨慎得多,他并不愿意看到儿子过多地卷入到政治旋涡中去。其实拜见康有为并不说明王国维参加了变法维新运动,不过这却反映了王国维当时的思想倾向。他赞成变法,并且希望以此来扭转危局。他认为把变法的工作仅仅寄托于朝廷是万万不行的。只有大家都努力地去做,做得一分就算一分,国家才会有希望。与他自己所说的相一致,王国维也有所行动。他通过汪康年向杭州知府林迪臣递交了文书,建议在海宁开设一所师范学堂,并且详述了筹款事项。他说如

① 《王国维全集·书信》,第7页、第9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 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第15页。

能办成这一件事，真是功德无量。此时的王国维仍和当初在家乡一样，醉心于西学。不过情况与过去已有不同，那时王国维向往新学，但苦于无处寻觅；而在上海，他如鱼得水，工作之余常读一些翻译好的西书和宣传变法维新的书籍。王乃誉在他的日记中就记载了王国维在这一时期曾借来《读西学书法》和《农务新法》认真阅读。

在王国维追求新知识，力图不断充实自己的时候，一个人走进了他的生活，并在其一生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个人就是罗振玉。罗振玉生于 1866 年，长王国维 11 岁，字叔蕴，后改叔言，号雪堂，晚号贞松老人，原籍浙江上虞。自他的曾祖起寄籍江苏省淮安，自百余年来，罗家为江南书香世族。罗振玉童年家境贫寒，但他刻苦攻读，16 岁考取上虞县秀才，曾两次参加乡试均未中举，后来在乡间做塾师。17 岁他开始研究金石学，后又专攻训诂、考订之学。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因出于救国之愿，罗振玉开始热衷于新学和读西书，他认为："西人学术未始不可资中学之助。"[①] 1896 年他与蒋伯斧在上海创办农学社，力图通过介绍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促进中国农业的发展。次年 5 月又创办《农学报》作为该社的机关报，翻译介绍日本和欧美的农学著作，罗振玉自任总编辑。在发行的前后 10 年间，该报翻

① 甘孺：《永丰乡人行年谱》第 15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译影印各国农学书刊达100多种,成绩是明显的。为了农学社和《农学报》的翻译工作,他特聘了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为顾问。但是翻译人才的缺乏问题仍十分突出,尤其是日语翻译更为短缺。因此,罗振玉和藤田丰八商议后决定建立一个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他在上海当时的新马路梅福里租借了房屋,招生入学,创办了东文学社。罗振玉因《农学报》馆的事物缠身,就推举友人邱于蕃任校长。1898年3月22日(农历三月初一)上海第一所教授日文的学校——东文学社开学。王国维在读西书的同时,早就渴望能在上海进一步学习,而且当时在追求新学的氛围中,学习外语已逐步成为一种时尚。所以,王国维决定进东文学社学习日语。他征得了《时务报》馆经理汪康年的同意,决定每日午后去东文学社听3小时课。一同前往学习的还有《时务报》馆的法文翻译潘士裘、友人魏藩宝。就这样,在春风习习中的四马路上,每天可见王国维匆匆的脚步。东文学社的各门学科都是以日语教学,由藤田丰八任教授,冈田岭云为助教,日本驻上海副领事诸井六郎和领事馆书记船津辰一郎等兼任义务教授。由于教师都由日本人担任,学社中的日语学习环境很好。当时学生人数较少,第一期仅6人,罗振玉最初并不认识王国维,作为学校的主办人,他时常去学校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一次他偶然从一位学生的扇面上看到这样一首诗:"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

否？黑海西头望大秦。"[①] 诗的气度和意境令罗振玉大为赞赏，他十分赏识作者的才华，询问后才知是王国维所题，于是对王国维另眼相待。以后他了解到王国维"笃学力行"，认为王国维是同辈人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是"伟器"，不应被埋没，自此开始了他们一生的友谊。

王国维边在《时务报》工作，边在东文学社读书，这种半工半读式的生活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在《时务报》馆，他既要编辑日文，校对，又要写信或代写文章，还要复核书籍，甚至来客登记也属他的工作范围。如此繁杂的馆内事务，使他忙碌得几无空暇。每天听课之后，他绝少有温习和自修的时间，渐渐地学习成绩落后于其他同学，而且差距越拉越大。他为此感到苦恼，但又束手无策，只能向许家惺倾吐心中的忧虑，并寻求良策。他在信中写道："现在弟学东文，势难间断，已成骑虎之势……弟已进退两难，有如何可以设法之处，祈筹之。"[②] 阶段考试结束后，王国维成绩不及格，他与学友沈紘、樊炳清 3 人被划入退学之列。罗振玉得知此事后，特意向藤田丰八作了解说，力保王国维。藤田丰八不仅学问渊博且性情耿直，与罗振玉相交后友情日深，他尊重罗振玉的意见，也看中了王国维的才华，最后允准王国维和沈、樊二人均继续留校。

---

① 《咏史》，见《王国维文集》第 1 卷，第 303 页。

② 《王国维全集·书信》第 5 页。

为使王国维摆脱困境,能无后顾之忧地专心学习,罗振玉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不仅常常为王国维提供学习费用,而且还想方设法让王国维依靠自己的努力来解决困难。因东文学社大量翻译日本农业书籍,以及随后增设新课程需要日文教科书,罗振玉让王国维把这些书籍翻译成中文,并自己出资发行,结果这些译书都非常畅销。这样,既接济了王国维,同时东文学社也从中获得了经费。东文学社的社章规定:学生因贫苦而交不起学费者,经担保人担保,也可不交学费入学社学习。但将来学成后,必须在学社内任翻译,以译资筹学费,期限与学习时间相等。在担任翻译期限内,如果要另谋他职,学社将向担保人加倍索偿学费。实际上,罗振玉当时资助王国维的学习费用,包括后来王国维留学日本的费用,不仅是罗振玉个人的资助,也是东文学社社章中规定的。所以王国维后来跟随罗振玉也是在履行东文学社社章所规定的义务。但是无论是罗振玉的个人资助,还是社章规定,罗振玉毕竟给了困境中的王国维以很大的帮助,使他在东文学社的学习终于坚持了下来,这种帮助在王国维的整个学术生涯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期间,除了罗振玉以外,汪康年、汪贻年及藤田丰八都给予了王国维支持和帮助。王国维曾写信告诉许家惺说:藤田丰八、汪康年都对他“格外垂爱”,汪贻年“待弟则固甚厚”。尤其是王国维因报馆事务缠身而妨碍学习,藤田丰八为此曾屡次向汪康年提到这个问题。结果为王国维的学习着想,汪康年减去了他的许多杂务,让他担任

报馆内的专职日文翻译,以确保王国维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王国维常常"恐致半途而废",但又清醒地认识到"不能半途而废"。身边的师长和朋友们对他的关心和帮助增强了他坚持下去的信心。同时,他的坚韧和才华又赢得了大家的关心和支持。

初夏,王国维摆脱了冬冷春寒后,工作和生活刚刚理顺,他也开始熟悉了上海,但是半年来辛苦紧张的生活节奏和营养不良,使从小就体质羸弱的王国维积劳成疾,脚气病发作。脚气病是一种维生素缺乏症,生活贫困导致饮食质量低劣是发病的主要原因。病情严重时可造成下肢疼痛、肌肉萎缩等,甚至影响心脏。王国维清贫和辛劳的生活,使这一顽疾最终相伴了他一生。然而这次病情的确来势汹汹,王国维不得不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和学习,请假回浙江海宁休养。他回乡养病之前,维新改良运动已达到了沸点。6月11日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决定变法。康、梁等改良派历时几年的维新宣传活动终于变为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实际行动。王国维身处维新舆论中心的上海,每天通过阅读报纸来了解政情。他认为光绪帝的变法"上谕"以及一系列挽救危亡的改革措施,都有"怵惕振厉之意"。对于抛弃科举考试而不为的他来说,清廷明令在乡试和会试中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更激起了他的强烈共鸣。不过,他在赞同之余仍感到有所不足,他说:下诏废除八股,是中国数百年来的一个大的举动,但是进行这一改动无济于事,除非学校

和贡举合而为一,否则将选不出真正的人才。

7月,王国维的脚气病更趋严重,他不得不带着病痛回到别离了半年的家乡。王乃誉在日记中诉说:"静(儿)沪回,人极狼狈,腿病,竟不得起立。"王国维说自己已"虚劳之极",寸步难行[①]。但是当时受医学水平和医疗条件的局限,所请的医生都无法确诊他的病因究竟是什么,以致于无法得到系统的治疗。整个酷暑时期,王国维卧病不起,无法看到报纸,也得不到什么消息。所幸的是,他还能通过给许家惺、汪康年、汪贻年等人去信来排遣郁闷的心绪。在给友人的信中,他仍时时念及《时务报》的工作。他向汪康年建议《时务报》馆应多添购如《朝日新闻》和《日日新闻》这样的日本报刊,通过翻译可扩大报纸的信息量。

当他在病榻上仍为《时务报》牵肠挂肚时,上海的《时务报》馆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7月26日,光绪帝颁布谕旨:"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这样,《时务报》馆内原先的矛盾更趋白热化。《时务报》出至第69期,于8月17日被汪康年改名为《昌言报》,由梁鼎芬任总董继续刊行。8月初,王国维得知了这一变故,深感意外。整个8月对病中的王国维来说,震动和打击接踵而来,8月8日王国维刚满3个月的长女也夭折了。更使王国维震惊的是:9月21日,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发动了戊戌

① 《王国维年谱长编》第18页。

政变，把光绪皇帝囚禁在瀛台，康有为和梁启超亡命海外；9月28日，谭嗣同、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被杀，103天的维新变法昙花一现，京城一片血雨腥风。六君子死难消息传出，王国维痛心疾首，对封建顽固派在民主危亡之际仍不思改革，反而仇杀改良维新人士的行径非常愤慨，他在给许家惺的信中严厉地指责这些人说："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得死乎！"① 戊戌政变又恢复了中国以往的政治格局。这时王国维的脚气病经过针灸治疗，病情已稳定，并在康复中。所以他担心再回上海后，是否还能像先前那样地工作和学习。因为当王国维回乡后，汪贻年曾来信询问表示关心，"犹殷殷垂念"，一再嘱咐王国维安心养病，病愈后无论什么时候都可在《时务报》馆继续工作，负责专门翻译日文报刊的工作。汪贻年的话，也就是汪康年的意思。但现在时局变化以后，尤其汪康年"又新遭家国之变"，王国维不敢再提及这些事，所以十分焦急，内心游移不定。

11月29日，王国维的脚病刚复原，便匆匆回到了分别5个月的上海。此时的上海秋风萧瑟，百日维新失败后，《时务报》已停刊，继其后的《昌言报》也在他回沪前10天关闭，报馆人去楼空。就在王国维无处落脚，处境困窘的时候，罗振玉又一次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他请王国维去东文学社任职，担任庶务一职，同时允许

① 《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0页。

他在该校继续学业,并免收各种学杂费。此外,罗振玉的《农学报》虽是改良变法运动时期所畅销的报纸,但报中的内容主要涉及农业科技,与政治没有什么牵连,因此政变以后并没有归在被禁之列,仍然正常发行。于是罗振玉也请王国维担任该报的编辑和翻译工作。这样两处的任职保证了王国维的生活来源,也使他有了安身之处。罗振玉的帮助为王国维缓解了燃眉之急,使他又能集中精力投入到中断了近半年的学习中。

通过一年艰辛的工作和学习,王国维的日语水平提高得很快,他的才华越来越赢得罗振玉的赏识。东文学社曾影印日本史书《支那通史》,学社原让罗振玉为此书作序,但罗振玉力荐王国维代为作序。为了进一步帮助王国维,罗振玉又让他担任学监的职务,使他能有更多的经济来源。但是,内向的性格使王国维难以胜任这一工作,没干多久,就因与同学们不融洽而免职。工作是不做了,然而工资却照旧发放,可见罗振玉对他的一番苦心。

1899年的下半年,东文学社招生人数日多,原址已无法容纳更多的学员,所以学社搬迁到江南制造局前的桂墅里新址。同年学社课程设置也有所增加,除了已有的课程外,还兼授数、理、化和英语。当时同为日语教师的藤田丰八、冈田左代治就各兼上数学和英语课。王国维正是在这时开始跟冈田学习英语的。总的来说,这时的王国维要比初来学社时轻松得多,他能把较多的时间用在学习上。一次,他从冈田的文集中读到了康德、叔本华的片断论

述,激起了他的浓厚兴趣,并渴望看到他们的哲学著作。然而令他感到遗憾的是,当时还没有康德和叔本华著作的译本,他又无法读通原著,于是只得作罢。若干年后,他在《自述》中回忆那时的情景写道:由于文字的障碍,“自以为终生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1] 可这正是他随后研究康德、叔本华的发端。

东文学社在发展,王国维的小家庭也增添了新的一员,他的长子潜明在这年的秋天降生了,这给王国维清苦的生活平添了一份喜悦。与王国维相对稳定的生活形成对比的是,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急变。1900 年,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义和团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外国列强对清政府的镇压不力表示强烈的不满,随之组成八国联军,先后攻占天津、北京,从而震惊了整个中国。从王国维遗留下的文字中找不到有关八国联军侵华的内容,我们无法知道他当时的心理状态。不过,有一个事实是很明确的,由于民族危机的紧迫局势,使得东文学社的教学难以为续,因此学员提前结业,学社随之解散。王国维在东文学社的学业也不得不就此结束,前后他在这里学习了两年半的时间。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王国维已显现出了突出的才能和对知识的努力追求。当时居住在上海的日本留学生狩野直喜,后来在一篇追忆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初次听到他的名字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大概明治三十四年左右,我

① 《自序》(一),《王国维文集》第 3 卷,第 471 页。

到中国留学,在上海淹留的时候,我的友人藤田博士(现东京大学教授藤田丰八君)正好在罗叔韫君总理的东文学社任教,那是一所用日本语教授学问的学校,藤田博士说他教的学生里有某生,头脑极明晰,善读日本文,英语程度也很高,而且对研究西洋哲学有兴趣,他的前途真是引人注目。和中国现在的情况一样,我留学的时候,或许是因为当时风气,中国青年中的志学者,大都对政治学、经济学有兴趣,所谓有志新学而尝试研究西洋哲学的,非常罕见。藤田博士给某生极高的评价,说了一大堆推赏他的话,可是我始终没见到他。这位某生,就是王静安。"[1]

在上海的这一段时期,无论是他勤于掌握外语还是努力研习新学,都对他未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日后,他的学术追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时及稍后他所经受的新学的洗礼,都在他的思想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迹。

① 《回忆王静安君》,《追忆王国维》第341-342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第三章

崭露头角

1900年的秋后，王国维又重归黄浦江畔。罗振玉热情地接待了这个深得其赏识的学生，这一时期，王国维在上海就落脚于罗家。

刚步入20世纪的上海，仍沐浴在近代欧风美雨之中。维新运动的清风虽曾短暂吹过这里，但却长久地留下了近代文化的气息。戊戌政变以后，比较自由的上海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的集结地，它和受专制高压的北京不同，清廷的权力在此难以充分施展和控制。在这一自由的缝隙中，上海当时的各派政治力量活动频繁，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在此争相呐喊。“中国国会”——自力军起义的主要组织，就在此时诞生于上海。积极吸取西方近代文化，介绍西方，学习西方的风气，仍未随维新运动的失败而逝去。尤其是《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国势日蹇，迫切学东瀛以使国家富强的热望重又燃起。因为日本既是维新成功的榜样，且又与中国是

一衣带水的邻邦,在近代化方面大大落后的中国,必须急起直追,向去芜存菁的日本学习,比直接向西方学习,在时间上,距离上,实为简便而有利得多。也许正是因为这些缘故,罗振玉的《农学报》仍在刊行,并不时地刊登介绍海外的信息,日本的文稿也较多,这就十分需要翻译,尤其是日文翻译。王国维于是应罗振玉之请,帮其翻译文稿,主要翻译日文。在上海短短几年的外语学习,使王国维能在上海一显其翻译的本领。尽管他对自己翻译水平的评价很为保守,常谦逊地说"与人不如",但他的学术之途正是从翻译起步的。他在《农学报》任职期间,翻译了日本人池田升三的《农事会要》。随后,《农学报》分118、119、122三册连载了王国维的这本译著。接着,他又翻译了日本人中村五六编纂、顿野广太郎修正的《日本地理志》。此书于第二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该书出版的这年秋天,他又翻译了日本文学士立花铣三郎的《教育学》。

1901年1月29日,在维新变法被扼杀的3年之后,清政府下诏变法,这样,清王朝最后10年的新政开始了,虽然新政的各项改革都掩饰不了清政府在《辛丑条约》上尽展的卖国奴颜,但是这场王朝的自我救助运动,又实行过一部分确确实实的真改革。其中尤其显著的是教育制度的变化。从这年的下半年开始,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教育的行动,包括:重开京师大学堂;各省书院改设为大学堂,府、直隶州书院改为中学堂,一般州县学改设为小学

堂并附设蒙养学堂；定学堂选举鼓励章程，凡由相应的学堂毕业考取合格者，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等名称；改革科举考试制度，乡试、会试考策论（考试内容为时事政治、中外历史地理等学科），考四书五经科目不准用八股程式，停武科。随后又颁发了《钦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其中设计的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内的一整套新式学校制度，奠定了从清末一直延续到民国的学校系统。1905 年，清政府明令终止科举考试。1906 年，成立了全国教育行政机关——学部。所有这些，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巨大转变。在“新政”的政治、法制、实业、教育、军事等诸项改革内容中，教育的改革成为其中最富积极意义，并又有极大社会影响的内容。正是乘这股教育改革之风，1901 年的夏初，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了《教育世界》杂志。该杂志为半月刊，出版之初以线装本装帧，开辟文篇、译篇两个栏目，主要译介世界各国的教育制度及其理论，特别注重日文资料的编译。从第 1 号到第 18 号全文译载日本各项教育法规、条例达 84 种，以后相继译载日本各类教科书、教育学及教育史专著 50 多种。杂志的编者认为：“吾国教育尚在幼稚时代，罕有窥斯界之真面目者，与其为武断之议论，不如直译外籍供人采择，尚不致贻误后来。”[1] 正是出于这样的办刊宗旨，

① 引自《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 1 册，第 123 页，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杂志的译文始终占过半篇幅。当时王国维正帮助任湖北农务学堂监督的罗振玉搞翻译工作。但他翻译农书的工作不多，日显清闲，所以罗振玉就请他一起主编这一杂志，除了他们，为杂志撰稿及译稿的还有张元济、高凤谦、樊炳清等人。自《教育世界》69号(1904年2月)开始，杂志改版，栏目由原来的两个增至20个，内容上也不再限于教育，而是更多地介绍哲学、伦理学等多方面的著作，而且还译载小说。这种变化与王国维当时对西方哲学兴趣正浓刚好一致。此外，王国维还认为哲学与教育学密切相关，因为“哲学，教育学之母也”，“不通哲学则不能通教育学及教育学相关系之学”。因此，介绍西方的哲学思想也被看作是发展教育的一个方面。1908年1月，《教育世界》出版到166期最终停刊，前后经历了6年多时间。其间，《教育世界》未间断地行销于全国各大城市，这对一家私人创办的杂志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从它的内容来说，对当时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这6年多时间里，王国维就工作了5年余，为该杂志的发行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段经历对王国维的个人发展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在这时所发表的文字大都刊登在《教育世界》上，他的学术征程在这里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王国维日后成为著名的国学大师多得益于他那种非凡的才华和执著的钻研精神，而这种才华和钻研精神在这时已明显地体现出来。

在《教育世界》工作的这段时期，翻译是王国维的主要工作，然

而翻译只能通过文字来认识世界，出国留学才能以亲眼所见，去亲身感受异域的先进文化。留学——王国维在浙江老家就蕴藏心底的初愿，终于在1902年2月如愿以偿了。戊戌维新前后萌动的留学热，到1900年以后出现了一股留学高潮，确切地说是留学日本的高潮。因为，在当时整个留学大潮中，留日学生占了极大的比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原因很明显，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发展飞速，后来居上，成为一代中国青年追求学习的目标，再加上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其风俗习惯又与中国颇多相似；在家门口学就能有所收获，又何必舍近求远呢。因此，日本当然就成了理想的留学之地了。1902年，王国维也成为这股涌出国门求学热潮中的一名莘莘学子。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议和条件一经公布，王国维父亲王乃誉如中国的一般有识之士一样，曾为此愤懑不已，他在日记中曾这样说："如是，中国岂成为国，闻之愤怼填膺。"① 与父亲仅仅是对国家受辱感到不平有所不同，王国维的表现则是学习施辱者的长处，以去辱。当时不单单是王国维，许多有识青年都是这么做的，王国维也代表了那一代人。只是他为什么也选择了日本，也许只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懂日文，更容易了解那个国度。当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罗振玉。

---

① 《王国维年谱长编》第24页。

早年,王国维在其多次人生关键的时刻,都得到了罗振玉的热心资助,这次也不例外。王国维于1902年东渡日本,是因为这年年初,罗振玉受张之洞、刘坤一的委托,带领两湖书院师生前往日本考察教育,并兼购待翻译的教科书。这样王国维可与老师同期前往日本。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由罗振玉主持翻译的农书,历年来销路甚好,罗振玉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所以清廷"新政"颁布后,留学受到鼓励,王国维得到了罗振玉的全力支持。据记载,1901年留日学生共达280余名,1902年就已达到400~500名,1903年达1000名,1906年达到1~2万名。王国维就是这时随着留学大潮前往日本留学的。王国维临行前由武昌经沪返海宁家乡小住。2月14日从上海启程东渡日本。当远洋轮踏着滔滔波浪驶离吴淞口的时候,王国维一定在感怀上海,因为正是在上海的经历使他开阔了眼界,并且使他的学识有了很大的长进。这使得他与当时一般的留学生相比,有着更好的学习基础。

从1896年到1902年,中国赴日本留学的人数年年增长,当时日本的一些主要城市纷纷开办了供留学生就读的学校,这些学校一般提供中等教育,并兼及大学预科。日华学堂,是日语速成学校。东亚商业学校,主要学习日本的内政、外交,尤以商业为学习基础。东京同文书院、弘文学院是讲授日语及普通中学课程的学校,其中的弘文学院在这股留学潮中所收的中国留学

生尤多，黄兴、鲁迅、陈独秀等人在日本留学时，均先后在弘文学院学习。还有一些军事类学校，如成城学校、振武学校，其中振武学校中国留学生去得也不少。王国维经藤田丰八的介绍，进入东京物理学校学习。这一选择应该说是符合当时振兴国家的需要的。然而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人们更多地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因此，在留日学生中，多数人选择了那些当时被认为是急需的学科，如师范、法政、军事等，学习自然科学的人相对较少。

20世纪初年，中国的反清运动正步入武装斗争的阶段，地处国门之外的东京日益成为中国反清斗争的海外中心。当时留日的爱国学生绝大多数都卷入了这一时代的风潮中。而王国维却置身其外。这时的罗振玉正在日本考察教育，他对留日学生中存在着的革命倾向表示非常不满，这不言而喻地会影响王国维，使其“两耳不闻窗外事”，远离政治革命的旋涡，专心读书。当时，王国维白天学习英文，晚上学习数学。尽管学习内容并不十分多，但他却颇以学习几何为苦。正当他聚精会神于书本知识的时候，曾困扰过他的脚气病又犯了，于是只得在1902年的夏天离开日本。他决不会想到，其一心向往的留学生活竟会如此短暂，前后仅有几个月。在王国维动身回国的同时，留日学生在东京发起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年纪念会”，其重要的主持者就是后来与王国维同以国学大师蜚声海内外的章太炎。他向留

日学生呼吁“学涕来会,以志亡国”。当时的中国留日学生群情激昂,报名赴会的达数百人之多。这样的活动与王国维曾相距得那么近,但又似乎是那么远。

王国维由日本回到上海以后,随着罗振玉去南洋公学担任办事人员。南洋公学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由身兼招商、电报两局督办的盛宣怀奏准朝廷开办。在1896年南洋公学的创办之初,学校只设师范一科,开了我国设立师范学校的先例。1901年后,南洋公学又开办了东文学堂,其宗旨是,“专习东文讲授高等普通科学以备译才”。罗振玉有创办农社、东文学社,以及出版《农报》的经历,又从日本考察教育归国不久,在上海文化教育界颇具声名,因此他以农学家、教育家的身份任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的监督被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得到了沈曾植等人的支持。学堂又聘请藤田剑峰为总教习。跟随罗振玉进入公学的王国维,在办事员的工作之余,由藤田指导进修英文。从内心来说,王国维对赴日留学的半途而废不无遗憾,而且身体的羸弱更使他的情绪低落、忧郁。于是,他决计研究哲学,想在哲学中寻求人生问题的解答。

然而,王国维在南洋公学的时间并不长,其所属的东文学堂因经费无着,只办了不到一年就停办了。1902年的秋天,京师大学堂预聘王国维担任日文教习,几乎与此同时,张謇也想聘他去南通通州师范学校教书。这些邀请的发出,虽然是通过罗振玉

的推荐促成的，但王国维自身的才华才是最关键的因素。最终王国维去了通州师范学校。该校建于1902年，是张謇在办实业的同时，自出资金创办的，是我国第一个民营师范学校。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著名的近代实业家。1894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1895年受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委派，在通州创办纱厂。1899年建成大生纱厂。以后又相继办起了通海垦牧公司、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天生港轮步公司、资生铁冶厂等企业。他在办企业的同时，特别重视文教事业，一生中，除了创办通州师范之外，还办有女子师范、南通学院、盲哑学校、伶工学校以及南通图书馆。当时张謇办师范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振兴民族和国家，他说："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需从小学始，尤需先从师范始。"[①] 但是为了办这样利国利民的事，却也颇费了一番周折。1901年，他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请先立师范学校，计划一年后各州、县分别立高等寻常小学校，3年后各府立中等学校，5年后各省设高等专科学校及京师之大学校，并对学校课程及财用等都开列计划。刘坤一同意请各监司会议，结果只准立算术、测绘师范。1902年春，张謇再次上书请求刘坤一议办师范学校。并偕同罗振玉一起拜见刘坤

① 张謇：《师范学校开学演说》，见《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一。

一商议此事,但遭到其属下的竭力反对。他们说:中国人其他事不如外国人,难道读书也要向外国人求法吗?他们认为,提出建师范学校完全是因为张謇受了罗振玉的影响,而罗振玉又太相信日本人了。对于这种反对之声,刘坤一感到很为难。因此张謇才决计自己来办师范。张謇邀请罗振玉等人帮助拟定初等师范和女子师范的各项章程,以他办大生纱厂应得的5年薪金和利息共计约2万银两,以及朋友的一些资助作为建校的资金,开始筹建学校。校舍是在一座破旧寺庙基础上修建的,由于寺庙年久失修,学校基建的费用开支不小。再加上购买图书、仪器等其他设备,共用去了3万数千银两。1903年,通州师范学校正式开学,学校除聘请王国维、朱东润、陈师曾等中国教员外,还聘任了木造高俊、吉泽嘉寿等日本籍教员。张謇原打算与王国维签订3年合同,王国维随即征求罗振玉的意见,罗没有同意。于是定了1年的契约。这样,王国维在该校担任了心理学、哲学、伦理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随后又去江苏师范学校任教。

通州师范学校邻近通州城的千佛洞,校园三面环水,幽静宜人,置身其间有脱离尘世之感,的确是讲学和做学问的好去处。王国维在这里的课程量不多,与前不久深为几何学所苦的留学生活相比,的确是惬意多了。然而王国维是一个多思的人,教学之余,常坐在居湖光山色之间的教工宿舍小楼的窗前冥思苦想。此时他的心绪并不佳,这可从他写下的诗句中得以窥见:"枳棘

茁其旁，既锄还复生。我生三十载，役役苦不平。”“人生苦局促，俛仰多悲悸。山川非吾故，彷然独相媚。嗟尔不能言，安得同把臂。”“蓬莱自合今时浅，哀乐偏于我辈深。局促百年何足道，沧桑回首亦骎骎。”[①] 这些诗句无不显现王国维那种自卑自哀的心曲，以及悲天悯人的愁思。即使如此，王国维并没有放松自身的学习。1903 年的春天，他读了大量西方关于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方面的著作，其中有翻尔彭(Fairbanks)的社会学，及文(Jevons)的名学，海甫定(Hoffding)的心理学，颇有收获。随后，王国维买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哲学书籍，便把正在阅读的心理学著作暂时搁置一边，专心研读哲学。他相继读了巴尔善(Panlseu)的《哲学概论》，文特尔彭(Windelband)的《哲学史》等书。由于哲学著作文字艰深，不易读懂，在学习过程中，他仍然利用自己熟谙日文的优势，采用将原著与日文译本互相参照的方法进行阅读，效果颇佳，大大提高了他对原著的理解。在这期间，他写下了《汗德像赞》一文，以表达自己对康德的崇敬之情。康德(1724～1804)是德国 18 世纪伟大的哲学家，1770 年被任命为哥尼斯堡大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编内教授。他知识渊博，在大

---

① 《端居》(二)、《游通州湖心亭》、《登狼山支云塔》，《王国维文集》第 1 卷，第 249 页、250 页、253 页。据萧艾考证：《端居》诗写于 1903 年的南通。当时作者 27 岁，诗中“我生三十载”举其整数。见萧艾：《王国维诗词笺校》第 14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学任教期间,先后讲过逻辑学、哲学,以及数学、力学、物理学、自然地理学、人类学、自然通史和矿物学。由于康德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他先后被柏林科学院、彼得堡科学院和塔斯卡那(意大利)科学院选为院士及终生院士。他在德国古典哲学上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这三本著作构成了他主要的哲学体系。王国维在文中由衷地称赞康德说:"笃生哲人,凯尼之堡。息彼众喙,示我大道。……赤日中天,烛彼穷阴。丹凤在霄,百鸟皆喑。谷可如陵,山可与薮;万岁千岁,公名不朽!"[①] 从王国维的这些言辞中,可见哲学对他所具有的巨大魅力。然而在王国维读完了《哲学概论》、《哲学史》两部著作以后,开始接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时,所遇到的困难是他所没有料到的。因为这本书是康德的一本具有创造性的哲学名著,集中讨论了人的认识本质、能力和界限问题,不仅篇幅大,而且艰深难懂。当王国维读到《纯粹理性批判》第二部的第一编《先验分析论》时,他对其中所述的内容几乎完全无法理解,不得不中止阅读。随之,王国维把视线转向了同为德国哲学家的叔本华。叔本华(1788~1860)是德国唯意志主义和悲观主义哲学的代表,倾心于康德学说,并一直自认是康德的继承者。与康德相比,叔

① 《汗德像赞》,见《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292页。

本华的哲学著作明白易懂，文字优美；再加上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观与王国维忧郁的性格十分合拍，因此，叔本华的书深得王国维的喜爱。在一段时间里，王国维沉浸在叔本华的哲学世界中，他先读了叔本华的《意志及表象之世界》，而且一读就是两遍。接着，他又读了叔本华的其他著作：《充足理由之原则论》、《自由中之意志论》及其文集等，他的感受是“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特别是《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的《汗德哲学之批判》一篇，对他理解康德哲学有着很大的启发。1905 年他再一次拿起康德的著作，他很快意识到自己与康德的距离贴近了，理解上的困难大大减少。同时他还意外发现，这位他所崇拜的哲人，其学说也有“不可恃处”。显露出王国维所具有的敏锐眼光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种比较有系统的读书使他对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有了较深的了解，处于本世纪初的中国，学术界所思考的问题被严峻的现实深深地缠绕着，很少有人去开垦德国哲学这片沃土。这时的王国维把哲学看得很重，当他自己专心于康德、叔本华这些哲人的著作的同时，也向国内学界作了介绍。于是，这成了一个纪录：他是我国历史上引进叔本华与尼采学说的第一人。从当时《教育世界》的内容来看，王国维的译介工作还不仅限于此，除了介绍康德（有关康德的介绍文章有好几篇）、叔本华、尼采这些德国哲学家外，当时的《教育世

界》还刊载了古希腊和英国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培根、霍普斯、洛克、休谟、斯宾塞,以及英国、德国、俄国的文学家莎士比亚、拜伦、歌德、席勒、托尔斯泰等人的生平和著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直接出自他的手笔。

翻译打开了他的视界,视界的拓展又给他带来学术研究上的创获。1905 年 9 月,王国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文集《静安文集》,书中收集了《论性》、《释理》、《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红楼梦评论》、《叔本华与尼采》、《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书叔本华之遗传说后》、《教育杂感》、《论平凡之教育主义》等 12 篇于 1904 年前后发表的论文,以及古今体诗 50 首。他在自序中这样写道:“今岁之春,复返而读汗德之书,嗣今以后,将以数年之力研究汗德,他日稍有所进,取前说而读之,亦一快也。故并诸杂文,刊而行之,以存此二三年间思想上之陈迹云尔。”这本文集反映了他几年来研读西方哲学后的认知状况,具有了一定的学术水准,体现了王国维在其学术之路的早期阶段就已迈出了比较坚实的步履。除此之外,王国维在这一时期还有其他不少著述,如,《原命》、《人间嗜好研究》、《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教育小言》等,这些比较重要的文章都收入在《静安文集续编》中,此书是后来由赵万里编辑的。从所有的这些文字看,其内容尽管涉及了哲学、美学、文学、教育等多

个不同领域,但它们的思想基础却是共同的,即王国维这几年专心于康德、叔本华、尼采学说的学习所得。正是由于他运用了西方的哲学观点和学术方法来论说中国文化,因此常常能发前人所未发。其中所写的《论性》、《释理》,就是结合西方哲学思想,重新考察和分析了"性"、"理"这两个中国传统的哲学理念,在论说中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例如在《论性》一文中,他以康德哲学上的知识论为立足点,提出,世间的知识可分为先天和后天两类,"先天的知识,如空间时间之形式,及悟性之范畴,此不待经验而生";"后天的知识乃经验上之所教我者,凡一切可以经验之物"。他认为人性不是先天的知识所能认识的,因为它不是知识的形式,而是知识的内容。然而后天的知识也无法很好地认识它,因为人们经验上所认知的性受外界的影响很大,已不是"性"的本来面目了。因此他断言,性是超乎人们知识以外的东西。当根据经验来论"性",必然会先得出性有善有恶的"善恶二元论"。但是人们需要寻求更为统一的说法,于是性善论、性恶论,或性无善无不善说接踵而来,但终未能说明真正意义上的"性"。而超越经验去论性,却又不能自圆其说地说明经验上之事实。在中国历史上对于人性问题的议论由来已久,先秦时期有告子的性无善恶论、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秦汉以后,董仲舒、荀悦、韩愈等人皆主张天赋道德的"性三品"说。至宋代又有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性二元论。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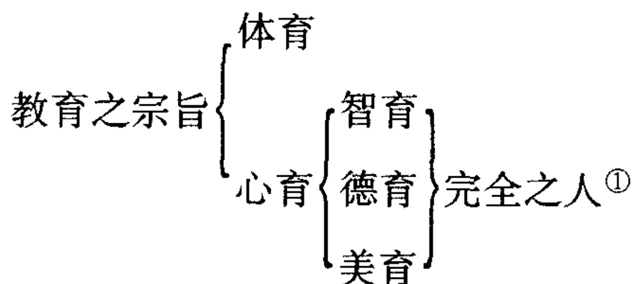
此种种,王国维一一作了剖析。他认为,至宋以前的所有论说,除了董仲舒的言论之外都属"就性论性"。宋代哲学兴起后,论说者才较多地从经验以外去论性。不过无论是从经验以内还是从经验以外去论性,这些议论都没有摆脱其论说中的自相矛盾。因此,在王国维看来,进行这样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他最后告诫人们不要再作这样"无益之议论"。在对"理"进行解释的过程中,王国维试图给这一概念下一个比较确定的定义。他认为,中国语言中"理"字的意义变化与西方语言中"理"的意义变化如出一辙。其含义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为广义的解释,即所谓理由,世界上没有毫无理由存在的东西,而它所以存在,一定有所以存在的原因,"此即物之充足理由"。二为狭义的解释,即所谓的理性,就是人类特别的"知力",指我们人类由直观的观念中,构造概念、分合概念的作用。在王国维看来,"充足理由"的原则是人类"知力"的普遍形式,理性则是"知力"的一种。因此,这两者都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在古代,不管西方人还是中国人,常常把"理"视之为客观之物。在西方,古希腊斯多噶派就用理来指宇宙的本体,称它是生产宇宙及构造宇宙之神,及普遍之理。在中国,宋代的朱熹则认为,万物之理,都出自客观的大理。王国维认为这是因为"古代心理上之分析未明"所造成的。此外,在中外历史上,人们还将"理"赋予伦理学上的意义,王国维指出,无论从理由解,还是从理性解,"理"都不存在伦理上的价

值。“其所以有此误解者，由‘理’之一字，乃一普遍之概念故也。”① 在讨论了“性”与“理”的基础上，王国维还分析了“命”这一哲学理念，因为他认为这三个哲学理念是中国哲学史上争论较为集中的。他的这些论说体现了他在这一时期研习西学，特别是西方哲学的新境界。

在教育方面，王国维也有着自己的看法，特别是1903年8月，他在《教育世界》上发表了《论教育之宗旨》一文，提出教育目的在于使人成为完全的人，而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的精神和身体必然是相调和而发达的。王国维在文中把精神分为三个部分：一.智育，即知识教育，其中包括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王国维认为：理论知识是为了满足人的求知欲，实践知识则是解决社会和人生的需求。智育是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二.德育，在王国维看来，如果有知识而没有道德，人生不会幸福，社会也不会安宁。而道德的本原在于人内心的修养，教育正是要提高人们内在的修养，使之能得到发扬光大。三.美育，王国维在文中说，人对美的感受会使他们忘却自身的利害而进入一个高尚纯洁的境界。因此美育的特殊作用体现为，一方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另一方面又可成为德育和智育的手段。最后他指出，智育、德育、美育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只有三者并行，

① 《释理》，见《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265页。

又加以身体的训练,才能培养出完全的人。为了更简洁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还用一个图表来示意:



王国维关于教育就是要使人全面发展,以及强调美育的作用,并把它与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相提并论,这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此后的教育思想的发展也有启迪作用。

这一时期,王国维写的长篇论文《红楼梦评论》最为引人注目。这是他运用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来诠释中国文学名著的重要尝试。《红楼梦》自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开始流传以来,就倍受人们的关注。最早的研究者脂砚斋在《红楼梦》仅有部分章节传抄的时候就开始对它加以评论,那时的书名为《石头记》。此后,历代对《红楼梦》进行研究的人数不胜数,于是逐步形成了以《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红学。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红学家们一般把在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以前的红学称为旧红学,此后的则称为新红学。旧红学在论说中随意性较大,存在着明显的牵强附会之弊。这可以从旧红学

① 《论教育之宗旨》,见《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57页。

中评点、索隐这两个最大派别的有关文字中看到。评点是对作品的片断鉴赏，开始于明代中叶。当时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印刷业发达，书商们往往在刻印通俗文学读物时聘请名流加以评点，后来一直沿袭下来。到清初就有金圣叹评《水浒》、毛宗冈评《三国演义》、张竹坡评《金瓶梅》等。《红楼梦》的评点开始于脂砚斋，评点人主要用圈点、批注、眉评、行间评、回前评、回末评等形式进行评点，在此过程中，可以断章，可以借题发挥。尽管有些评点文字对人们了解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过程有帮助，但总体上缺乏对艺术整体的诠释，而且相当一部分文字热衷于从作品中挖掘"微言大义"。索隐则要从《红楼梦》中探索出被影射的人和事，这一派别盛行于清末民初。这一派的作者们着意于从历史著作、野史杂记、文人诗词或随笔传闻中收集材料与《红楼梦》书中的人物事件互相比附、印证，主观臆断比比皆是。那时在社会上最为流行的是"纳兰成德家事"说。纳兰成德(1655 ~ 1685 年)，满洲正黄旗人，太傅明珠的长子，清初著名词人。这种说法极为牵强地认为，书中的贾宝玉指的就是纳兰成德，因为纳兰成德与贾宝玉一样风流倜傥，才华横溢，两人的词风也相近。纳兰成德曾眷恋一位已有婚约的女子，《红楼梦》书中黛玉未出阁就称"萧湘妃子"，指的正是这个有婚约的女子。佚名作者《海沤闲话》记述说：这位"有婚姻之约"的女子后被召入宫中。为得以相见，纳兰成德冒充每日唪经的喇嘛入宫。这又成了比附贾宝玉出家当和尚的根据。此外还有王梦阮、沈瓶

庵的《红楼梦索隐》提出的“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而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则认为《红楼梦》一书是清代康熙年间的一本政治小说。其他的说法还有很多。对这种现象,王国维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中就作出了这样的评论:

> 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之主人公外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惟美术之性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譬诸副墨之子,洛诵之孙,亦随吾人之所好,明之而已。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今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

王国维的这一认识要胜过同时代的许多人。他所说的“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已比较明确地涉及到了个别反映一般这个文学艺术形象的典型化的基本原则。而索隐派们却要把文学作品去硬套真实的人和事,他们的结论当然不可能正确。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出版以后,把红楼梦研究建筑在弄清作者的家世经历和版本源流的基础上,使整个红楼梦研究发生了重大的变革,新红学也

随之成了红楼梦研究中的主流。然而实际情况是复杂的，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新索隐派按这样的划分应属于新红学，但是它与胡适倡导的新红学研究精神相悖，因此，新旧红学之间的区别决不是以时间来划定的。同样根据新旧红学的划分，写于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属于旧红学，但这篇论文所反映出的开创之功又是无法用新旧红学的区别来予以说明的。

《红楼梦评论》共有5章，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主要阐述作者对人生和艺术的基本看法。王国维首先引用老子和庄子的话：人生之所以有忧患与劳苦，就在于人自身有“形”有“体”，并根据叔本华的“欲望之说”提出，生活的本质就是欲望，而人们的欲望又永远得不到满足，所以人生是痛苦的。因此在他看来，欲望、生活、痛苦三者为一，人生充满着无穷尽的不幸。他的这种悲观思想直接来源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那么人们面临无穷尽的不幸，是否能有所补救呢？王国维认为，在这种不幸中，只有文艺才能使人超然于利害之外，不复有欲望，从而减轻人生的痛苦。而《红楼梦》正具有这样的功能。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王国维认为《红楼梦》的基本精神就是以最成功的悲剧之笔揭示了人生痛苦的由来——生活之欲，昭示人们看破人生本质，拒绝生活之欲，走解脱之路。他说，《红楼梦》中那些自尽的人物如司棋、尤三姐只不过是“求偿其欲而不可得”而已，只有惜春、紫鹃、宝玉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解脱。对于这3个获得真解脱的人物，王国维还把他们

分为两类,惜春、紫鹃是看了别人经受痛苦而解脱,宝玉则是自己饱受痛苦而解脱。王国维崇尚的是贾宝玉式的解脱。第三章“《红楼梦》的美学价值”。文中说,《红楼梦》不同于我国那些体现传统“乐天”精神的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如《牡丹亭》、《长生殿》,一反中国崇尚“大团圆”的旧传统,以悲剧的力量显现其美学价值。他根据叔本华的论说,把悲剧分为3种,第一种由“极恶之人”从中作祟;第二种是由于盲目的命运造成;第三种是剧中的人物的位置及关系所导致的必然的悲剧结果。他认为,第三种悲剧要远胜于前两种,《红楼梦》正是属于第三种悲剧,是悲剧中的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王国维从叔本华的哲学出发,认为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才是伦理学的最终目的。而《红楼梦》的悲剧意义也正在于此。本章最主要的论点就是王国维的解脱论,他认为解脱是宗教和哲学唯一的宗旨。第五章《余论》。这是王国维这一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他提出了《红楼梦》研究中所存在的倾向性问题,对索隐派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批评。

这一长篇论文是中国近代《红楼梦》研究的第一部系统之作,此前还没有一个人对《红楼梦》作过这样系统的研究,也没有人用哲学和美学理论来评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所以这篇论著无论在《红楼梦》研究中还是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都可以说是一部开山创始之作。即使直到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以及1923年俞平伯发表《红楼梦辨》,他们在考证方面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他们

并没有以文学批评的观点来评价《红楼梦》的艺术价值。然而，王国维的评论却存在着不少牵强附会之处，他用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观点来解说《红楼梦》，在他的笔下，一本反映封建社会状况的现实主义小说似乎变成了叙说人们如何从生活之欲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哲学书籍，这与《红楼梦》的实际内容相距甚远，这成了他这部著作的最大失误。

尽管王国维这一时期的著作还不那么成熟，然而通过几年的努力，王国维的学者风范开始在他的学术文字中逐步体现出来。特别是在学术问题的阐释中，他总是将援引的西方哲人之论与中国固有的观念结合起来加以解说，从而逐步形成了一种融汇中西方文化的治学方法。他认为，在学术上，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们都试图去解释宇宙和人生问题，只要“具有解释此问题之一者”，能满足我们知识上的要求，为我们解惑，那么它无论出于中国还是外国，其作用都是一样的。所以应当破除“中外之见”。[1]他的这种认识与他在这时的学术实践是完全相符的。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强调大学应该设哲学科，应当学习哲学的同时，还指出不仅要学习中国哲学，还要学习外国哲学。因为西洋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就如同先秦的诸子哲学与儒家哲学的关系一样。他说：即使不去论西洋哲学自身的价值，如果要深刻地认识本国的

---

① 《论近年之学术界》，见《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39页。

哲学,那么也不可不研究外国的哲学。将来能促使我国学术发扬光大的人,必然是兼通世界学术的人,而不会是那些持一孔之见的人。在他的眼里,学术是没有国界的,是彼此联系的。以后他又更明确地指出:"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①] 王国维的这一思想,对他一生的学术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即使后来他的思想日趋守旧,但他在学术研究中注重科学研究方法的特点始终如一。

① 《国学丛刊序》,见《观堂别集》第4卷,第8页。

第四章

《人间词话》与《宋元戏曲史》

1906年2月，罗振玉调入学部任参事，决定举家北上赴京，并邀王国维同行。于是，王国维随罗振玉第一次来到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此次赴京，王国维未带家眷，所以就住在了罗家。8月，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因病去世，享年60岁。王国维闻此噩耗，悲痛至极，匆匆回乡奔丧。王国维从小失去母亲，是依恋着父爱长大的，父亲在他的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从父亲第一次送他到上海谋职，直至王国维渐渐闻名申城，父亲一直关注着他，并时常在言辞中、信函里倾注了父辈的忠告、嘱托和希望。当王国维将父亲葬于海宁城北徐步桥时，他痛切地意识到，从此失去了一个真正关爱他的亲人。当然，除父亲外，罗振玉可算是最关心他的师长了。次年春，罗振玉向学部尚书荣庆推荐了年轻有为的王国维。荣庆，蒙古人，罗振玉赴学部任职正是

荣庆向清廷奏调的。于是，荣庆又任命王国维为学部总务司行走兼学部图书馆编辑，负责主编译著和审定教科书等事。于是而有王国维的第二次进京。谁料不到半年，王国维的夫人莫氏又撒手人寰，时年仅34岁。王国维闻讯后随即又赶回海宁料理后事。7月匆匆南归，8月又疾疾北行。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仅过了半年，1908年1月，王国维的继母叶氏又病故了。为给继母奔丧，王国维再度奔波于南北。当他3年中第3次返京时，已是这年的4月了。所幸的是，这次回京前王国维在老家已续娶，返京时他偕新夫人潘氏同行。此时，前妻莫氏所生的3子潜明、高明、贞明分别是9岁、6岁和3岁。王国维租赁了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的房子，总算在北京安顿了下来。人间的生活的确是艰辛坎坷，人间的悲欢离合常常使人思索人生的意义。面对家庭的这一系列变故，他变得更忧愁，更郁闷。以后收入他的词集中的几首悼亡诗，写得十分苍凉，即为此时所作。

这时,王国维在学术上正经历着重要的转向,因为他在专心于哲学的过程中,日益感到,“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他深深为之烦闷。随后,他把注意力逐渐从哲学移向文学,想从中求得慰藉。因此,填词也就占据了他越来越多的时间,成了他在学术上由哲学向文学过渡的重要环节。词是一种文学形式,起源于唐代,从五代至宋代遂成为一种风尚。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唐诗、元曲并称,同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王国维在

他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时候，较为集中地以词这种文学表现形式来抒发自己的情怀，宣泄自己的感情。在南通时，他一边沉湎于哲学世界，一边频频填词。其实王国维对诗词的爱好并非从这时才开始，在22岁之前，他已写了20首诗，其内容主要是咏史。在以后的生涯中，王国维一直未中断过诗词的写作。他的一首《题友人小像》诗道出了他的这一爱好："差喜平生同一癖，宵深爱诵剑南诗。"王国维对自己所作的词自视很高，他在《三十自序》中写道："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以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不如，然此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①] 他在词的创作上如此自负，并非一味陶醉于自己的作品，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不满于晚清时期雕词琢句的词风。他说，嘉庆、道光以来的词不可说不谐美，但是一味摹拟，追求华而不实的形式，归于浅薄。他认为，这种不良词风由来已久，其源可以追溯到南宋的吴文英、张炎，他们喜欢堆砌典故和词藻却不注重词的意境和内容，"六百年来词之不振实自此始"。从他的这种认识来看，他追求的是一种形式质朴、意趣高远的词作风格。所以他才会视唐、五代、北宋的词为最佳之作，而南宋的词则次之。他最为推崇的词人是五代的李煜，北宋的欧阳修、苏东坡、秦观、周邦彦，称他们"算得大词人"。在南宋的词

① 《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473－474页。

人中,他认为只有辛弃疾、姜夔的词最好。

有了这样的眼光和标准,他在填词实践中也就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词颇有意境,词句平实深婉。其突出的特点是含有哲学意味,并寓哲理于形象之中,这与他研习哲学的经历也不无关系。他的一首《蝶恋花》词是这样的:

袅袅鞭丝冲落絮,归去临春,试问春何许?小阁重帘天易暮,隔帘阵阵飞红雨。刻意伤春谁与诉?闷拥罗衾,动作经旬度。已恨年华留不住,争知恨里年华去。

在另一首《采桑子》词中他写道:

高城鼓动兰缸灺,睡也还醒,醉也还醒,忽听孤鸿三两声。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飘零,悲也飘零,都作连江点点萍。①

在这字里行间,哲学意味被王国维表现得如此艾怨和愁苦。虽然他的词作并不完全如他自己评价的那么"罕有绝伦",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仍保持着自己的风格,超越了时尚,在清末的词坛上,

① 《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241页、189页。

可谓独树一帜。

1906年4月，王国维集二三年内(1904～1906年)所填的词61阕汇编成册，在上海刊印，名为《人间词·甲稿》。次年11月，他又汇集1906年5月至1907年10月间所填的词作，名为《人间词·乙稿》，发表在《教育世界》杂志上。词集之所以名为“人间”，是因为词中经常出现人间这个词，在《人间词》的近百首词中，“人间”二字就出现了30多处。如：“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二字。”“小立隙缝吹素帻，人间几度生华岁。”“人间何苦又悲秋，正是伤春罢。”“自是浮生无可说，人间第一耽离别。”当然还不仅于此，因为王国维认为文学“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这可以说是“人间”取义的由来。从以上的词句中可见，“忧生”与“忧世”是人间词的主题。有趣的是，《人间词》甲稿和乙稿的序文都由樊志厚所作，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人们却不清楚樊志厚究竟是谁。所以，人们对此产生了两种猜测：一，樊志厚就是王国维在上海东文学社学习时的同窗好友樊炳清，一度也曾在通州师范学校教书。樊炳清笃爱诗词，后来王国维从日本回到上海时就住在他家里。从樊的文学爱好以及他与王国维多年朋友的关系来看，由他写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他为什么要用一个不为人们所知的署名来写序呢？二，序文对《人间词》评价极高，这和王国维《自序》中对自己所作词的评价较一致，很可能是王国维托名樊志厚而作。从两种猜测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

些。后人大都倾向于第二种说法。①

正是在《人间词》的序中,王国维托名樊志厚,举出了他自己的3首代表词作: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

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今朝欢宴胜平时。

(《浣溪沙》)

昨夜梦中多少恨。细马香车,两两行相近。对面似恋人瘦损,众中不惜褰帷问。

陌上轻雷听隐辚。梦里难从,觉后那堪讯。蝶泪窗前堆一寸,人间只有相思分。

(《蝶恋花》)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独倚阑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

① 据罗继祖后来说,志厚是樊炳清的号,序的确是由王国维写的。这说明第二种猜测是正确的。此外,也有人认为,序中的观点与王国维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

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

（《蝶恋花》）[①]

第一首《浣溪沙》词说的是一只失行的孤雁，被弹丸打落，成了出猎公子和闺中佳人“欢宴”上的佳肴。上下阕各自的末尾一句“江湖寥落尔安归”、“今朝欢宴胜平时”形成了强烈对比，借以表达一种看法，即有些人的欢乐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第二首《蝶恋花》（昨夜梦中）描述了在一个梦境中，做梦人遇到了所怀念者的香车，怀着无限怜惜之情，在人群中无顾忌地去揭起车帷相问。这时，路上传来的车声将梦惊醒，原来刚才相见的情景只是梦幻，于是惟有伴随着蜡泪而惆怅相思，象征人生对于理想的固执追求，以及难以企及的失望。第三首《蝶恋花》（百尺朱楼）写了在车流日夜往来的大道旁，车行之声好似轻雷，一人在道边的朱楼上凭栏远望，悠闲地数着行人。一霎间，过往的车掀起尘土弥漫至树梢，路上和楼中之人都将面对这尘埃老去。傍晚，风吹雨打，明天这路上又将会集满雨水。词意表达了一种无奈的心理，人们所面对的世变是难以捉摸，难以抗拒的。[②] 王国维自认为，这3首词都做到了

① 《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198页、235页、238页。

② 参见缪钺：《王静安诗词述论》，见《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1辑，第341页，华东师范大学1983年版。

"意境两忘,物我一体"。但词作的特点更在于描述的形象具体、鲜明,而其中的蕴意却远远超出了具体的景和物。从词中所表露的情绪来看,它们与《人间词》中的大部分词作一样,都反映出忧愁伤感的基调,这是他悲观主义思想的一种体现。

尽管王国维对自己的词作十分看重,然而他对自己的弱点也是十分清楚的。他认为自己如要成为哲学家,则感情太丰富,认知力太缺乏;而要成为诗人,则感情太少,理性又太多。因此他一时并不清楚,自己究竟应该选择诗歌还是哲学作为自己毕生为之努力的事业。这可以说是他后来最终以史学作为其学术归宿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在填词获得成功后,王国维把精力更多地倾注于文学了。这一时期,他在学术之路上行进似乎是跟着感觉走的。他写有《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等文章。并在词学研究上花费了不少精力。经他编辑的词集有《金荃集》、《檀栾子集》、《红叶集》、《浣沙集》、《牛给事词》、《魏太尉词》等18种之多,并一一作跋。还编纂了一部以词集为著录对象的专题目录——《词录》,收录词集20多种,列出词目329条,其中现存词目225条,亡佚未见词目104条。正是在填词及收录词目的基础上,在日积月累的研读和感悟中,他对诗词创作的认识不断深化,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人间词话》的发表。它是王国维在文学批评方面的重要代表作,对后来的词学研究乃至整个文学界都有相当的影响,后人对这本书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王国维的词。词话中借用前人诗词所

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段文字至今脍炙人口。

《人间词话》最初并不是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表的,是由王国维于1908年10月至1909年1月,在《国粹学报》第47期、49期、50期上分3次刊出,共64则。至1926年,才有由俞平伯标点的单行本行世。然而,这并不是王国维所写的全部,实际上其原稿共有120则,其中删去9则,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的那64则,是作者精心挑选出来的。1927年,王国维逝世以后,曾担任王国维助教的赵万里辑录了王国维的遗著未刊稿,发表在《小说月报》19卷上,题为《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文中从《人间词话》原稿中辑录未刊的词话44则,还增入王国维的其他词评4则,共48则。1928年,罗振玉把最先发表的64则和赵万里辑录的48则未刊词话作为《人间词话》的上下两卷收入《王忠悫公遗书》。1939年有《校注人间词话》单行本出版,书中除了依据《遗书》格局之外,还辑录了王国维论词的其他言论,新增一卷,全书共为3卷。50年代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齐鲁书社的版本比较通行。从篇幅看,《人间词话》通篇并不长,但是在其诞生后的数十年时间中,先后有十多种版本行世。此外,后人以《人间词话》为研究对象而写就的书籍和文章更是数不胜数。可见世人对这本小书的垂青程度。

从学术建树来讲,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对中国文学和美学理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提出的“境界”说,这是《人间词话》,也可以说是王国维文艺理论思想的核心。其实,“境界”一词并不是王国维的创新,在古代的典籍和佛教道义中都出现过境界这一概念。其本意是“疆域”的意思。最先在诗论中运用“境”字的也不是从王国维开始的,在有关诗词的论说中多次有人运用境界这一术语。唐代的王昌龄在《诗格》中就把诗的境界分为物境、情境、意境3种,这可以说是在诗论中的最早记录。到宋代以后,“境界”、“意境”逐步被运用于评诗论画之中。尤其是到清代,人们用“意境”、“境界”来谈论诗词已是很平常的事了。与王国维同时代的梁启超也谈到了“境界”,他在评论黄遵宪的诗时说:“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①] 表现得更为突出的是况周颐,他在《蕙风词话》中一再谈到境界,他说:“无词境,即无词心。”他还说:“盖写境与言情,非二事也。善言情者,但写景而情在其中。此等境界,唯北宋人词往往有之。”他的一些论说与王国维已经很相近了。但是,王国维的独到之处在于,只有他对这一概念的本身作了阐释。在他以前没有人这样去做。他从西方美学中汲取营养,结合自己填词的经验,为这一术语注入了新的内容。与前人相比,他无论在境界的地位,还是在它的分类和运用等

①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各方面,都有了更为明确和深入的认识。他的这一研究成果为后人的继续研究探讨铺垫了基础。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是把境界作为评词的基本准则来看待的,因此他在《词话》的开篇就指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在这里,王国维的看法十分明确,有境界的词作才是好作品,反之,就算不得好作品。他推崇五代和北宋的词,其关键也正在此。那究竟什么是王国维如此看重的境界呢?稍有遗憾的是,王国维并没有给"境界"一词下过明确的定义,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他《人间词话》的片段式的论说中领会到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他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从王国维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所谓境界,不只是叙写客观的景物,还要抒发人的主观情怀。所以他才会认为,在诗词中,一切景语都是情语。这正说明,诗词作者是要通过描写景物来表达自己的感情的。然而,从王国维的认识看,词作要有境界,还需要做到两条:一,客观的景物与主观的情怀要交融在一起;二,写物、写情要真。讲到情景的交融,王国维在《人间词乙稿序》中的一段话十分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期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馀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

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文中所提到的“意”,指的是人的主观情怀,或者说是主观心境。而“境”指的是客观景物,或者说是客观物境。在文学作品中,只有这两者融合在一起,做到“意境两忘,物我一体”,才可以真正称之为“有境界”。就此,王国维举出了“有境界”的例子:“‘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前一句出自于北宋词人宋祁的《玉楼春》,一个“闹”字使词所表现的画面有了一种动感,增添了春天的气氛,同时也体现出词作者喜悦的情怀。后一句出自北宋词人张先的《天仙子》,作者在词中描写的是暮春景色,一个“弄”字既表现了花在行将凋谢前的顾影自怜,也传达出作者的伤感意味。至于说到真,王国维明确地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在他看来,真是“有境界”的重要前提。他推崇李煜的词,就在于他以为,李煜具有“赤子之心”,“性情愈真”,才写出了情真意切的词来。清代的纳兰性德[①] 能以自然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以自然的口舌来言情,他的词才如此真切。王国维认为,北宋以来,只有纳兰性德一人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当然如果没有了真,也就没有境界可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指出,北宋的名

① 这里的纳兰性德即前文提到的纳兰成德。成德为原名,后改为性德。

词家中，以贺铸的词最次。因为贺铸的词就像明代李攀龙和清代王士祯的诗一样，不是不华美，而是缺少真味。基于这个“真”字，王国维还反对在诗词作品中用替代字，用典故，用粉饰之字，因为这样做会影响对真情、真景的叙写。所以他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娇柔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这些论说表现了王国维对境界内涵的基本看法。

此外，王国维还对境界作了多方面的解说。其一，根据所表现的不同题材，王国维认为境界有大小之分。他举出杜甫的两段词句“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和“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以及秦观的两段词句“宝帘闲挂小银钩”和“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这里两人的后一段词句所表现的题材显然要比前一段来得大，但是从艺术角度来看，前者并不比后者差。所以王国维说：“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题材，创造出大小不同的艺术境界，而其中绝无高下优劣的区别。其二，王国维认为境界有“造境”与“写境”之分。他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其中所谓的“造境”，是指作者根据自己主观的想象，通过虚构创造出来的境界。“写境”则是指通过写实的手法，或者说是通过忠实的描写现实人生和自然景物而创

造出来的境界。然而这两者又是很难区分的。因为，根据主观理想的虚构而创造出的境界，取材必然来自于现实生活，其构造又必须服从自然的法则。如果完全脱离现实，不按自然法则地凭空虚构，就会给人造成不真实的感觉。与此相对，通过写实的手法去表现现实人生和自然景物，不可能把现实中所有的人和事都搬进作品里，这就需要有所取舍，而这种取舍却是要以人的主观愿望来决定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维认为，写实家也是理想家，理想家也是写实家。其三，他认为，境界有“有我”和“无我”之分。“有我之境”，就是以我观物，所以景物带着我的色彩，可以说这是抒情的境界。而“无我之境”，王国维认为这是“以物观物”，其中前一个“物”指的是处于纯粹自然状态的诗人的心境，以直观的感觉去领略对象，在主客体之间丝毫不存在利害关系，从而使主客体之间“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他认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属于这样的“无我之境”。在这一论说过程中带有康德、叔本华哲学的明显印记。

像对待自己的词一样，王国维同样很看重“境界”说，其中表现了他充分的自信。其实，前人对诗词已有很多论述，但在王国维眼里，这些论说大都无法与他的“境界”说相比。他以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严羽和王士祯为例，认为他们提出的“兴趣”说和“神韵”说只不过触及到了诗词创作的表面，而他的“境界”说才探到了本质。王国维这样说并不过分。南宋的严羽所说的“兴趣”主要是指作

者内心兴发感动所产生的一种情趣，清代的王士祯主张的“神韵”则是指用含蓄的表现方法造成含蕴不尽的言外之意，他们所着重的都是关于主观精神方面的东西。而王国维不仅注重作者的主观情意，同时也注重用以表现的客观世界。因为他认为只有这两者的交融才能产生艺术的境界。他的认识毫无疑问要比前人全面得多。

从1906年到1912年，王国维在填词和进行词学研究的同时，对中国古典戏曲也作了深入的研究，成绩斐然。

1907年的9月，北京的天气刚刚有点凉意，王国维回家乡处理完夫人莫氏的后事回京不久，带着些许伤感的他，就在《三十自序》中说：“因填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此亦近日之奢望也。然词之与戏曲，一抒情，一叙事，其性质即异，其难异又殊，又何敢因前者之成功而随冀后者乎？”这时的王国维已有志于戏曲研究了，尽管他说，他并不期望戏曲的研究也像他的词那样获得成功，但是，后来他的研究工作表明，他正是朝着这方面去努力做的，而且大获成功。

把戏曲与诗词等其他文学样式相提并论，在今天早已成了人们的共识，然而在王国维以前的大多数人因戏曲来自于民间而不受重视。尤其是自明清以来，在正史的“艺文志”和《四库全书提要》中都没有戏曲的记录，甚至藏书家也很少有人收集戏曲书籍。所以，戏曲文献大量散失。在王国维看来，当时“中国文学之最不

振者"就是戏曲。因此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就要从基础工作做起。于是他开始着手整理宋元以来的戏曲文献。他根据《武林旧事》、《辍耕录》、《录鬼簿》、《太和正音谱》、《也是园书目》、《新传奇品》、《曲目》、《元曲选》、《六十种曲》以及其他所能见到的有关书籍,先是编成《曲录》初稿,然后于1909年修订完成。《曲录》定为6卷:一、宋金杂剧院本部,二、杂剧部上,三、杂剧部下,四、传奇部上,五、传奇部下,六、杂剧传奇总集部。书中收集了宋、金、元、明、清戏曲作品2100余种,收集材料之广是前所未有的。这就为中国古代戏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总目。在编纂戏曲目录的基础上,王国维还先后写成了《戏曲考源》、《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曲录余谈》、《曲调源流表》、《古剧脚色考》等著述,开始进行初步的基础研究工作,并且产生了一些基本观点。在《戏曲考源》中,他针对中国古典戏曲形成时间这一争论已久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戏曲并非从金元开始,在宋代就有了。而古代戏曲的形式就是"以歌舞演故事"。在1911年发表的《古剧脚色考》中,王国维既考证了从唐宋至清代戏曲中分生旦净丑的不同脚色,而且从中也勾勒出了戏曲发展的大致脉络。因为脚色的从无到有,并且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向,正说明中国古典戏曲的逐步成熟。他认为,隋唐以前虽有戏剧的萌芽,但还没有所谓的脚色。到唐中叶,才有名为参军、苍鹘两种脚色,一人为官,一人为仆,表现的是不同的社会地位。宋代时期,戏曲中的"脚色"

所要表现的仍然主要是扮演人的地位和职业。此后，脚色所表现的内容有了变化，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表现剧中人的地位，二是表现其善恶的品性，三是表现其刚柔的气质。元明以后，剧中主人翁多以末旦或生旦出场，"多美鲜恶"，大都是正面人物；而卑鄙下流的剧中人物全由净丑为之，于是脚色的分别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善恶的含意了。清朝以后的戏曲则以气质的阴阳刚柔来定脚色。王国维的这些戏曲研究工作，为以后进行更为详尽的研究作好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1912年年底，王国维在日本，根据他四五年来研究戏曲的所得，着手撰写《宋元戏曲史》。经过3个月的辛勤工作，终于完成了这本专著。他在给著名学者缪荃孙的信中谈到这本书时说："其中材料皆一手搜集，说解亦皆自己所发明。"王国维用两个"皆"字来说明他的这本书，正好点明了他的这项研究工作的开创性。这本书称得上是戏曲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因为他做了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正是从王国维开始，曲学才成了一门专门之学。《宋元戏曲史》全书分为16个部分：一、上古至五代之戏剧，二、宋之滑稽戏，三、宋之小说杂戏，四、宋之乐曲，五、宋官本杂剧段数，六、金院本名目，七、古剧之结构，八、元杂剧之渊源，九、元曲之时地，十、元剧之存亡，十一、元剧之结构，十二、元剧之文章，十三、元院本，十四、南戏之渊源及时代，十五、元南戏之文章，十六、余论。最后附有元代戏曲家小传。

从书名来看,王国维在书中所要论说的重点是宋元时代的戏曲,他之所以要选择这一时期的戏曲作为重点,是因为他认为戏曲产生在宋元时期,而且在元代已逐步成熟了。书中主要以考证为基础,展现了中国戏曲是怎样在宋元时期发生成熟的。特别是在此论说中,他给予元曲以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诗词的确在唐宋两代最兴盛,但诗词是否就是唐宋两代文学中最好的作品还有疑问。而在元代文学中,元曲无疑是最好的。那么元曲好在哪里呢? 王国维首先提出元曲的优点就是自然,他解释说:古今杰出的文学,无不以自然取胜,而在这方面没有超过元曲的。元曲的剧作者只要能摹写其心中的感想和时代的情状,就不回避思想的卑陋及人物的矛盾,剧作中流露出“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因此“元曲是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其次,王国维认为,元剧的最佳之处在于有意境,他又进一步阐发曾在《人间词话》中所论说过的境界说:“何以谓之有意境? 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① 这里所说的“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显然更是针对元曲说的,王国维引用了元曲中的许多例子来加以说明。对于元曲中的悲剧王国维也大加赞赏,他认为,最有悲剧性质的剧目要算是关汉卿的《窦娥冤》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了,因为剧中虽因恶人导致有人“蹈汤赴火”,但是整个故事的发展仍表现了主人翁

① 《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389页。

的意志，所以他说即使把这两个剧目放在世界著名的悲剧之列也“亦无愧色”。这种重悲剧的认识与《红楼梦评论》中所表现出的思想又是相一致的。前人从来没有对元曲作过如此高的评价。

王国维的这本书不仅详述了宋元时期的戏曲，而且还把中国戏曲发展的基本线索清晰地描绘了出来。他把后世戏曲的源头上溯到了中国的上古时代，他认为，戏剧的萌芽产生于那时的祭祀歌舞，而这种歌舞是由巫(以装神弄鬼替人祈祷为生的人)来扮演的。在春秋时期有了“以歌舞及戏谑为事”的演员，到汉代以后，歌舞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出现以歌舞来演故事的现象。而真正把歌舞和故事两者合二为一的则是在北齐，这是后世戏曲的确实源头。但这种形式仍然是以歌舞为主，所演的故事十分简单。到唐代已出现了不少歌舞剧，可是剧中的布置很简单。当时除了歌舞剧之外还有滑稽剧。后来的宋金时期，中国才开始有纯粹演故事的戏剧，或称“古剧”。这种古剧仍然不同于后世的戏剧，因为剧中穿插了不少技艺游戏。随后的元代杂剧，其形式和曲调已比较确定，与前代的戏曲相比，它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元杂剧不用前后一曲、运用不便的大曲，而是每剧为四折，每折由同一宫调的不同曲牌连缀而成，不同的宫调可以表达不同的情绪，使用起来比大曲自由，比诸宫调效果更好。二.由叙事体变为代言体。宋人的大曲采用的都是叙事体，金人的诸宫调中有对话，但基本上仍采用叙事体。只有在元杂剧中才用科白叙事，用唱曲来代替对话，这不

能不说是戏曲发展中的一大进步。由此,中国真正的戏曲出现了。以后南戏又有了突破,从一剧四折,每折限一宫调,限一个人唱的原有固定格式,变为一剧可有数折,一折可不限定宫调,还有合唱。使戏曲有了更大的进步。就此,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的余论中作了总结,他说:

由此书所研究观之,知我国戏剧,汉魏以来,与百戏合,至唐而分为歌舞戏及滑稽戏二种;宋时滑稽戏尤盛,又渐借歌舞以缘饰故事;于是向之歌舞戏,不以歌舞为主,而以故事为主,至元杂剧出而体制遂定。南戏出而变化更多,于是我国始有纯粹之戏曲;然其与百戏及滑稽戏之关系,亦非全绝。

作为戏曲史研究的奠基人,王国维对戏曲发展的概括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他们在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个基本线索可寻。这是《宋元戏曲史》对戏曲史研究的发展所作的一个重大贡献。

然而当王国维在戏曲史研究方面开辟出了一条崭新之路后,他却就此终止了自己的相关研究。对学术事业来说,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我国戏曲史研究的第一本专著,可是从王国维的学术生涯来看,这本书则是他戏曲史研究的最后一本书。因为此后王国维的研究重点开始由戏曲转到了其他领域。

第五章
东渡扶桑

1911 年 10 月 10 日，旧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历史事变，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在长江以南的地域捣毁旧政权，各省纷纷响应，宣告独立。这次起义的发生有些偶然，然而革命的爆发却有其必然性。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为推翻清王朝奋斗了整整 18 个年头，而王国维则在这一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埋头钻研，向着学术研究的高峰挺进。这场革命对社会产生的强烈震撼却未能使王国维有所心动。如果说当年康梁维新变法还使王国维为之激动而热血沸腾过的话，那么当改良让位于革命后，王国维与这股革命的潮流已明显有了距离，他对辛亥革命要冲破现有的统治秩序已无法理解，并难以接受。以后他所采取的行动，与这种思想感情是绝然分不开的。

11 月，距武昌起义发生不久，王国维就又一次东渡扶桑，

与他前一次的东渡相比，这一次多少显得有些仓促和突然。促成这次远行的直接因素毫无疑问是局势的骤变，但是像王国维这样的一介书生，尽管在思想感情上并不同情革命，但此时的他与政界并无瓜葛，似乎没有必要急着走出国门。其原因何在呢？这只有在那个对他来说居于师长与密友之间的罗振玉身上去寻找。还在武昌事起之初，因大局突变，汪康年离京赴天津，曾邀罗振玉同往，而罗振玉则以旅费无措婉拒了。然而当看到奕劻的内阁总理大臣由袁世凯取而代之的时候，罗振玉有些坐不住了。袁世凯的重新出山一时间成了时局发展的关键。当时很多人，包括清王室、外国驻华使节以及一些革命党人都认为袁世凯是能重新稳定政局的唯一人物。当然也有不少人因袁世凯的复出而更加惴惴不安，罗振玉就属于这一类人。他在晚年所写的《集蓼编》中这样写道："及袁世凯再起，人心颇安然，予知危益迫矣。"他这里所说的"危益迫矣"，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他意识到，清朝政府请出袁世凯是迫不得已的，面对迅猛的革命他们已难以招架，一旦革命党人获得政权，对他不利，因为他自认为得罪了革命党人。另一方面，他也不愿看到袁世凯上台。据说，罗振玉与张謇矛盾较深，先是他在苏州师范学堂期间与之发生冲突，被其赶走；后在学部，他又与身为全国教育会长的张謇意见颇为不合。而这时张謇正与袁世凯打得火热，这使他感到不安。除此之外，其中还另有隐情，罗振玉的亲家刘鹗是遭袁世凯的陷害，被罚往

新疆致死的，这同样也引起了他对袁的强烈不满。[1] 出于这些原因，他想离开北京。就在此时，日本本愿寺教主大谷伯光瑞忽然派在京的本愿寺僧来见，奉命劝罗振玉移居日本，并转告已为他赴日作好了一切准备，包括其家眷的安顿。大谷伯光瑞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和尚，对考古尤有兴趣。在 1902 年至 1904 年间，他曾与其弟子多次到我国塔里木以及吐鲁番、敦煌等地探险，获得很多文物，并著有《西域考古图谱》。直到 1911 年 9 月，他还派遣了一支探险队来华。他对罗振玉发出邀请当然与罗振玉多年来搜集古物珍藏有关，只是两人素昧平生，罗振玉对此颇为犹豫。与此同时，罗振玉的旧友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冈签藏等人也来信催他早日启程，并说可为他预先准备好寓舍，建议他将其藏书寄存在京都大学图书馆。经过与藤田丰八商量，罗振玉决定去日本。当时王国维与罗振玉同在学部工作，任图书馆编译。由于他们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罗振玉的这一决定当然对王国维有很大的影响力。就王国维自己而言，去日本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当时局势动荡，无法预料将会发生什么，这多少会对王国维的生活带来影响。后来他在日本曾有过这样的诗句："羸蹶俄然似土崩，梁亡自古称鱼烂。干戈满眼西风凉，众雏得意稚且狂。人生兵死亦由命，可怜杜口心烦伤。四方蹙蹙终

① 参见萧艾《王国维评传》第 80 页，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安骋？幡然鼓棹来扶桑。”[1]反映了他当时想避免受局势约束的内心思想。此外，他对日本并不陌生，又熟谙日语，在那里生活、研究不会有什么障碍。所以他随罗振玉东渡也就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了。当决定作出以后，先由藤田回日本作安排。罗的所有藏书、文物、家什则交本愿寺和尚代运。随后，罗振玉偕同全家离京赴天津，然后乘船东渡。与罗同行的还有王国维全家及罗长婿一家，男女老幼共 20 多人。当时，已临近初冬，大沽口即将封冻，东渡的船只已日渐稀少，他们总算还是赶上了一艘名为“温州丸”号的船。可这是一条吨位不大的商用船，船员舱无法容纳这么多人，因此除了罗振玉，他们其中的大多数人只能呆在载货舱中。途中风大浪急，许多人呕吐不止。他们经受了数天的强烈颠簸，总算到达目的地。

抵达京都,他们先住在田中村,王国维与罗振玉、刘悸缨 3 家同居一处。最初,王国维忙于整理罗振玉的藏书。这些书运抵日本后寄存在京都大学,由于在装箱搬运中错乱太多,需要整理并编订目录,王国维与罗振玉每天往返于学校和住所之间,颇感劳累。藏书不在身边毕竟不方便,再加上居室狭小,生活起居也不够舒适,所以罗振玉便以藤田丰八的名义买下了净土寺町的一块地皮,新建了一栋楼,并于 1913 年年初入住新居。不久,又增建一个书

① 《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见《王国维文集》第 1 卷,第 263 页。

房。书房落成的那天，罗振玉刚好从行箧中找出北魏初年的《大云无想经》写本，于是就以“大云书库”为他的新书房命名。书库内，古籍、碑帖、甲骨、钟鼎彝器、封泥分类陈列，收藏颇为丰富，其中藏书50万卷、古器物铭识拓本数千通、古彝器及其他古器物千余品。这给身处异乡的罗振玉和王国维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稍后，王国维也迁入相距不远的吉田町神乐冈八番地。京都风景优美，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潜心做学问，的确要胜过喧嚣的北京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移居吉田町神乐冈八番地，背吉田山，面如意岳，而与罗董二公新居相近，地亦幽胜，惟去市略远耳。”[①] 从信中的语气看，王国维颇为轻松、愉快。

在日本的这段时间是王国维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时期，说它重要，关键在于王国维的研究方向又一次地出现了重要转变，即由专治文学开始转向专治经史考据。这次转变与罗振玉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王国维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此时的他在主观上似乎把治经史考据看作为一种解脱的方法。他在所作的《浣溪沙》词中这样写道：

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偶听啼鴂怨春残。

① 《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5－36页。

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丹铅。闲愁无分况清欢。[①]

词句中表达了他那种寻求远离现实人生的心态。纵观其一生,这已不是他有生之年的第一次学术转向,但却是最后一次。这样的转向构成了他个人学术生涯中的一个奇观。在他一生的3次学术转向中,其所体现出的精深造诣以及所涉猎的众多领域让后人叹为观止。此外,在日本期间,他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日本的四年余"成书之多,为一生冠"。他之所以能作出如此多的成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得到了罗振玉的有力帮助。他们朝夕相处,互相切磋学术问题。王国维每著一书都会事先与罗进行商讨,以确定所采用的体制,并权衡得失。这使他的学术功力日渐精深。其二,与国外学者广为交流,这其中既有日本的学者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冈谦藏以及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诸多教授,也有欧洲的学者沙畹、伯希和等,王国维从中受益匪浅。其三,他正逢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发现时代",这一发现时代究竟是指什么呢?王国维后来在清华学校作讲演时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后古器物、

① 《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239页。

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帐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①

这里所说的第一次发现指汉武帝末年（汉武帝刘彻在位36年，即公元前122年－公元前86年），鲁恭王为了扩建自己的王宫，毁坏孔子旧宅，不期在宅壁中发现了用战国时代的文字写就的经书残本，有《尚书》、《礼记》、《论语》、《孝经》数十篇，这些书是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孔子后人藏匿在壁中的，史称“壁中书”。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相当的影响。由于书中所用的文字即不同于汉代时所用的隶书，也不同于小篆，因此当时的人不认识这种文字，把它称作蝌蚪古文。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

① 《王国维文集》第4卷，第33页。

的文字学著作,其中所收的古文绝大多数以壁中书为据。此外由此逐步形成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学术分野,并展开了长期的论争。第二次发现指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有个名叫不准的汲郡人盗掘魏襄王墓,发现可装数十车的大量竹书,上面书写的也是战国时期的蝌蚪文字。内有《纪年》、《易经》、《易繇阴阳卦》、《卦下易经》、《公孙段》、《国语》、《穆天子传》等,共计75篇,经人研究整理,得书15种,这些都是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由于魏襄王的墓在汲郡(今河南汲县西南),因此这些书被称之为"汲冢书"。后来大都散失,仅留存《穆天子传》等4种,但都不是原本。与前两次发现相比,这第三次发现无论是所包容的内容,还是其意义都远胜于前者。尤其是其中的殷墟甲骨文所涉及的年代更为久远,能使后人得以了解殷商时期中国社会的状况;而敦煌的文物资料则涉及到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史地、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等诸多内容,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史实,其时间跨度达数百年。对于研究我国魏晋至隋唐宋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历史都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些丰富的历史资料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才开始为人们所知的,随后逐步发展为"甲骨学"、"敦煌学"等显学,为世界学术界所瞩目。王国维所处的那个时期,正是这些新学问发展的初创阶段,这些还不为人们所深知的新材料需要专家学者们的深入研究和解读,这使得王国维的才智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后期的学术转向与这种历史背景毫

无疑问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在日本的4年多时间还只是他在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开端。在他所举第三次新发现的4项内容中，除了内阁大库的资料之外，其他三项内容，他的研究都涉及到了。同时也正是有了与罗振玉的密切交往，才使得他能够看到这些新材料的大量实物，并为这些新学问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在1913年1至2月间完成了《宋元戏曲史》之后，王国维的研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的阅读也开始转向了经史类书籍。在这年11月给缪荃孙的信中，他说："今年发温经之兴，将《三礼》注疏圈点一过。"这里讲的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3部儒家经典，其内容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制度及礼制、礼仪。这说明王国维的研究重点转向了古史。与此同时，他还阅读了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并撰写了一系列的考据著述，其中《明堂庙寝通考》、《释币》二书特别值得注意。王国维在写前一本书的过程中依据甲骨文和金文为基本资料，并以《史记》、《考工记》等古籍为佐证来说明明堂之制是古代宫室宗庙燕寝的通制。他认为：我国家族制历史久远，一家人之中父子有兄弟，而父子兄弟又有配偶，一家人无法住在一间房子里。但为了便于联络感情，彼此互助，各自所居又必须离得很近，因此就采取"四阿之房"，即4栋房的堂各自东南西北朝外，而4堂后的4个室亦东南西北向地围靠于中庭。这种布局既利于用，又很美观。以后明堂、辟雍、宗庙等古代礼制建筑的格局都由此扩大而来，并形成基本的统一定制。他所撰的另

一书《释币》,原名《布帛通考》,共两卷,书名中的“币”指的是丝织品。书中依据汉魏以来的历代古文献资料,确定古代布帛的尺寸,认为古代的币帛大都是按照官方的规格织造的,称为制币。一匹一般有两种规格,或是宽二尺二寸,长四丈;或宽三尺二寸,长三丈六尺。那时的一匹布大约可制作一套衣服。随之王国维根据《礼记·丧服小记》的记载,详细考证了古代制衣的确切尺寸。尽管这两部著作还只是他古史研究的初步,但是,他日后在研究中所形成的那种用地下的实物与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的学术风格和方法在这里已初露端倪。

当然,王国维在这时以及稍后的研究中,对简牍的整理与考释无疑是这一时期他所做的最为引人注目的工作。还在1912年,刚到日本不久,王国维在整理罗振玉的书籍、藏品时就撰写了《简牍检署考》一文。此文从这年春季开始动笔,四易其稿,直到10月间才定稿。所谓“简”是我国古代的书写材料,以竹或木削成狭长条片,竹片称简,木片称牍或札。人们用毛笔在上面书写。若干简以绳编缀在一起,叫策(册),其长度根据不同用途有不同规定。在纸张发明以前的相当长的时间里,竹简和木牍一直是我国历史上的主要书写材料。作者通过旁征博引,用分类法对简牍作了细心的考证,尽管其中的一些推论有所失误,但此前人们不甚了然的简册制度在他的笔下毕竟明晰了起来。随后,他与罗振玉共同编订《流沙坠简》,这为他带来很高的学术声誉。鲁迅后来在《不懂的音译》

一文中曾作出这样的评论:“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①]这种赞誉是与王国维的才干和所作出的辛勤努力相吻合的。

《流沙坠简》一书辑录了一部分在本世纪初发现的汉朝时代的简牍,书名中的“流沙”指简牍的发现地——我国西北的沙漠地区,这其中也包括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敦煌。这些简牍是展现中国古代历史的宝贵文献资料,但《流沙坠简》所依据的却是外国人的记录《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发现的中国文献》,这其中有着一段中国文物大量流失的伤心史。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一些外国的探险者争先恐后地来到中国西北边陲的沙漠地区进行探险式的寻宝,中国文物宝藏在这股“探险热”中大量地被劫掠。斯坦因正是这段往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斯坦因(1862 ~ 1943)全名奥里尔·斯坦因,原为匈牙利人,1904 年加入英国籍。当时受英国政府的雇佣,担任印度西北边境省总督学和考古调查员。早在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900 年 5 月 ~ 1901 年 7 月),他就去新疆进行“考古”活动。在那次中国之行中,他收获很多,随后写有《古和阗》一书。几年以后,他又有第二次中国之行。这次赴中国与敦煌石

① 鲁迅:《不懂的音译》,《热风》。

窟的发现有着密切的关系。1897 年(光绪五年),匈牙利地质调查所所长洛克奇以考察地质为名到达敦煌,发现莫高窟,亲眼目睹壮丽的石窟,精美的石画,叹为稀世之珍。1902 年,洛克奇在德国汉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会议上作关于敦煌佛教艺术的报告,谈论中国敦煌艺术的宝藏,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普遍注意。随后,斯坦因去敦煌探险正是由洛克奇的报告所驱使。行前,他以把将来搜掠来的所有古物交给不列颠博物院陈列为条件,要博物院提供探险经费,双方一拍即合,于是斯坦因出发了。1906 年,斯坦因由中亚进入中国西北。在新疆活动半年多,于 1907 年初去敦煌。进入玉门关后,他在疏勒河(敦煌境北的河流)附近地区的古长城遗址和一个小驿站中掠得了大量木简,这些木简大都出自汉代,所以被称之为“敦煌汉简”。由于斯坦因不懂汉语,在他回欧洲后,就把这些汉简,还有此前在尼雅所得的魏晋木简,连同若干古纸文件、帛书等物,全交给了在巴黎法兰西学院任教授的沙畹代为研究。

沙畹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也是世界著名的汉学研究大师。在法国最高学府——巴黎师范大学读书期间,沙畹就已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怀有极大的兴趣。他曾于 1889 年前往中国,并作为法国驻华使节团自由随员在那里逗留了 3 年,通晓汉语。在这 3 年中,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汉学研究,并从事翻译《史记》的工作。1907 年他再度来华,在东北、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并在随后发表了《华北考古记》。在他的一生中写了

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当他从斯坦因那里得到汉简后，便选取其中较完整的991号撰成了考释，于当年付印，题为《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发现的中国文献》，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本书。此前，王国维曾将他的《简牍检署考》寄给沙畹，沙畹从中还吸取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因此他这时也把这本书回赠给罗振玉和王国维。当王罗两人看了这本书后，都感到不满意，决定予以重新考订。

沙畹的原书以文物的出土地点分为三篇。与沙畹不同，王国维与罗振玉所编订的《流沙坠简》却是以汉简的内容来分类的。书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小学、术数、方技书，是有关《苍颉》、《急就篇》、《历谱》、《占术》、《相马经》、《兽医方》等书籍的残简。第二部分屯戍丛残，分为6个小类，1.簿书，2.烽燧，3.戍役，4.廪给，5.器物，6.杂事，内容主要反映汉代西北边陲的官制和屯戍等状况。第三部分简牍遗文，对字迹不清，残损严重的简牍作集成考释。其中第一、第三部分的考释由罗振玉承担，第二部分则由王国维负责，这部分是其中最为主要的部分。经过数月的努力，考订工作最终完成，王国维随即写了一篇长序，考证了这些木简出土方位及其制作年代。他写到："……案古简所出，厥地凡三：一为敦煌迤北之长城；二为罗布淖尔北之古城；其三则和阗东北之尼雅城及马咱托拉拔拉滑石德三地也。敦煌所出，皆两汉之物。出罗布淖尔北者，其物大抵上自魏末，讫于前凉。其出和阗旁三地者，都不过二十余简，又无年代可考。然其最古者尤当为后汉遗物，其近者亦当在隋

唐之际也。”[①]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尤其是王国维所作的《屯戍丛残考释》,不仅考订了原来沙畹的释文,而且还论证了汉代边郡的屯戍状况、烽燧制度,以及玉门关地理位置等一系列疑难问题。《流沙坠简》一书于1914年5月完成,罗振玉即根据王国维的手写本付印。就在书完成后,王国维又读到了斯坦因旅行记,才知沙畹原书每支木简都编号标明了出土地点,想把这些内容写入考释中,但已来不及,于是他加写《流沙坠简后序》作为补充。以后他又写了《流沙坠简补遗》、《流沙坠简附录考释序》等文,继续对此书进行补充考证。直到1916年,王国维还撰写了《流沙坠简考释补正》。他在自序中说:“二年以来,浏览所及,足以补苴前说者,辄记于书眉,共得数十事,写而出之,以质世之读是者。”[②] 这种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正是王国维的一贯风格。但是,王国维与罗振玉在考订《流沙坠简》过程中,始终没有看到过这些汉简的实物,他们的直观依据仅仅来源于沙畹书中的533张简牍照片,而这些照片所涉及的简牍也只是斯坦因发现的一部分。这种状况给王国维和罗振玉的工作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但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王国维仍然以他严谨的学风和严密的论证,获得了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王国维自己对《流沙坠简》在史学上的价值是有充分认识

① 《王国维文集》,第4卷,第160页。

② 《观堂别集》卷四,见《王国维遗书》第4册,第15页。

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流沙坠简》“关系汉代史事极大，并现存之汉碑数十通亦不足以比之。东人(日本)不知，乃惜其中少古书，岂知纪史籍所不纪之事，更比古书为可贵乎。考释虽草草具稿，自谓于地理上裨益最多，其余关乎制度名物者亦颇有创获。”[1] 其中王国维所说的“岂知纪史籍所不纪之事，更比古书为可贵乎，”体现了他的重要学术思想，正是有了这种思想指导，他才使地下的文物成了可证史实的宝贵史料。即使他在这本书中的一些论证还有待于修正，但他为近代简牍研究的后继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几乎在着手考订《流沙坠简》的同时，王国维还在罗振玉的邀请下，编成了《齐鲁封泥集存》一卷。这里提到的封泥又称芝泥或泥封，它与简牍一同存在。在古代，写有公文和信件的简牍需要用绳串连起来成为简册，为了防止私自拆解文书，往往在连接简牍的绳端或打结处用泥封上，并盖有印，这就是封泥。对于小小的封泥，在王国维之前已早为人们所注意。以光绪末年吴式芬、陈介祺撰的《封泥考略》来看，其篇幅就达10卷之多。1913年，罗振玉正要印行他所藏的敦煌古佚书和洹阴甲骨文字，同时还将所有的封泥藏品拓本。大云书库内的封泥收藏颇为丰富，其中有很多是《封泥考略》中没有收录的，可补其阙。王国维在整理中确定有400多种是考略中没有的，他按《汉书》表志的顺序编辑印行。王国维在

① 《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0页。

此前写的《简牍检署考》也论及到封泥,但这次的研究与前次有着明显的不同。因为前者只考证了封泥的由来及运用,并仅以封泥来说明简牍的形式。而这时的王国维在排比封泥藏品的同时,还把封泥作为史料,用来说明历史,这在封泥研究上肯定是一个大的进步。王国维根据封泥上所盖的印可以更多地了解古代的官制,比如许多封泥上印的官名就是史书记载中所没有的。他在《齐鲁封泥集存序》中说:“若夫扶风列《表》、司马续《志》,成书较后,颇有阙遗。此篇所录,则汉朝官,如雒阳宫丞、宫司空、私官丞、中私官丞,王侯属官如齐武士丞、齐昌守丞、齐中右马、齐中左马、齐司空长……皆班《表》、马《志》所未载。”同时,根据封泥上的印迹对考证历史地理也很有帮助,封泥上印有的济北、河间、即墨、城阳诸郡,《汉志》中就没有。史书中的一些地名讹误通过封泥佐证可以得到纠正。“齐哀王舅驷钧所封国,《史记·孝文纪》作清。《汉书·文帝纪》作靖敦,《史表》作清都,《汉表》作邬,徐广注《史表》又云,一作枭。今封泥有‘请郭邑丞’、‘请郭丞’,则知前五名皆请郭之讹也。”[①] 经过王国维的精心考证,小小的封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此过程中,王国维通过对两汉地理的考证,还发觉了《汉志》等史书中的记载错误。班固在他的《汉书》中说汉高祖在他统治时期设置了26个郡国,但实际上这26郡国的2/3是在汉景帝时设置的。

① 《王国维文集》第4卷,第176页,第177页。

王国维又写了《秦郡考》、《汉郡考》两文以补正前人的错误。

从王国维的著作年表来看，他在日本的那段时期还对敦煌莫高窟的唐人写本作了研究。说到莫高窟，人们很快就会联想到其中所藏有的珍贵遗书和艺术品，然而它们的命运与敦煌汉简一样，由于外国人的一次次所谓的探险，这些宝贵的文物资料大量流失。这里要提到的第一个攫取者仍然是那个名叫斯坦因的英籍匈牙利人。1907年斯坦因抵达敦煌后，当他得知石窟中藏有很多古代写本时，就把贪婪的目光盯向了石窟的内部。其实，石窟中隐藏着古代写本也还仅仅是斯坦因到敦煌的几年前才发现的，发现人是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1900年6月，王道士雇人清理一座已被废弃的佛教寺窟，在清理过程中看到洞壁上有一条大的裂缝，通过裂缝，意外地在洞壁后的石室中发现了大量的唐代经卷，有数万卷之多。这些文献绝大多数是写本，也有少量的雕版印刷品，我国现存较早的雕版《金刚经》就在其中。这么多的文献为什么会被藏在一个石室中呢？据考察，藏经石室的洞门被封堵的时间在1035年。这年，党项族西夏国赵元昊攻击敦煌，迫使居住在莫高窟的众多僧人不得不避走他乡。临行前，他们把不便带的佛像、经卷、绣画、文书等封藏在这个石室内，外面砌成墙，并绘上壁画，使人难以发现。此后，藏经的那些僧人为避开战乱，四处逃散，却一去不再回来。于是，这些稀世之宝也就不为人知地封存在石室里达近900年。对于这些文献的重要价值，王道人懵然不知，而斯坦因正利用了这

种无知,从王道人那里骗走了许多珍品,包括24箱写本和5箱画绣品及其他美术品遗物。随之,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于1908年也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经过与王道士近1个月的秘密交易后,在藏经洞里花了3个星期的时间翻阅卷子,取走了6000多件卷子。尽管伯希和在斯坦因之后来到莫高窟,但是他通汉语、藏文、突厥文等多种文字,经他挑选而掠走的卷子却是石室遗书中的精华,其中许多经卷和文书还是孤本。此后俄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都纷至沓来,莫高窟中的存物以及敦煌的其他宝藏随着这股觅宝者的人流而大量地被掠走。除我国外,世界上约有13个国家藏有敦煌文物,英、法、俄、日等国的收藏量较大,其中尤以英国为最,所藏的石室遗书和绘画约有1.2万至1.5万件。

正是由于敦煌文物的大量流失,王国维与罗振玉的所见才十分有限,同时他们对敦煌文物也特别重视。1909年伯希和带了一些敦煌文物去北京,展示给罗振玉和王国维等学者看。当罗振玉等人得知藏经洞卷子已大量流失,十分震惊,上书清廷予以保护。清廷学部勉强拨银6000两,将残存的经卷全部买下,运往北京,这才使敦煌宝贵的卷子不致尽失。此后,王国维帮助罗振玉辑录《敦煌石室遗书》印行,并托人拓下敦煌千佛洞莫高窟碑等数十份,以作考证。1911年7月,他曾为罗振玉所藏的敦煌唐写本《太公家教》作跋。此书是一本教育儿童的启蒙读物,内容主要是唐朝以前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谚语。王国维在跋中对该书作了进一步的考

订。在日本,他又为两个唐写本写跋,一本是《春秋后语》,为东晋史家孔衍著的战国史;另一本是唐写本《兔园册府》。以后他又写了一系列的敦煌唐写本跋,并且是最早研究敦煌曲子词的人。

王国维在日本的生活是很清苦的,由于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他最初担忧是否能在日本待下去。他曾在给缪荃孙的信中这样说:“维在此间生计尚无把握,叩尽囊底,足支一年,此后不知如何。”① 为此他曾一度答应为《盛京时报》写稿来弥补生活费的不足,后因报主不能按时付清稿费而作罢。这时罗振玉正要着手恢复《国学丛刊》(创刊于宣统年间的北京),于是他请王国维管理刊物的编校工作,每月付给工资200元,这才初步解决了王国维的生活问题。由于经济上的拮据,王国维不得不于1915年3月先将妻子儿女送回海宁故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国维在异乡所作出的学术成就越来越多,除了上述已提到的那些成果之外,他还翻译了日本矶谷幸次郎所著的《法学通论》,并撰写有《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邸阁考》、《洛诰解》、《鬼方昆夷玁狁考》、《古胡服考》、《古礼器略说》、《浙江考》、《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生霸死霸考》等著述,在考据、金石学、甲骨文等方面多有建树。然而与他的学术成果越作越多一样,他的思乡之情也随之越来越浓。1916年,日本

① 《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9页。

京都物价飞涨,王国维的日常开支受到了影响。这也就促使他作出回国的决定。这时上海已有新职在等待着他。他最终选定了1916年的春节期间启程。由于王国维的回国,罗振玉所办的《国学丛刊》也只能停刊了。

正月初一,王国维向罗振玉一家贺岁拜年,并辞行。次日,他携长子潜明回国。在返程的船上,王国维在日记中写道:“舟行至中国近海,风浪渐平。”这一自然情景似乎表达了王国维的主观意向,“风浪渐平”正是他所希冀的读书环境。

第六章
重归沪上

1916年2月9日下午2时许，王国维所乘坐的轮船徐徐停靠在三菱码头，客居异国他乡4年多的王国维终于又回到了他事业的起步之地——上海。回沪后，王国维暂住老友樊炳清家中，尽管他居未定所，工作却是早已定下了。还在回国前，同乡邹安已为他谋了一个职位，去编辑一个学术刊物，这对当时思乡之情甚浓的王国维来说颇为诱人，他在京都时就同意应聘这一工作。所以他这时的回国，可以说是前来上海就任新职的。

王国维所要编辑的这个学术刊物有些特别，它与一般学术刊物的不同之处在于老板是一个对中国学问一窍不通的外国人，他就是哈同。当时的上海有冒险家的乐园之称，哈同无疑是这一冒险家队伍中的重要一员，我们只要从他拥有近代上海最大的私人花园这点上就可以有所了然了。王国维正是因为担任这一刊物的

编辑工作而走入了这个名为爱俪园的私人花园。

哈同(Silas Auron Hardoon),英籍犹太人,1847年出生于巴格达。他的父亲是沙逊洋行的小职员,生有6个子女,哈同是他的第五个孩子。老哈同于1854年被调往印度沙逊总行工作,全家迁居孟买。哈同长大后,老哈同托朋友将他安排在地处香港的沙逊分行谋生。哈同到达香港以后,生活异常艰难,白天打杂,晚上借宿在洋行的走廊里,收入难以糊口。为了摆脱困境,他决定去上海寻找机会。上海是沙逊总行的另一个分行所在地。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作为中国第一批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沙逊总行遂于1845年在这里设立分行。1854年以后,随着上海公共租界的扩大,沙逊洋行在新辟的租界里建造起了高楼。它最初在中国的主要业务除继续经营鸦片贸易外,兼营棉纱、棉布进口以及房地产投资和保险代理等业务。初到上海的哈同,仍然投奔于沙逊洋行。在这里,他的运气显然要比在香港好,他依靠犹太同乡的帮助当上了沙逊洋行的看门人,总算有了职业。一年以后,又凭着自己的乖巧,升任业务管事。80年代,他又利用中法战争之机为沙逊洋行在房产交易中赚了许多钱。但是洋行老板却并没有因此给他多少好处,他心中颇为不平。正在这时,后起的新沙逊洋行(老沙逊的儿子依莱亚斯·沙逊于1872年独资开办的另一家沙逊洋行)对他的“才能”特别赏识,并答应聘任哈同为大班协办。1886年,哈同正式转入新沙逊洋行,开始了他的阔老生涯。此后,法租界当局特

聘他为租界公董局董事，以表扬他维持租界市面的“功绩”，这在当时的法租界是最高的“荣誉”了。他还担任过4年的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在他进入新沙逊洋行那年，与法国水手罗路易的女儿罗迦陵结婚。此后，他事无巨细全都听命于被称为“院长”、后又被尊称为“老太太”的罗迦陵，哈同口口声声说他夫人相夫有术。夫妇俩沆瀣一气，与官僚拜把，全力中饱私囊。同时，他们在上海滩又干了不少沽名钓誉的事，筑房修路，刊印佛经和学术刊物，创办学校，发起学会，他们极尽附庸风雅。

租界向西扩大以前，哈同就在静安寺以东至南的地区占地200多亩，以后从中划出50多亩地，由罗迦陵和黄宗仰规划修建园林。园林建成后取名爱俪园，又称哈同花园。但花园建好不久，罗迦陵就嫌地方太小，哈同又在其四周强行圈购土地100多亩进行扩建，1910年扩建工程完毕，整个花园共占地170多亩（位于今延安中路、同仁路口，现为上海展览馆）。园中亭台楼阁有100多座，还有小桥流水，在当时的上海很有些名气。1914年园中办起了学校，校名为“中华佛教华严大学”。罗迦陵延请杭州海潮寺的主持应乾及各地高僧、居士前来讲法，招有僧徒100多名，开设国文、佛经、历史、地理、算术、小学等课目。华严大学办了没多久，罗迦陵在其手下人的建议下，将学校名改为仓圣明智大学，并拨款二三十万元，扩建校舍，设有大学、中学、小学部以及女学部。学校占地十多亩，除了教室和寝室外，还有图书馆、彝器室、武器馆、礼乐

器馆。尽管学校名为大学,但它的大学部是很不完备的。初办时并没有大学正科,预科也还在筹备中。所以只有其中的附属中学和高级小学在上课。到20年代初,学校的大学部除了预科一、二年级之外,正科只有一年级,学员仅有几人,预科生也不到20人。校名中的"仓圣"二字指的是传说中造字的仓颉,这是爱俪园管家姬觉弥的别出心裁之举。校长由姬觉弥担任。监督(副校长)则为喻长霖,他是湖北人,清末一甲三名进士。他们尊奉造字的仓颉大圣,礼堂上立了仓颉、史籀、程邈、史游、许慎、钟繇、李阳冰等人的像。学校的招生日期也按旧例,在每年的农历正月,而不是公历7月。学校强调文字学知识,其所印的初级小学课本有《小学字学课图解》,中学课本有《说文解字》、《六书赋》、《四体须知》等。当时附中学生在学习中所做的题目就有"韩柳文派异同论","明季三大案评议","唐高祖(李渊)臣突厥,后晋高祖(石敬瑭)臣契丹,事迹相同,何以成败相反论"。这些题目要未成年的中学生去回答,的确难了一些,但却也反映了学校对文史等科目有较高的要求。由于入学不用交学费和伙食费,因此来读书的学生还是不少的。后来成为画家的徐咏青、徐悲鸿都曾在这里读过书。

1916年,园内又办起广仓学会,广仓学宭,所谓"广仓"与仓圣明智大学中的"仓圣"含义相近,提倡人们去学习仓颉的学说,表现对仓颉的崇尚。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扩大影响,至于如此提法是否合理却没有人去多加考虑。主持人除了姬觉弥外还有邹安。邹

安，字景叔，王国维的同乡好友，编有《周金文存》，与罗振玉和蒋伯斧等人相熟。学会除了下设广仓学古物陈列会和广仓学文会，还办有学术刊物。最初为确定刊物的编辑人选着实让他们费了一番心思，因为在他们看来，合格人选应该既是学术界的权威，又要适应潮流，懂得近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商讨了许多人选之后，邹安提出让王国维来主编，由于王国维所具有的很高的学术声望，最终邹安的建议很快就被采纳了。1915 年的冬季，邹安把约请王国维来爱俪园工作的信寄往京都，接到信后王国维随即表示同意应聘。于是，就有了前面述及的回沪之旅。

王国维抵沪后，经过与姬觉弥等人的磋商，最终确定所办刊物的分工：一、《学术丛编》由王国维主编，以研究经学、小学、史学为主；二、《艺术丛编》由邹安主编，内容以金石、书画、古器等为主；三、《仓圣大学杂志》由况夔笙主编，相对丛编而言内容较浅显。随后，王国维就投入了具体而又紧张的工作。他的家眷也由海宁来到上海与他团聚，当时他把家安置在大通路吴兴里 392 号。1916 年的 4 月，《学术丛编》第一册印行出版，此后每月出一册，每册约 80 页左右，前后共印行了 24 册。1918 年又将丛编分为两集，每集 16 册，更名为《广仓学窘丛书甲类》。其中内容主要涉及古代经籍、制度、文字、音韵等诸多方面的考据性文字，既有新著作，也有未刊或已刊过而流传很少的旧著作。他曾在丛编第一册中阐明了这一刊物的宗旨，即：“专在研究古代经籍奥义及礼制本末，文字

源流,以期明上古之文化,解经典之奥义,发扬古学,沾溉艺林。"在刊出的52种著作中,有24种出自王国维的手笔,计有:《周书顾命礼征》及后考、《乐诗考略》、《裸礼榷》、《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释史》、《毛公鼎铭考释》、《史籀篇叙录》、《汉代古文考》、《魏石经考》、《流沙坠简考释补正》、《汉魏博士考》、《两周金文韵读》、《唐韵别考》、《音韵余说》、《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太史公系年考略》、《宋史忠义传王禀补传》、《永观堂海内外杂文》,其中聚集了他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著作。在《丛编》编辑过程中,王国维不仅要自己写作,就采用哪些已刊著作作出决定,而且还承担了具体的编辑工作。特别是他的著作中时常要采用一些古字以说明问题,为了避免差错,他都自己誊写,丛书中就有6种是根据王国维手稿影印的。由于王国维的加入以及他所作出的努力,《学术丛编》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并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一些日本学者闻知后还特意前来购买。

丛编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水准,也是与王国维坚持自己的办刊原则分不开的。王国维第一次去爱俪园是他从日本抵达上海后的第四天,随着以后几天的了解,使他对自己将来的工作状况感到不满和不安。因为在王国维看来,哈同花园内"办事毫不合理",所谓的圣仓明智大学当时仅有中学两个年级和小学;而将要办的杂志所提倡的"仓颉之教",完全是"荒谬不经随口胡诌之说",邹安对

此也觉得很可笑。而最使他感到的不安，来自于姬觉弥这个人。在初次接触中，王国维感到此人将会很难相处。因为从姬的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到，与他没有学问，没有办事用人方法的缺陷相比，他的主意却很多，而且会随时改变。因此，为了使丛编的编辑工作不受干扰，王国维通过写信向姬觉弥提供了办刊的两种办法：一是"包办之法"，他把刊物编辑工作全部揽下来，包括撰写经学、小学（文字学）专题的文稿，编辑史学的征文和已刊书籍的选录，随后按月交稿付印。二是他只承担两个学科门类的工作，所撰写的文稿其他人不得过问。并指出，不管采取那一种方法，都不能在园中办事，也不必常常去爱俪园。如果这两种办法都不能被采用，那么编辑工作也只得作罢。[①] 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谈及此事，说他与姬觉弥等人的交涉近乎强硬，"然未尝形于辞色"。[②] 让王国维颇感意外的是，姬觉弥居然同意按第一种办法做，这其中很可能是王国维的学术地位起了作用。但是即使如此，在办刊过程中，横遭干涉的事情仍有发生。当丛编第三册已装订成样本的时候，园中有人提出其中没有字学（即没有仓颉之学），坚持提出要加入相关内容。王国维迫不得已地只能从《流沙坠简》中抄录了《仓颉篇残简考释》增入第三册才算了事。这年还由于爱俪园主人提供纸张

① 《王国维全集·书信》第52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 同上，第55页。

不足,一度使每月出一本的丛编严重脱期。对此,王国维十分不满,与邹安都有离去之意。1916 年年末由邹安直接与姬觉弥交涉。当时邹安向姬通报,1917 年他不能再留在上海,只能在杭州为《艺术丛编》提供资料,而王国维将赴日本。邹安在申明王国维的态度时说得很明确:由于学术宗旨不同,编辑工作受到干涉,而且又听说经费支绌,请允许王先生赴日本之约。听了邹安的一席话,姬一反他曾有过的冷言冷语,竭力挽留他们。据王国维推测,姬的态度改变,很可能是因为丛编颇受好评的缘故。对此,王国维则重申了办刊的条件。他在告知罗振玉的信中说:"只以今年所出报为明年报之榜样亦无不可。总之,无论如何,明岁一年中小淘气必有之,大则或可无他事也。"[①] 于是丛编又办了一年。在办丛编的两年中,王国维完成的著述可以称得上量多质高,他自己认为,在上海的生活工作要比在日本紧张得多,丛编对他的促进是不言而喻的。

《学术丛编》停刊后,王国维除了仍在编辑处担任编辑工作外,还被聘任为仓圣明智大学的教授,承担了预科班的经学课程。当时王国维在学校里很受尊重,学校举行仪式时,他就坐在校长和教务长的身边。有关他在仓圣明智大学的记载很少,从王国维给罗振玉和长子潜明的信中可以得知,他在仓圣明智大学任教约有 5

① 《王国维全集·书信》,第 170 页。

年的时间，直至1923年年初学校停办。在前半段时间里，他既担任编辑工作又要教书，身兼二职。1920年年初，哈同花园的账房先生因账面亏空三四万元而逃走，院内资金骤然短缺，编辑处的人员被裁去不少，仅剩下王国维和邹安等三四人，编辑处的工作变得越来越清闲。但学校仍保持原状。这年的春节过后，学校增开了国学有关课程，王国维因教学的需要离开了编辑处，成了仓圣明智大学的专职教师。曾在这所学校附中读书的蒋君章后来回忆说："王静安先生的学问，直到现在还被人赞佩。我曾在窗前静听他的讲学，但见他嘴唇上下翕动，声音细小，咫尺之间也听不清楚，这也许我当时程度太低，听不懂他的话的关系吧！"[①] 蒋君章的一番话，多少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由于大学部的不完善，前来听课的学生程度不高，所以很难理解王国维的讲课内容，这与他后来在清华国学院的上课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在编辑《学术丛编》和担任仓圣大学教授的几年中，王国维为谋生不得不时常出入爱俪园，然而这也仅限于一般的工作往来，与爱俪园主人并无多少私人联系。1922年8月，王国维曾在给长子潜明的信中写道："今年哈园大做寿(哈同夫人60岁生日做寿)，出月连日应酬，颇较上课为苦也。"[②] 这其中反映了王国维的书生本色。

---

① 蒋君章：《仓圣明智大学的回忆》，见《追忆王国维》第43-43页。
② 《王国维家书》，见《学术集林》卷十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

王国维在日本时已完成了他学术之路上的第三次转变,把研究古文献、古器物作为他的学术重点,并取得了佳绩。回到上海以后,他把这一研究又推向了新的高度,为我国的学术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在甲骨文方面的成就将在下一章中单独叙述)。

1916年8月,王国维所完成的《毛公鼎铭考释》在他这一时期的著述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这种特殊地位并不是指这一著作获得了多大的学术成就,而是在于文中体现了王国维所应用的慎密的考证方法。毛公鼎为西周晚期宣王时的青铜器,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在此前后,陕西地区还先后出土了西周时代的盂鼎和克鼎。从形体上来说,盂鼎和克鼎都要比毛公鼎大得多,尤其是盂鼎高约1米,重达150多公斤,但是毛公鼎的特点在于其鼎身刻有的文字最多,共32行,连重文492字,比盂鼎和克鼎分别多出201字和202字,这是传世青铜器中最长的铭文。文中记述了周王策命毛公厝,告诫他效忠王氏及予以褒赏的经过,这为周代史事与制度文物研究,尤其是在经济制度的研究上,增添了新的研究资料,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王国维在文中对毛公鼎铭文作了详尽的考释,并且把研究重点放在考证那些学术界还未确定的字上。在《毛公鼎铭考释序》中,王国维对自己在考释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作了归纳,他说:

自周初讫今垂三千年,其讫秦汉亦且千年。此千年中,文

字之变化，脉络不尽可寻，故古器文字有不可尽识者，势也。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汉，音亦屡变。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义有不可强通者，亦势也。自来释古器者欲求无一字之不识，无一义之不通，而穿凿附会之说以生。穿凿附会者非也，谓其字之不可识、义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文无古今，未有不文从字顺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读之，能解之。《诗》、《书》、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难读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现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①

王国维在这里所谈的研究方法是他自己在亲身实践中得出的，他在后来的文字研究工作中都采用了这种方法，从而获得了一系列的重大学术成果。其中强调研究古文字要以了解“其时代之情状”为前提，表明了他学术研究所注重的综合性与全面性。他的这一认识，实际上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科学总结，其重要意义就在于确

① 《王国维文集》第4卷，第110页。

立了近代的科学考证方法。当他完成《毛公鼎铭考释》后,写信给罗振玉说:这一著作尽管新识别的字不多,但是在研究方法上"颇开一生面"。

稍后完成的《魏石经考》就是应用科学研究方法的成功之作,也是王国维自认为比较满意的一部著作。这里所称的石经,就是刻在石碑上的儒家经典。在没有印刷术的年代,人们阅读儒家经典只能靠手抄笔录,而在转抄的过程中很容易出差错,或是漏字、增字,或是抄错,这就造成同一部经典的不同抄本会有出入。为了避免以讹传讹,古代用石刻经典作为官方定本,供读书人抄阅、勘误,于是就有了石经。王国维所要考证的魏石经的石碑立于公元241年,为三国时代的魏国曹芳正始二年,史称"正始石经"。它的碑文是用古文、小篆、汉隶3种字体刻写的。石碑中经文有3种字体,又称"三体石经"。由于年代久远,石碑严重损毁,留下的实物残缺不全,使后人难以了解石经的全貌。清代以后有多种考证石经的著作,但这些著作大都注重于经书的源流和考证文字上,而对魏石经本身的了解仍然是模糊不清的。比如当时就没有人说得清魏石经的经典和石碑的确定数字。于是王国维便开始了这项考证工作。

然而他考证魏石经却是从汉石经入手的。汉石经的产生早于魏石经60多年,立于公元175年,即东汉熹平四年,灵帝下诏同意蔡邕正定儒家经本文字的奏议。于是蔡邕等人命工匠将刻有多部

经典的石碑竖立在太学(古代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门前，其中的经文都采用隶书一种字体刻写，史称“熹平石经”。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石经，同时也是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汉魏两种石经所处的位置在同一地区，其遗址都在今河南偃师，相距很近，而且时间相隔也不远。因此王国维认为，历史上对魏石经的不同记载有不少是由“互误”造成的。因此考证魏石经应该从汉石经开始。他首先参阅了大量材料，来确定汉石经的经数和碑数。根据记载，汉石经的经数和碑数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关于石经数，《后汉书·灵帝传》、《卢植传》、《儒林传序》都说是5部经典，《蔡邕传》、《儒林传》张驯下则说有6部经典，《隋书·经籍志》却说是7部经典。所刻写的经典书目，《洛阳记》提到《尚书》、《周易》、《公羊传》、《礼记》、《论语》5种，《洛阳伽蓝记》举出《周易》、《尚书》、《公羊》、《礼记》4种，《隋志》则举出《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7种。至于石碑数，《西征记》的记载为40碑，《洛阳记》为46碑，《洛阳伽蓝记》为48碑，《北齐书·文宣帝纪》为52碑。王国维通过考证认为，汉石经的经数应以《隋志》的记载为准，即7种。石碑数则以《洛阳记》最为确定，为46碑。

魏石经的经数和石碑数与汉石经一样也不确定。据《西征记》和《洛阳伽蓝记》记载，魏石经所刊的经典为《尚书》、《春秋》两部。而《旧唐书·经籍志》中却收有魏石经的《左传》经文，因此王国维认定魏石经中除了《尚书》、《春秋》这两部经典之外还有《左传》。但

是根据史书记载的3种不同说法,即25碑、35碑、48碑都不能容纳用3种字体刻写《尚书》、《春秋》、《左传》的全文。于是,他通过释读部分出土的魏石经残石拓本,来确定魏石经每行字数,以每行字数,推定每块碑文的行数,以及字数。然后又以《西征记》、《洛阳伽蓝记》等书所记载的碑数及碑文中各经的字数,互相参证,从而确定魏石经的经数。根据王国维的推算,当时每块石碑上的文字约为4200字,如果用三种字体将《尚书》、《春秋》、《左传》刻在石碑上,需要150块石碑才能容下。这不仅与史书记载不同,而且也不是正始年间所能办到的。由于隋以前的史籍记载中没有《左传》,而核定的石数又容不下3本书。因此王国维认为,魏石经中的《左传》内容还不到全书的十之二三。对于石碑数的3种说法,王国维取的是35碑说,他认为,25块碑无法容纳《尚书》、《春秋》两书,而48碑则是汉石经的经数。完成这一工作,王国维大约花了四到五个月的时间,最初《魏石经考》有8个篇目,依次为:《汉石经经数石数考》、《魏石经经数石数考》、《魏石经经本考》、《魏石经拓本考》、《魏石经经文考》、《魏石经篇题考》、《魏石经古文考》、《魏石经书法考》。后来,王国维作了一些调整,在将此文收入他的学术文集时,删去了后3个篇目。整个研究是在实物资料十分缺乏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王国维能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得出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并把魏石经的基本状况勾勒清楚是十分不易的。

正是由于王国维既具有深厚的功力,又掌握了科学的方法,

所以他才能够发现别人所没有发现的东西，并且纠正前人的错误。他在对《史籀篇》作疏证的过程中，就根据自己的研究所得改写了前人2000年来的成说。《史籀篇》是我国古代的字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行文为四言韵语，共15篇，已亡佚。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认为，史籀是周宣王的太史官，《史籀篇》为史籀所作，是周朝史官教学童识字的课本。稍后许慎作《说文解字》，书中收录了籀文(或称大篆)223字，并在他的序中接受了班固的说法。此后这种看法就成了定说，并认为籀文是这一时期字体演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一时期字体的演化过程是：从古文演变为籀文，由籀文演变为小篆，再由小篆演变为隶书。王国维在《史籀篇疏证序》中对这一定说提出了两点质疑。其一是对史籀为人名提出疑问。首先王国维引用了《说文解字》对“籀”与“读”这两字的解释，并根据《方言》和《毛诗·鄘风传》确定两字的读音，得到的答案是，古代“籀”与“读”二字同音同义。而古代读书一般是太史的事，因此，“史籀”就是“太史籀书”的意思，即为太史读书。古代作字书一般以“太史籀书”为句首，以目下文。对此，王国维进一步指出，那时通常以句首二字作为书名，这是当时的通例，如《诗经》、《尚书》以及先秦时代各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都是如此，于是后人用句首的“史籀”为篇名。而班固等人正是把“史籀”误认为人名了。其二对《史籀篇》的成书年代提出疑问。王国维认为，籀文是位于我国西部的秦国所用的文字，而许

慎《说文解字》收录的古文则是同时期东部六国使用的文字。《史籀篇》一书为秦国人所作,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而不是周宣王时期(公元前 804 - 782 年),它是用来教授学童的,但并未在东部六个国家中使用。因此,籀文与古文两者存在着诸多的不同。为了更好地说明“古文”这一疑难问题,王国维又撰写了《汉代古文考》3 卷,后经改定,按分篇别出,标题也稍作改动,收入了他的学术文集中。这一组文章共有 9 篇:《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史记所谓古文说》、《汉书所谓古文说》、《说文所谓古文说》、《说文今序篆文合以古籀说》、《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考》、《汉时古文诸经有转写本说》、《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蝌蚪文字说》。王国维指出:正像古代东部六国不流行《史籀篇》一样,在齐、鲁、赵、魏等六国广为流传的《礼》、《乐》、《书》、《诗》、《易》、《春秋》六艺之书在秦国也很难见到。而这些书都用东方的文字书写,即所谓的古文。从当时的情况看,秦国的文书中有大篆无古文,而东方各国的文书则用古文不用大篆。所以,古文和籀文是战国时期东西部地区所使用文字的不同名称,其源头都来自殷周古文。自秦灭六国以后,秦王朝强行统一文字,六国文字也就被废止了。到汉朝时期,人们因为六艺之书所用的文字在当时已不用,所以称它为古文。久而久之,后人因古文这一名称而把六国古文与殷周古文合二为一了。所以才误认为先有了古文,尔后才有籀文和小篆,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也犯了同

样的过失。王国维的结论不仅使史籀作大篆的说法不能成立，而且也澄清了汉字发展史中认识上的误区，这无论对古文字研究，还是对古史研究来说都是重大的突破。对此，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一些学者表示怀疑。但是后来人们把新发现的楚墓残简及朱书玉片与魏石经中的所谓古文相对照，印证了王国维的看法，他的结论也就成了定论。著名学者胡朴安在他的《中国文字学史》中说：王国维的观点很有价值，“籀书为读书，证之字义，颇为可信。籀文为西土文字，《说文解字》中之古文，为东土文字，考之字形，亦极有据。”“二千年来，世无异论之籀文，至此已不能成立，此古文字学一大翻案也。”①

如果说在初到日本时王国维的古史研究还处于他后期学术事业的起步阶段的话，那么，由日本回到上海以后，他的研究工作无疑又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除了王国维自身的努力之外，在与学友间的交流中得到了很大的帮助，这也是他获得突出成就的重要因素。在这种交流中，罗振玉给他的支持仍然是最大的。从1916年至1919年的3年多时间里，王国维在上海，罗振玉在日本，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极为频繁。王国维常常是前一信札刚邮递出，因意犹未尽，第二封信又接着寄出。从他给罗振玉的信函看，既有涉及家事的话题，也有谈论局势的文字，但信中绝大部分内容

① 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第606页，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年版。

是探讨学术或与此相关的问题的。两人虽隔万顷东海,但学术上的合作并未中断。王国维在爱俪园主持的《学术丛编》以及《艺术丛编》刊登了罗振玉的不少成果。而王国维的许多重要论著都是在多次反复地与罗振玉交换意见后,再加以改进的。他在写《魏石经考》的整个过程中不断写信给罗振玉交换意见。其实,在这段时期里,王国维作每一项研究几乎都要同罗振玉商量,倾听罗的意见。除了早期他父亲王乃誉外,罗振玉在王国维学术生活中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

在上海,与王国维有着密切交往,并在学术上给王国维带来较大帮助的不能不提到沈增植。沈增植,浙江嘉兴人。字子培,号乙庵,光绪朝进士。在清朝政府中曾先后担任过刑部主事、郎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署江西按察使,护理安徽巡抚等职。在刑部18年,专研古今律令之书,中国传统之学的造诣很深。中年以后,主要研究辽、金、元历史,以及西北历史地理,被清朝遗老们推崇为光绪、宣统年间的"硕学通儒"。1915年春天,王国维回国扫墓,途经上海时曾去拜访过沈增植,向他请教古音韵学知识。1916年,王国维回上海后,其新居与在新闸路上的沈家相距很近,于是他们开始频繁交往,两人结下了忘年交(沈增植要比王国维整整大27岁)。1917年初,王国维为沈增植整理诗稿,并一一为之誊抄清楚,以供刊印诗集作准备。当时正值严冬,气温很低,砚池中的墨汁都冻住了,王国维只能用火烘烤,才得以继续书写。从中可见王

国维对沈的敬重。当然，王国维在这种交往中也获益匪浅。他所作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就是在沈增植的直接启发下写成的。在序中，王国维详细记述了他与沈增植谈论这一研究课题的经过，并且在研究中还采用了沈增植的新见解。他赞叹地说：沈的见解"得者极精湛，而奇突者亦多出人矣"。[①]《尔雅》一书是我国古代最早解释词义的著作，共 19 篇。起首 3 篇《释诂》、《释言》、《释训》是古代文献词语解释的汇编。以后各篇按物分类。其中《释草》以下解释动植物的 7 篇，文字艰涩难懂，历代学者为了理解其中内容苦于解读。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的完成，为人们理解书中的这部分内容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以后，王国维对西北地理的研究用功甚勤，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沈增植的影响。1919 年 3 月，正值沈增植生日，王国维特意撰文为其祝寿，对沈增植的学问推崇备至。他认为沈增植对世事的关怀超过了主张经事致用的龚自珍和魏源，在学术研究上的审慎也不亚于乾嘉学派的戴震和钱大昕，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大学者。在学业上，王国维从沈增植那里得到不少教诲，因此他在文中还这样写道："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②] 这可以说是王国维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有感而发。

① 《王国维全集·书信》第 183 页。

② 《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引自《王国维年谱长编》第 274 页。

在这期间,王国维曾先后数次婉拒去北京大学任教的邀请。他在1921年年初给罗振玉的信中谈了其中的一些原因,他说:“马叔翁及大学雅意,与公相劝勉之厚,敢不敬承。惟旅沪日久,与各处关系甚多,经手未了之件与日俱增,儿辈学业多在南方,维亦有怀土之意,以迁地为畏事。”① 正如王国维所说,他在此前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南方度过的,在上海也住了多年,的确有“怀土之意”。而他说的“经手未了之件与日俱增”,也是事实。其中工作量最大的就是为蒋汝藻编书目。蒋汝藻,字元彩,号孟蘋,浙江乌程人,光绪癸卯(1903年)举人。曾任清政府学部郎中总务司行走,后在上海办企业,期间大量收集古书秘籍,藏书达5000多种,为著名的藏书家。他的藏书处名为“密云楼”、“传书堂”。在王国维之前,蒋汝藻先是请缪荃孙的学生曹元忠为其编书目,但进展不大。1919年冬天,王国维开始着手此事,此后,编目的进度明显加快,经过他的细心校勘,最终于1923年完成了《传书堂藏书志》,前后历经4年。此书经王国维收录的宋元明清善本达2700部,其中不仅有书目,还有提要。70年代,台湾大通书局出版的《王国维先生全集》收入了此书,共有25册之多。这是王国维在版本目录学方面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在这一编书的过程中,王国维与蒋汝藻

① 《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13页。马叔衡,即马衡,浙江鄞县人,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

之间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尽管王国维一再推辞北京大学对他的邀请,但北大校方的热情仍然不减。1922年春,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当时由校长蔡元培兼该研究所所长,体现了学校对这一研究所的重视程度。研究所内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4个学门。国学门内又分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5个研究室,请本校教授分任指导。并聘请王国维和罗振玉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通讯导师。由于北京大学的一再邀请,盛情难却,再加上做北京大学的通讯导师不必迁居,所以王国维最终应允了。他在同年12月给国学门主任沈兼士的信中提出了《诗》与《书》中成语之研究、古字母之研究、古文学中联绵字之研究、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等4个研究课题。随后给学生进行了函授指导。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之后，王国维“纪事则言本朝，革命则言国变，圣讳必缺笔而书，留辫表示满清遗民”。他的遗老心态表现得十分明显。在东渡日本的最初一年里，他写下了《颐和园词》、《蜀道难》、《隆裕皇太后挽歌辞》3首长诗。在诗中，王国维说慈禧太后是“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称颂她治国有方，“才略称第一”。对于辛亥时任川汉铁路大臣的端方之死，王国维深表悲哀。那时端方正率领湖北新军前去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在途中被其部下所杀，并将他的头颅盛入木匣，由长江顺流而下，漂流至湖北。王国维就此写道：“首在荆南身在蜀，

归魂日夜西山麓。千里空驰江上心，一时已抉城门目。可怜萧瑟满江潭，无限江南与汉南。莫向翠微旧山色，西风落木归来庵。”[①] 这些诗尽管只是叙述了逝去不久的往事，然而在字里行间却能感受到作者的好恶，以及对旧王朝的眷恋之情，他的思想感情与当时的社会潮流是背道而驰的。他在这前后写下的《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一诗能比较直接地体现他当时的心境，这是他为日本著名汉学家狩野直喜赴欧洲饯行而作。狩野直喜是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好友，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和内藤虎次郎等人力劝罗、王去日本。诗中说：“谈深相与话兴衰，回首神州剧可哀。汉土由来贵忠节，至今文谢安在哉?”[②] 诗中所提到的“文谢”指的是文天祥和谢翱。文天祥是南宋大臣，为抗击元军不屈而死。谢翱为抗击元军，毁家率乡人投奔文天祥，曾任文天祥的谘议参军。王国维感叹为什么没有像文天祥、谢翱这样的人来为清王朝尽忠尽节呢。王国维写下这些诗句的时候，中国正处于袁世凯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袁世凯从革命党人的手中获得权力后，就变本加厉地实行他的独裁统治，直至导演了那出洪宪帝制的复辟丑剧。在王国维的眼中，袁世凯是一个不值得一提的佞臣。尽管王国维自己也希冀在中国能恢复帝制，但他所要恢复的是大清

① 《王国维文集》第1卷，第261页、266页。

② 同上，第264页。

王朝的正统帝制，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则是佞位，是不合法的。因此，当袁世凯在万众的唾骂声中死去的时候，他把这称作是“元凶既毙，大快人心”。这与他后来面对张勋复辟所表现出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张勋,字绍轩,江西奉新人,是一个封建意识很强的旧式军事首领。1884年他在长沙从军,1895年投入袁世凯门下,担任的最高官阶为总兵。1902年任慈禧太后、光绪帝的扈从。直至辛亥前夕,他历任过云南提督、甘肃提督、江南提督等官职。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率领所属队伍与准备起义的南京新军第九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后来被江浙革命联军击溃,退守徐州。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期,张勋所属的部队改称武卫前军,驻扎在兖州。为了表示仍忠于清室,他不仅自己留着长长的辫子,而且还禁止所属部队的官兵剪发,因此,他被称为“辫帅”,他的武卫前军也被称为“辫子军”。张勋曾于1913年4月谋划拥戴溥仪复辟,因计划事先败露而没能成事。1915年袁世凯称帝,张勋先是对袁的这种举动感到有所不满。但是当蔡锷打出护国的旗帜讨伐袁世凯时,张勋又转而拥护袁世凯。1916年他由长江巡阅使调任安徽督军,并在这年9月的徐州会议上被推举为“十三省区联合会”的盟主。此后他开始加紧复辟帝制的策划。张勋的登场给担忧没有军事力量支持复辟势力的遗老们带来了希望。王国维就认为,只要有张勋的锲而不舍,复辟之事就会有所作为。

1917年春，北京政府总理段祺瑞宣布对德国绝交，企图强迫国会通过参加对德作战的参战案，遭到代表英美势力的总统黎元洪等人的反对，引发了府院之争。5月，张勋在徐州邀请七省督军谋划倒黎，解散国会。随之，当黎元洪罢免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之后，张勋便煽动各省督军宣告“独立”。6月，张勋以调停黎段矛盾为名，带辫子军3000人进京。随后，张镇芳、雷振春、梁鼎芬、康有为、沈增植等军阀、遗老都聚集北京，策划复辟。6月30日，张勋等人潜入清宫，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当晚发动政变。深夜，辫子军占据城内各要地，并派代表劝总统黎元洪下台。7月1日，张勋换上清朝冠服，率领拥护复辟的文臣武士300余人，前往清宫，拥溥仪“登极”。随即，连续发布“上谕”，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易五色旗为龙旗，恢复前清官制，中央设议政大臣、内阁，各省督军改称巡抚或总督。张勋自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并通电各省，劝告响应，黎元洪被迫逃入日本使馆避难。复辟消息传开后，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宣言，号召讨伐张勋。皖系军阀段祺瑞接过反对复辟的旗号，组织“讨逆军”，于7月3日在天津附近的马厂誓师，分两路进攻北京。辫子军的人数不过二三千人，而且毫无战斗力可言，因此面对大军压境之势，只能是丢盔弃甲地败下阵来。据说辫子军兵败溃逃时，扔下了许多辫发与鸦片烟枪。12日，张勋逃走，溥仪再度

宣布退位，复辟前后仅12天，即宣告失败。

在张勋复辟前后的这段时间里，王国维一直关注着张勋的活动，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把所得到的消息一一写信告知当时还在日本的罗振玉，并不时地发表自己的看法。1917年年初，王国维乘船赴日本，与罗振玉一起过春节。2月5日（正月十四日）由日本返回上海。抵沪的第二天，他就有信给罗振玉，通报国内的政治情况。在2月23日的信中，王国维谈了他对张勋的看法。他写道："今日在逊座见某小将，乃黄楼之人……闻其语黄楼事，觉黄非无心肝者，亦尚有布置，唯魄力似不如外间所言之大耳。"（信中所说的黄楼即指张勋）王国维说张勋不是一个无心肝的人，是因为他得知了张的复辟"布置"，但王国维还是觉得张勋的活动不够有力。二三月间，升允已从日本带回了日本首相寺内正毅支持张勋复辟的消息。日本人佃信夫又来徐州支持张勋复辟。王国维知道这些消息后，在4月4日的信中说："知黄楼一局已大有进步，曼倩（日本）亦相敦促，以期造成一世界潮流。"6月，张勋有所行动，王国维说但愿张能稳健从事。6月下旬，与王国维交往密切的沈增植和康有为起程前往北京，为张勋策划复辟。他们的这次出行不为外界所知，王国维也不知情。因此王国维于29日前去沈增植家拜访当然也就没有遇上。他在30日的信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其（沈增植）家人云已于初八日赴苏。询其何时返沪，则云尚有耽搁，询其与何人同行，则云朱某其人乃常

奔走于康、沈之间者。而今日报纸载对山（康有为）已到京，或此老亦向北行耶？……近日报纸于横渠（张勋）事所记甚略，或暗中有动作乎？”王国维这种推想很快就被报纸所证实了。但是复辟是不得人心的，张勋在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7月6日，当张勋复辟处于不妙之时，王国维写信对罗振玉说：“今日情势大变，北军已多应段（祺瑞），战事即将起于京津间，张军中断，结果恐不可言。北行诸老（康有为、劳乃宣、刘廷琛、沈增植等人）恐只有以一死谢国。曲江之哀，猿鹤沙虫之痛，伤哉！《申报》与《时事新报》二种另行寄上。不忍再书矣。”尽管王国维十分不情愿地去叙说这一令他十分伤感的事情，但不多的言语却真实地反映出了他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按照自古以来遗老的思维定式，王国维只能为康有为等人预先设想好以死殉节的结局。复辟事败不久，王国维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而且还对局势的发展作了预测，他说：“此次之变，段（祺瑞）、冯（国璋）、梁（启超）三人实为元恶，冯思为总统，段则欲乘机以恢复其已失之势力，梁为幕中画策人。然其结果已可逆睹，首则必为国会与冯、段之争，而国会与民党必败；继则为冯、段之争，为军人与进步党之争，此种局面不能支持一年可预决也。人心险诈，乃至天理尽绝。”[1] 在辫子军遭到重创后，张勋逃入荷

[1] 以上见《王国维全集·书信》第178页、186页、195页、197页。

兰使馆。当时的报纸刊载了有关情况，并说张勋“言其志在必死”，王国维对此特别看重，由衷地赞叹这种气节，以为这将会给清代的历史增色。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王国维似乎已不再像早年那样坚持要将政治与学术截然地分开了。早年他曾在数篇文章中明确地发表这样的观点，在他心目中做学问家要强于做政治家，他指责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把学术当作了政治目的的手段。他认为，尤其是当时从事哲学与文学的人不重视学术本身的价值，而是把它们视为政治教育的手段，这样就亵渎了学术的神圣性，同时也就无法寻求到学说的价值。所以要使学术发达，就必须把学术看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王国维的这种观点体现出了一种对学术独立的真诚追求。然而他于1917年9月所写的《殷周制度论》却明显地带着政治色彩。他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谈到这篇文章，说：“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这正表明了他的政治用意。在文中他认为，周朝的制度是根据“尊尊亲亲贤贤”的道德观念来制定的，而这种观念是治理国家的“通义”。因此，周朝实行天子、诸侯世袭，他们的属下卿大夫不世袭，这是十分合理的。他解释说：因为天子与诸侯是有土地的人，如果他们不实行世袭的方式传子立嫡，就无法平息激烈的争夺。而卿大夫这类权力机构中的管理人员是“图事之臣”，如果不以贤明任用，就无法治理好国家。这种认识表明王国维是把周朝

的制度当作政治理想来看待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张勋复辟失败之后不久，表达了他对传统君主制度的向往。[1] 这样的思想倾向直至王国维逝世都没有改变。

① 此文的学术意义将在下章述及。

第七章
甲骨学上的新贡献

王国维从日本回到上海以后，仍沉浸在古文献的研究工作中，由于他的辛勤努力，研究成果源源而来。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成果当属他的甲骨文研究。特别是他写出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续考》等重要的科学论文，使得甲骨文的史料价值为举世公认，而且推动甲骨文研究真正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讲到甲骨文，我们首先要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商王朝。

商朝是以商丘这一地名而为国族名的，商族最初活动范围主要就在河南、山东一带。契为商的祖先，公元前 16 世纪汤为商王时，商已成为一个较强盛的新兴奴隶制国家。商打败了夏朝暴君桀，灭亡了夏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在亳建都，即今河南商丘或偃师一带。从汤到盘庚，共有 18 个国王，前九王统治时期政局比较稳定，后九王统治时期，被称为“九世之乱”。为

了摆脱“九世之乱”的混乱、困难局面,商王采取了迁都的办法,但直到盘庚继承王位以后,才将商都迁到了位于黄河中游、洹水之滨,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有重要地位的殷。迁殷以后,商朝政治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后来从盘庚迁殷到纣灭亡,共计273年,商的国都一直在殷,再也未有变动,所以迁殷以后的商朝又称殷朝或殷商。

公元前11世纪,殷商王朝的最后一代帝王纣被西周灭亡,殷都在战乱后变成了荒无人烟的废墟。当时滚滚黄河水逆洹水而西去,洹水两岸变成一片泽国汪洋,大水退后层层淤泥河沙叠起,年长日久,殷墟遗址被泥沙毫不留情地掩埋在地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殷墟渐渐被后人遗忘了,殷商文化淹没了。殷人前后273年所创立的业绩和丰富灿烂的殷代文化,一直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到近代才被重新发现,而其中甲骨文的发现开启了数代人寻觅殷人的帷幕,揭开了历史之谜。

公元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以前,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农民在农田耕作时,常常挖掘出古老的龟甲兽骨,并将这些甲骨当作“龙骨”药材卖于药铺,也有人将“龙骨”刮削成粉末当作医治刀伤用的“刀尖粉”,正是在这样的挖掘和医药制作中,大量珍贵的甲骨文资料被毁弃了。直到1899年,任翰林院国子监“祭酒”一职的王懿荣第一个开始搜集、鉴定这些刻着符号图案被称之为“龙骨”的甲骨,同时期这些文物也引起了其他学者的重视,此后,这些宝贵

文物的命运才开始改变。王懿荣(1845～1900)字正儒,号廉生,山东福山人。清末进士,授翰林,为我国著名的金石学家,著有《汉石存目》、《福山金石志》等著作。据传当时王懿荣正患疟疾,服的中药里就有"龙骨"这味药。当他在检药时无意发现药中的龙骨上居然刻有字,意识到这些龙骨的年代一定很久远了。通过初步考订,他断定这是商代的遗物。于是便不惜重金大量收进,正如王国维后来所记:甲骨"初出土后,潍县估人得其数片,以售之福山王文敏懿荣。文敏命秘其事,一时所出,先后皆归之"。在此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搜集到1500多块甲骨。在这些甲骨上契刻着各种形态的符号,这就是甲骨文。殷人在龟的背甲腹甲或牛的肩胛骨、鹿的头骨、虎骨,甚至在人头骨上刻划上象形字和符号以用来占卜,占卜的内容包括祭祀、征战、农事、田猎、气象、年成丰歉、衣食住行、健康疾病、婚丧嫁娶。占卜用的是龟甲和兽骨,占卜完后要把所占卜的内容经过、结果等用青铜刀契刻在甲骨上。这种篆刻的技术非常高,字大的约半寸左右,字小的细如芝麻。且所刻的文字早已脱离了原始图画阶段,是事物简化后的语言符号,是具有严密规律的文字,这些文字就被称为甲骨文。但最初甲骨文的命名有所不同,有按甲骨质料命名的,称甲骨文为"龟"、"龟甲"或"龟甲兽骨";有按文字书写方法命名的,称为"契文",契即契刻,契文即用刀刻的文字。有按甲骨文的用途命名的,称为"卜辞",因甲骨文是用来占卜的。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的文章中就称之"卜辞"。当然

还有一些其他的称法,如龟版文、骨刻文等,但最言简意明的命名还是甲骨文。正如甲骨文专家胡厚宣先生所指出的:“总之,一切的名称,都不如叫甲骨文或甲骨文字比较恰当。”王懿荣的发现使得人们对这些龙骨逐步重视起来,从而避免了我国这一古代文物被继续大量人为地毁灭,使甲骨学的建立成为一种可能。从1899年甲骨文的被发现、购藏到研究,随后逐步形成了以古遗址出土,供占卜用的有字龟甲和兽骨为研究对象的甲骨学。甲骨文虽然很古老,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但甲骨学却还很年青,形成至今不过90年的历史。在这不到百年的时间里,甲骨文的收藏者和研究者丰富和发展了甲骨学,使之不仅成为国内学术领域的一门“显学”,而且是一门具有国际性的学问。在甲骨学的发展历程中,学者们前赴后继,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都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如果说,后来王国维在甲骨学的发展中起了跨越性的推动作用;那么,王懿荣则是甲骨学的当然开拓者。

王懿荣死后,由于他在任官期间并没有积累什么财产,反而还留有欠债,他的儿子王翰甫就把父亲生前所藏的古器物卖出以偿清债务。最后不得已将千余片甲骨,一部分赠给天津新学书院,其余大部分都卖给了刘鹗。

刘鹗(1857~1909)字铁云,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居淮安。为清末著名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通数学、医术、水利等,曾任候补知府,后弃官经商。他喜好搜集金石甲骨,是颇有造诣的金石学

家。1900年刘鹗在京城赈灾的同时，因喜好古藏，多方搜购字画碑贴、鼎彝、善本古籍等古器物和古文献，后来就买下了王懿荣所藏的大部分甲骨。除王氏所藏的甲骨外，他还得到方若所藏的300片，古董商赵执斋的3000多片，他的儿子大绅亲赴河南收得的1000多片，前后共得到5000多片，刘鹗在京半年多可谓满载而归，成为早期出土甲骨的著名收藏家。随后刘鹗从他所藏的甲骨中选出1058片进行拓印，并由抱残守缺斋于1903年出版，线装共6册，取名为《铁云藏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甲骨文著录，刘鹗则是使甲骨文最先拓印的出版者。尽管书中的拓片制作不精，许多拓本模糊不清，而且还收入了一些伪片，但这并不影响此书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其最大功绩就在于扩大了甲骨文的流传范围，为甲骨文的研究提供了条件。此书印行的第二年，即1904年，著名的文字学家孙诒让就根据《铁云藏龟》写出了《契文举例》。作者在序中说：当得到《铁云藏龟》一书后，“爱玩不已，辄穷两月力校读之”。尽管作者所依据的仅仅是《铁云藏龟》一书，材料还太少，书中也存在着不少错误。但这本书毕竟是甲骨学史上的第一部研究著作，书中根据卜辞的内容分为10个部分，依次是：月日、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典礼、文字、杂例。在甲骨学研究最初的草创时期，在人们对甲骨文还不甚了解的情况下，作者就能作如此分类已相当不容易了。而且在考释文字方面，也有相当可取之处。

王国维从事甲骨文研究是在跟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以后开始

的,而这时的罗振玉对甲骨文已是颇有心得了。自从罗振玉在刘鹗那里见到甲骨后,便开始对此特别留意起来,并从1906年前后将注意力转向了对甲骨及与甲骨同时出土的各种古器物的研究。可是甲骨文被发现以后的七八年间,人们并不知道这些甲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其中的原因与利益紧密相连。最初这些甲骨作为药材“龙骨”进行交易时是很便宜的,一斤只需6文钱。但自从甲骨文被发现以后,日益引起学者的重视,其售价也随之攀升。在王懿荣购藏甲骨时,“每字银四两”,“每版银二两”,一次付出就达“三千金”。端方购买则“每字筹价银二两五钱”。[①] 当时学者们并不是直接从挖出甲骨的小屯村村民手中购买,而是与古董商交易,因此古董商们为了垄断甲骨的收购从中获利,故意隐瞒了真正的出土地点,有的甚至还把其他地方谎说为出土地点。这就造成了当时学术界对甲骨的出土地点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有说是河南汤阴、或者河南汤阴羑里,也有说是河南卫辉(汲县)。为了搞清这一疑难问题,罗振玉经过细心的探寻,最终于1908年访知到甲骨的确实地点是河南安阳小屯村。确切地点的被证实,对甲骨文的综合学术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同时这使罗振玉可以直接派人去小屯村收购,他因此而获得了大量的实物。仅在1911年二三月间,他派其弟罗振常和范兆昌去小屯村收购,两次运回北京的甲骨就达

① 王宇信:《甲骨文通论》第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2500块。在他一生中,前后所获得的甲骨约3万块。1910年,罗振玉根据所掌握的甲骨文材料写成了《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书中分考史、正名、卜法、余说四个方面对甲骨文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书的篇幅不大,但在考释单字,辨别商代帝王名谥等方面都有相当的收获。书中考释了二三百个单字,而且在一些关键字的考释上有了突破,使不少卜辞可以初步读通。同时在考释中形成了参证《说文解字》来解读甲骨文字的基本方法,这也就为后来的甲骨文考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辛亥以后,罗振玉在日本又有《殷虚书契考释》、《殷虚书契精华》、《殷虚书契后编》、《殷虚古器物图录》等甲骨文著作出版。其中1913年完成的《殷虚书契考释》是在《殷商贞卜文字考》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研究所得的重大成果。全书共6万余字,对甲骨文作了全面系统的考证和论述。通过悉心研究,罗振玉从卜辞中考订了商代君王名22个,人名78个,地名193个。并且从形声义三个方面确认了近485个甲骨单字。由于识字的增多,能通读的卜辞也大大增加。关于商代的都城,其第19代王盘庚以前的历次迁都史书均有记载,学术界的意见也较一致。但学者们对此后商代京邑的地理位置却众说纷纭。罗振玉通过考释,认定甲骨出土的地点河南安阳小屯村就是商代晚期的都城。还初步搞清楚了商代占卜的惯例和方法。正是由于罗振玉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改变了甲骨文不可读的局面。后来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

殷墟甲骨的"审释文字自以罗氏为第一,其考订小屯之为故殷虚,及审释殷帝王名号,皆由罗氏发之"。当然在这其中也有王国维的一份心血,他帮助罗振玉整理甲骨实物及拓墨,并协助罗振玉完成了《殷虚书契考释》。《考释》中采用了不少王国维的看法,王国维还为此书写了前后序各一篇。

在日本,初涉甲骨之学的王国维在研究这门新学问中表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和学识。当时罗振玉在撰写《殷虚书契考释》一书时,发现卜辞中有"王亥"之名,但不知究竟指的是什么。于是王国维翻阅了相关的古籍,根据《山海经》、《竹书纪年》,他断定王亥为商王的祖先,与《世本》中的胲,《帝系篇》中的核,《楚辞·天问》中的该,《吕览》中的王冰,《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中的振,《汉书·古今人表》中的垓是同一个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有相当难度的。前辈学者孙诒让就曾把卜辞中的"王"字误认为"立"字。而"亥"字的情况更复杂。以上所说的古籍在书写"亥"时都增加了偏旁,成为垓、该、核、胲等不同的写法,好在这些字还保留了原字的成分,还有线索可寻。可是《史记·殷本纪》中把核误写为振,就很难找到原形。王国维通过周密的考证,将两者联系起来是十分不易的。王国维的这一发现引起了罗振玉和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的重视。罗振玉随后在甲骨卜辞中继续寻找,结果获得记载王亥内容的文字有七八条之多,并将这些材料编入《殷墟书契后编》。内藤也为此撰文,认为如果能从卜辞中发现由契以下商王各祖先名的话,那

会对古史研究很有益处。于是这就引出了甲骨学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1915年，王国维还完成了《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回到上海不久，他又写成了《殷礼征文》，通过用卜辞参证，对殷商的祭礼进行了探讨。在我国，使用干支的历史已十分久远了。所谓干支，即天干地支，是用作表示次序的符号。天干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总称，或称十干；地支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总称，或称十二支。殷商时期通常是以天干纪日的，从史书和卜辞中的记载看，殷商诸王大都用日干为名号。对此，王国维认为，殷商人的名号是专为祭祀而设的。甲日生的人，后人对他的祭祀也在甲日，因此，殷人的名号有上甲、大甲、小甲、河亶甲、沃甲、羊甲、且甲；乙日生的人，对他的祭祀也在乙日，其名号就有报乙、大乙、且乙、小乙、武乙、帝乙，这些名号都是子孙后来对他们的称呼，不是父母之命。实际的例子就有，商王大乙称自己为“小子履”，周代人称商王辛为受，或受德。因此可知商代诸王生前都有自己的名，而甲乙等号是后人所称，甲或乙前的上、大、小、且、帝等字更是后世所追加的。此外，王国维还论及殷商时期，对诸先王先公及其王后不分亲疏都实行特祭，以及其他祭祀形式。此文是研究殷商祭礼制度的重要研究成果。

1917年，即王国维回到上海的第二年，这是他进行甲骨文研究的不平凡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里，王国维在甲骨文的研究中获得了令学界注目的重要成果。他在2至4月间所撰写的《殷卜

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以及《续考》,通过精心的研究,考订了商代先公的世系,其依次是:帝喾、相土、季、王亥、王恒、上甲、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大乙、羊甲。由于这一世系的明确,使原来无法理解的《楚辞·天问》得到了圆满的解释。在商代先公世袭未搞清楚以前,人们无法理解《天问》中"该秉季德,厥父是藏"和"恒秉季德"之语究竟是什么意思。通过对世系的考定,王国维确定王亥与王恒是兄弟,他们的父亲是季。这样,上述《天问》中"该""恒""季"三字皆有所指,其疑难也就迎刃而解了。在此过程中,王国维还得出了一些重要的认识。其一,他通过卜辞中记载,王恒的祭祀与王亥相同,太丁的祭祀与太乙和太甲相同,认为,在商代兄弟无论长幼,已立未立,其名号典礼都是没有等级差别的。其二,他把甲骨文与先秦古籍结合起来相互校勘,指出,人们对《山海经》和《纪年》内容颇多怀疑,这两本书都有对王亥的叙述,而王亥的名字又见于卜辞,因此书中叙述的有关内容未必全都属实,但至少其中所说的人不是虚构的。通过这一事例,王国维进一步认为,流传于周秦之间的古代传说并非毫无根据。与此意义相似的是,王国维确实在文中纠正了《史记·殷本纪》记载殷先公世系"以报丁、报乙、报丙为次"的一些失误,但同时也说明了《殷本纪》所记殷商帝王的世系大致正确可信。由此也可以确知《史记》所记载的古史同样不是毫无根据的。王国维在完成了《先王先公考》后,将文稿寄给罗振玉,以听取他的意见。当罗振玉看了此文后,惊叹不已,随后于

4月6日写信给王国维说道："昨日下午邮局送到大稿，灯下读一过，忻快无似，弟自去冬病胃，闷损已数月，披览来编，积疴若失。忆自卜辞出洹阴，弟一见以为奇宝，而考释之事，未敢自任，研究十年，始稍稍能贯通。往者写定考释，尚未能自慊，固知继我有作者必在先生，不谓捷悟遂至此也。"[①] 从罗振玉的话语中可见，他对王国维的这一成果是推崇备至的。在甲骨学研究中同样颇有建树的后来者郭沫若，则从整个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认识王国维的这一成就，他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系》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他们的讹传。……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②]从具体的意义来说，王国维论文的功绩正是在于把处在研究文字阶段的甲骨学推进到了史学研究的阶段，从而大大提高了甲骨文的史料价值。

在以上的成果中，还包含了王国维的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即甲骨的缀合。所谓甲骨的缀合，就是把破碎的甲骨拼合起来。因为甲骨埋藏在地下已有3000多年，其质地已很脆，所以在出土的甲骨中大都是破块碎片，整块的很少。为了更好的释读甲骨文，领会

① 引自《观堂集林》卷九，见《王国维遗书》第2册。

②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

其文句的意思,做好甲骨的缀合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从事这项工作专业性极强,要有丰富的甲骨学知识。王国维正是在这一方面开了先例。当时王国维正在为哈同整理其戬寿堂所存的甲骨,发现其中一块断片上写有殷先公的名号,内容与罗振玉编《殷虚书契后编》上卷第 8 页的一块甲骨拓片相近,于是把两块甲骨拼合在一起,两者断痕不仅吻合,而且文辞亦相连贯,恰是“一骨折为二者”。这块经拼合的甲骨写有殷王祖先从上甲至羊甲的世系,为王国维纠正《史记》的错误提供了有力佐证。同时这也是一个范例,为后来甲骨的缀合工作提供了借鉴。

王国维所做的另一项与缀合同样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就是断代,即确定年代,这同样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因为只有确定了甲骨的具体年代,才能大大提高甲骨文的史料价值。就大体上来说,甲骨出土于殷墟,说明这些甲骨是商王盘庚迁殷后的物品,即商代后期的物品。然而从盘庚到商朝灭亡其间经历了 270 多年,9 个王朝,要确定这期间甲骨的具体年代就十分困难。在研究过程中,王国维是根据卜辞中的世系称谓来确定甲骨年代的。如,《殷墟书契后编》上卷第 25 页上第 9 片卜辞有父甲、父庚、父辛之名,他就断定这是武丁时期所卜。尽管经他确定具体年代的甲骨并不多,但这对以后甲骨文的断代研究是有启迪作用的。

在撰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的前后,王国维还完成了《殷虚书契待问编简端记》一卷。并代姬觉弥编成了《戬

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其后附有他撰写的释文一卷。9月，王国维的另一篇著名论文《殷周制度论》完成，此文与《先王先公考》注重考据的风格有所不同，史论的特征较为明显。但文章仍然将甲骨文及金文等地下的出土资料与《诗》、《书》、《礼》等古籍互为参证，来论说周代与商代的制度。文中认为，在殷商时期，王位继承所实行的是兄终弟及为主，父亡子继为辅。直到周代才完全地实行子继父位，并成为定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嫡庶之分、宗法之制。随后才有分封子弟，天子为君，诸侯为臣的局面。所谓"嫡庶"，即嫡子和庶子，嫡子为正妻所生之子，庶子为妾所生之子。在周代，嫡子的地位要高于庶子已是很明确的事情。当时所实行的宗法制已经很完备。规定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大宗，是同姓贵族的最高家长，也是全国的共主。其余嫡出诸子和庶子分封为诸侯，对天子为小宗，在诸侯国为大宗，以国名为氏。诸侯所封卿大夫，对诸侯为小宗，在本家为大宗，以官职、邑名、辈份等为氏。诸侯、卿大夫职位都由嫡长子继承。从卿大夫至士，其大宗、小宗关系依此类推。以血缘为纽带来维系国家的统治。与此相伴随，周代还实行为祭祀先祖而设立多寡不一的庙堂以及同姓不得通婚等制度。这都是商代所没有的。王国维对此都一一作了分析。由于文中的论述发前人所未发，以及采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当时的学术界同样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后世学者对其中的观点也有不同看法，如认为王国维"商人无嫡长之制，故不能有宗法"的说法有些偏

颇,因为宗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父系氏族社会,父系家长的绝对权威只有靠血缘的力量才能加以维持，所以应该说，夏商时代已具有宗法的萌芽。然而把宗法作为一种严密的制度来予以实行，这又不能不说是从周代开始的。《殷周制度论》的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王国维在甲骨学研究方面获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他释出的新字并不多,约十几个,但这些字在通读甲骨文的过程中却十分关键,如释旬、释天、释珏朋、释毓、释上甲合文、释礼等,他对这些字的解说都十分精辟。在此过程中,他既重视文字的释义,同时又反对强解硬释的穿凿附会,充分体现了他严谨的治学态度。然而他在甲骨文研究中的最大特色在于不只是把卜辞材料引用到文字研究中去,而是把文字音韵训诂的知识作为考证古史的重要手段,把它与对史事、制度的考察结合在一起,从而在学术研究中产生了极佳的效果。他胜过了乾嘉学派的前辈们。

第八章

南书房行走

东瀛归来后，王国维在上海度过了整整8个寒暑。8年来，他依傍着黄浦江的涛声，继续他的学术探究。其间，无论是《浙江通志》的撰写，或是作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他都未离开过上海，只是为家事偶而回海宁小住几日。使他最终别离上海，且远足北上的是1923年4月16日(农历三月初一)来自紫禁城的那道末代皇帝的谕旨，命杨钟羲、景方昶、温肃、王国维4人任"南书房行走"。随即王国维遵旨赴京。此次北上与1907年第一次进京已时隔整整16年，当初他正值而立，现在已早过了不惑之年。随着岁月的流逝，王国维由青年步入中年。而与此同时，社会的沿革却越出了常态，象征着君主制度的朝廷在剧烈的社会震荡中从历史的前台撤到了后台。这还得从1911年说起。

武昌起义爆发以后，清政府立即决定派兵镇压，然而北洋军将

领却不听调遣。清廷深知个中原因,只得起用曾经免职的袁世凯。10月14日,摄政王载沣颁发谕旨,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监督办"剿抚"事宜,负责指挥湖北全省的军队和各路援军。此时在河南彰德洹上村已居住了两年多的袁世凯未为所动,他还想得到更多的权力。因此他便以"足疾未痊"为托辞,迟迟不起程赴任,并向清廷提出6条要求。没有袁世凯出山,北洋军就止步不前。正当载沣对袁世凯的要求犹豫不决之时,湖南、陕西及九江相继起义,紧迫的局势使他不得不下令召回荫昌,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各军。袁世凯达到目的以后,立即调兵遣将,督促部下反攻汉口。与此同时,山西于10月28日宣布独立,驻扎在滦州的新军进行兵谏,要求清廷改组皇族内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而更紧急的是,在石家庄的新军又与山西革命军联合,成立燕晋联军,准备进攻北京。在这种形势下,清廷为了缓解矛盾,随即以载沣的名义下了一道"罪已诏",解散皇族内阁,颁布了《宪法信条》,承认"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改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13日,袁世凯抵达北京,16日履任内阁总理大臣。在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全部落入袁世凯手中后,他进一步周旋于革命党人与清廷之间,以获取最大的利益。12月南北双方举行公开的和谈。和谈期间,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唐绍仪与南方的黄兴进行多次密谈,共同约定,只要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推举他为共和国的第一任大总统。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对此,

袁世凯恼羞成怒，惟恐此前的约定无法兑现。在得到了南方的进一步承诺后，他便开始加紧“逼宫”。清室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同意退位，并授权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协议清室优待条件。经过南北双方的多次磋商，最终确定了清室退位的优待条件：清帝退位后，其尊号仍存不废，民国待以外国君主之礼；皇室费用每年400万元，由民国拨给；清帝暂住故宫，日后移居颐和园；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其原有私产由民国特别保护等。2月12日清室宣布接受优待条件，下诏退位，宣告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的结束。尽管民国宣布“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然而正是这几条优待条件使得退位的宣统皇帝溥仪仍得以安居一隅，在紫禁城内继续当他的皇帝。只不过他的这种地位仅仅局限于皇宫内，皇室的权力再也威慑不到红墙以外的世界了。

1922年，清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年满16岁，这个已当了10年宫中小皇帝的少年结婚了，宫中为他举行大婚典礼。按清朝祖制，年轻皇帝一结婚就表示他成人了。溥仪后来在回忆那段宫中生活时说，他当时一直在想“如果不是闹革命，是我亲政的时候开始了”。[1] 婚礼过后，溥仪运用“当家作主之权”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参加婚礼的遗老中，挑选出几个被认为是最忠诚、最有才干的人，来担任他的“股肱之臣”。清室也都认为，皇帝应该多和

①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35页，群众出版社1984年。

有学问的人在一起,这样才能使他更有长进,以恢复祖业。那几位被选中的人又推荐了他们的好友。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人们都剪去了象征清王朝臣民的辫子,许多忠于清朝的遗老却仍坚持留着辫子不剪,于是选进宫中的人使紫禁城里又增加了十几条辫子。这些人是:郑孝胥、罗振玉、景永昶、温肃、柯绍忞、杨钟羲、朱汝珍、王国维、商衍瀛等。溥仪分别给了他们"南书房行走"、"懋勤殿行走"的名衔。而王国维得到的名衔是前者。

"南书房",简称南斋,位于故宫前清宫的西南。清康熙皇帝早年读书处。后选调翰林或翰林出身的官员到里面入值,除应制撰写文字外,并遵照皇帝旨意起草诏令,一度成为发布政令的地方。雍正年间军机处成立后,其主要职能是讲学、查书、吟诗、作画、鉴赏古物等。"南书房行走"算是一个官名,"行走"即入值当班办事的意思。比如,军机处行走、总理衙门章京行走等均为此意。其入值人员数额向来无一定。这些人均为文学侍从之臣,也就是所谓的"清班"。"清班"中取得皇帝信任的,也有机会帮皇帝拟旨,或处理一些无关重要的政务。然而溥仪的小朝廷并没有什么政务可办,因此这些来到紫禁城的"股肱之臣"除了左一个条陈,右一个密奏,陈说复兴大计外,就是清点字画古玩,而这正是王国维的所长。

王国维以"布衣"身份骤然间做了皇帝身边的"近臣",这位从清朝走过来的读书人不免有些受宠若惊,也许他为的不仅仅是废帝的恩宠,而是还在于注重宫中的古籍和其他文物。有了这双重

原因在起作用，他看重这一职位也就不足为怪了。

进京入宫，面见皇帝，自然要作一番准备。1923年5月初，王国维就对儿子潜明说："我定于下月初北上。"又在与罗振玉的书信中急急地商讨迁居北京后的寓所等事。去北京，王国维的一切学术研究工作也都将随之北行。当他搬迁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时，剩下的唯一事情就是装运书籍。他用了七八只木箱才将自己的藏书运走，这使他颇费了一番心思。与这相比，晋见溥仪所需的朝衣朝服，王国维得来倒全不费功夫。友人蒋汝藻很快就给他送来了。民国以后，这些前朝的衣冠成了古董宝贝，而对遗老们来说这些衣冠更寄托着他们对清朝的思念，因此蒋汝藻将它珍藏着。但王国维一开口借，他就毫不犹豫地奉送而来。这使王国维大为感激，他特意给蒋汝藻去信表示谢意，他说：凭着蒋公所具有的崇高道德行为，所以我才敢提出这种久借不还的要求来。无论是王国维赴京上任的急迫心情，还是遗老们纷纷以诗道贺，都说明，要彻底结束一个时代，就如同抽刀断水一样，难以一蹴而就。

正当王国维整装北行的前夕，他家中又发生了不幸，其女端明夭折，这已是王国维一生中失去的第4个女儿了。不过这一不幸并未影响他的行程。他准备坐船赴京，这样既可多带一些物品，又可休息得好一些。5月25日，王国维自上海由海道北上，此一别，结束了他前后在上海10年的居住生涯，此后他除了为儿子潜明料理后事，再也没有回过这个使他真正走上事业征途的地方。

3天后,王国维抵达北京。6月4日,他在紫禁城晋见溥仪,这可以说算是就职报到了。由于其他几位由溥仪定的“南书房行走”还未到任,王国维乘这段空隙时间忙于寻找居所安家。

溥仪在任命王国维等人为“南书房行走”和“懋勤殿行走”的同时,还起用了两名旗人,一个是他岳父荣源,另一个是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金梁。金梁在其一生中还做过张学良的老师。此时,他完全赞同溥仪推行的内务府改革,并积极支持溥仪光复故国。金梁在被溥仪选中当小朝廷内务府大臣之前,曾给溥仪写过一个条陈,提出:“以密图恢复为第一。”他认为,这必须要做到3件事:其一,保护宫廷,以固根本;其二,清理财产,以维财政;其三,自保自养。他说,这三者是彼此相连不可分的。其中保护宫廷,他概括为两条:一是保古物,一是保旧殿。[①] 而王国维正是能为保护宫廷清理文物尽才尽力者。因此,金梁对王国维的赴京自然也就很关心。在王国维赴京之前,他曾答应王到京后可暂住他家。王国维也考虑到住在金梁那里较为合适,所以一到北京,即住在司法部街东华银行金梁的公寓里。直到7月初,为能安置家眷来京居住,他才迁入后门内织染局10号的新居所。此时,小朝廷所要办的事已无法与昔日所操持的国家政务相比,再加上考据古物古籍又是些清闲的事务,所以王国维常常是上午入直,下午便在寓所里搞研究。罗

① 《我的前半生》第155-156页。

振玉于次年入宫任“南书房行走”，也经常不去宫里，王国维替他“当值”，经常告知其不在宫中所发生的事。不过偶尔也有忙碌的时候，如 11 月初，南书房等一班人曾奉命清查景阳宫等处的书籍，其藏书量颇大，王国维等人分班予以清理。

王国维入宫后的第二年，即 1924 年是一个多事之秋。民国建立以后，政局一直不稳，特别是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京畿地区亦战火连连。1922 年第一次直奉战争过去不久，新的战事又在酝酿之中了，溥仪的小朝廷尽管有民国的优待条件护身，却仍然有自危之感。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溥仪身边的近臣中有人提议，让废帝溥仪出国游历，以避免受到伤害。王国维对此深表反对，他认为，让溥仪出国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样会造成宗庙宫室被占，皇帝位号不待削自削；同时由于欧洲局势混乱，出国也会带来危险。因此，他在给溥仪的密折中建议，筹建皇室博物馆来确保皇室的安全。他说：

今有一策，有保安皇室之利而无其害者，臣愚以为莫若开放禁城离宫之一部为皇室博物馆，而以内府所藏之古器、书画陈列其中，使中外人民皆得观览，如此则禁城之内，民国所辖地面，既有文渊阁之四库全书，文华、武英诸殿之古器、书画，皆我皇室之重器，而皇室所辖地面，复有皇室博物馆陈列内府之重器，是禁城一隅实为全国古今文化之所萃，即于世界文化

有至大之关系,一旦京师有事,万国皆有保卫之责。[①]

从中可以看到王国维希望以文化来保护皇帝,同时也是想用皇帝的名分来维系日显衰微的传统文化。稍后他在给溥仪的另一份上书中进一步显露出了他对时局深深的不满,这种不满集中表现为对西学西政之说影响中国的强烈抵触。在王国维看来,辛亥以后的"十余年中,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中国的艰难时局与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灾难在相当程度上是同源的。究其原因,他归结为两条:其一,"西说之害,根于心术"。他认为,"西人以权利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能事",所以会造成"以肆其豪强兼并,更无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夺不餍之势";导致国与国,上与下,贫与富之间的相争。其二,"西说之弊,根于方法"。因为中国立说讲求中庸,孔子称过犹不及,孟子恶举一废百。而西人则往往过而失其中,易走极端。他举例说:"国以民为本,中外一也。先王之不能自治也,固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固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病民,故立法以附制之,以此治民,是亦可矣。西人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立宪焉,有共和焉。"对此他不满地问道:"立宪、共和之国,其政治果出于多数国民之公意乎?抑出于少数党人之意乎?"在王国维的心目中,传统

① 《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17页。

的君主制是祖先留下的一种恰到好处的统治形式，要胜过走极端的西方立宪、共和制。鉴于西方战后的反思倾向，王国维以欧洲诸国业已出现的东方学术研究热为例："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讲座以数十记。德人奉孔子、老子说者，至各成一团体。"以说明东方文化的影响。他提醒溥仪说：其实使平民百姓祥和的休养生息，以及使国家长久稳定和平的治国之道是我国古已有之的，这在周孔时代已经十分完备了。这样的治国之道在我国是经验的良方，在西方则成了对付社会病症的新药。这完全是由于西方人觉悟到了自身的政治流弊，而思考改变原来的方法。[1] 他对传统的眷念在这一上书中表露无疑。可是他此时精心写就的文字，并未得到溥仪的重视，他深感失望。使他烦忧的还不仅于此，6 月 6 日，他在给罗振玉写的信中还谈到了宫内人的钩心斗角，他称此为"恶浊界"，并说其中"机械太多，一切公心在彼视之尽变为私意，亦无从言报称"。[2] 他厌恶这种互相倾轧的状况，所以想告假离开紫禁城。他希望离开宫禁后，生活能靠闭门授徒自给，以求得心安理得。不过这种想法丝毫不影响他对溥仪的忠诚。

正当王国维对整个国内局势以及身处宫中的小环境都感到不满的时候，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随之又有北京政变的发生，王

---

①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 311 - 312 页，上海书店 1989 年版。
② 《王国维全集·书信》第 400 页。

国维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最终出现了。这次战起的原由还要追溯到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那次战争结束以后,奉系军队兵败,其所部悉数撤往关外。此战一改直、奉系两大军事集团共同掌权的局面,而由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军阀独掌北京政府。曹锟,字仲珊,天津人。在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死之后,成为直系首领。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他以5000银元一张选票的价格收买国会议员590人,以"贿选"当上了总统,并颁布所谓的"曹锟宪法"。被赶到关外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当然不甘心于这种结局,联络各派势力图谋再起。1924年9月,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为夺取上海,与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在上海开战,张作霖乘机发兵17万入关,并自任总司令。9月17日,曹锟政府发布讨伐张作霖的命令,以25万兵力迎战,并与其在山海关一带进行激战。10月,直军在初战失利的情况下,总司令吴佩孚急调后继部队应援。正在后方空虚之时,直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与直系援军第2路司令胡景翼、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策划倒戈。冯玉祥,安徽曹县人,字焕章,行伍出身。冯曾为直系立过很大功劳,但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却受到吴佩孚的排挤。直系北京政府曾依照吴佩孚的意愿,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免去了冯玉祥河南督军的职务,改任陆军检阅使;在饷钱和军械的分配上,吴佩孚也一手把持,对冯玉祥所部极为苛刻。所以冯吴之间已有不和。随着时间的推移,冯玉祥及其部下对曹锟、吴佩孚越来越不满,而当时反曹锟、反吴佩孚的呼声遍及全国。10月

18日，直军向奉军发起总攻击。随即冯玉祥不失时机地秘密率军回师。23日，冯玉祥所部进入北京，占据了北京内外各重要据点和交通通讯机关，并派兵包围了总统府，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接管了京城的防务。24日，曹锟被迫下令停战，并解除了吴佩孚的职务。随后，曹锟自己也不得不宣告退位，结束了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的局面。这就是震动一时的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将属下的部队改称为国民军，自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并组建了由黄郛任代理国务总理的临时内阁。当时北京城内局势相当混乱，还有谣传说清帝就要复辟。对此，冯玉祥随即作出决定，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除出故宫。11月4日，新组建的黄郛摄政内阁议决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其5项条款是：一、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二、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三、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四、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五、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中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11月5日，北洋政府派北京警卫司令鹿钟麟、京师警察总监张璧及李石曾等人进宫宣布“清室优待条件”修正事宜，并限令溥仪即日迁出宫禁。当日下午，溥仪和后妃及少数宫女、太监随着鹿钟麟、张璧分乘5辆汽

车匆匆出宫,移居溥仪父亲载沣的醇王府。这一天对一向秩序井然的皇宫来说,真是“兵荒马乱”的一天。稍后,上海的《东方杂志》(21卷22号)发表了一篇题为《清帝出宫与优待条件的修改》的文章,客观地评述了这一事件。文章说:“中华民国北京皇城内的前清宣统皇帝,因民国成立时的优待条件关系,13年来,得在共和国内做起超出国家范围的皇帝,而有时对于民国的官吏人民颁爵赐谥,发布谕旨,虽经民国四年时的限制,张勋复辟的教训,仍不能稍为抑制。到了本年11月5日,因北京在政变状态中,由冯玉祥派鹿钟麟、张璧迫令出宫,并修正原定优待条件,废除其帝号,从此清帝问题得以结束,不可谓非民国史上的一件重要事情。”那天,王国维为溥仪侍行,不离左右地与溥仪一行一同离开了宫禁。在醇王府门前,溥仪向鹿钟麟信誓旦旦地表示:“我愿意从今天起当个平民。”他说:那个优待条件废止了,“正合我的意思……当皇帝并不自由,现在我可得到自由了”。[①] 这番话说得显然是言不由衷的。宫中的小朝廷没了,南书房关门了,王国维的任职当然也就此结束,前后仅1年5个月。这一事变,对王国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打击,他对传统君主制度所寄予的最后希望也变得十分渺茫。于是王国维处于极度的忧患之中,并试图自杀殉节。由于家人已事先发觉,特别留意他的行动,因此才没有使自杀悲剧发生。

---

① 《我的前半生》第169页。

这年年底，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指责清皇室出卖产业，散失文物。心绪仍未平静下来的王国维对此极为不满，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他一怒之下辞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职务，并索回原拟在《国学季刊》上刊载的文章。他在给北京大学有关人士的信中申明了自己的立场，为皇室竭力作了辩护，他说：

昨阅报纸，见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不胜骇异。大宫山古迹所在地是否官产，抑系皇室私产；又是否由皇室赏与洵贝勒，抑系洵贝勒自行购置，或竟如《宣言书》所谓强占？均有研究之余地。因洵贝勒之毁坏砖塔，而即谓其占据官产，已无根据；更因此而牵涉皇室，则尤不知学会诸君何所据也？至谓"亡清遗孽擅将历代相传之古器据为己有"，此语尤为弟所不解。夫有明一代学术至为简陋，其中叶以后诸帝尤为不悦学，故明代内府殆无收藏可言。……是本朝入关以后未尝得明代之宝器也。其可谓历代相传之古器物者，近如国学之石鼓，稍远者如房山之石经，远者如长安之碑洞，皇室未尝据为己有也。其可谓历代相传之古籍者，惟内府大库之书籍多明文渊阁之遗，此于宣统初年我皇上即以之立京师图书馆，其支流为今之博物馆，皇室未尝据为己有也。今日内府之所藏，皆本朝二百余年之所搜集，其大半购自民间，其小半得于臣工之所

进奉,《高宗纯皇帝御制文集》题跋一类,与《御制诗集注》中历经其事,可覆按也。故今日宫中储藏与夫文华、武英诸殿陈列诸物,以古今中外之法律言之,固无一非皇室之私产,此民国优待皇室条件之所规定,法律之所保护,历任政府之所曾以公文承认者也。夫以如此明白之私产而谓之占据,是皇室于实际上并未占据任何之财产,而学会诸君于文字上已侵犯明白之私产矣。……又优待条件载民国人民待大清皇帝以外国君主之礼,今《宣言》中指斥御名再三,不审世界何国对外国君主用此礼也?”①

其中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义愤,同时也表现出他对清室的一份忠诚。这样激烈的行动出自于性情温和的王国维是非同寻常的。

在这1年5个月的时间里,尽管王国维也密切地关注着国内形势和宫内事务,并且还数次上书废帝溥仪。但是在这一阶段中,作为学者的王国维还是一如既往地把大量时间用于学术研究。1923年12月,王国维的重要学术著作《观堂集林》由蒋汝藻以聚珍版印毕行世,蒋在为此书作的序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君书才厚数寸,在近世诸家中,著述书不为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书者也。君新得之多,固由于近日所出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学识,则亦无以董理之。盖君于乾嘉诸儒之学术方法无不通,与古书无不贯串。

① 《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05-406页。

其术甚精，其识甚锐，故能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辗转相生，所得乃如是之多也。”[1] 这番话表明他对王国维所从事的学术研究是十分了解的。正如蒋所说，此时的王国维仍然忙于他的实证研究，新见迭出。他所做的主要研究工作有：完成《魏石经续考》，以敦煌所出六朝人写本《抱朴子内篇》一二卷校《四部丛刻》影明鲁藩刻本，纠正了不少错字；校勘《北硐集》；补王念孙《谐声谱》之阙，完成《说文谐声谱》一卷。同时，他仍继续进行《水经注》的进一步校勘工作。他在这一项工作上花费相当大的精力。

《水经注》是北魏郦道元所撰的一本历史地理名著，共 40 卷。尽管其书名看起来是为《水经》作注，但《水经注》的内容在原有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扩展。三国时期桑钦所写的《水经》仅记载了我国水道 137 条，内容比较简单。而郦道元所作的注文记载了 1252 条水道，是原文的近 10 倍。在内容上，不仅叙述了水流的发源和流向，使水道清晰可辨，还旁及流经地区的地形、物产、民俗、古迹、地理沿革、城邑兴废等情况，对研究历史地理、水利沿革以及中国古代历史都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

然而由于历经时间久远，《水经注》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和笺注本，因此对《水经注》各种版本进行校勘并探其源流就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王国维从事这项工作始于 1916 年。1923 年到北

① 《王国维年谱长编》第 355 页。

京以后，他又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版本，使这方面的工作获得了新的进展。由于王国维在广泛的查寻中掌握了《水经注》的多种主要版本、抄本，如宋刊残本、《永乐大典》本、明抄本、孙潜夫本、全谢山本、聚珍本等，从而为他从事这项校勘工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通过多年的努力，经他校勘过的《水经注》版本至少有8种，这在《水经注》研究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正是在这样的精心校勘中，王国维发现并改正了书中不少错误。仅在1924年王国维撰写的《明抄本水经注跋》中，他所举例校改的错误就有21条。此外，王国维在校勘《水经注》的过程中往往从大处着眼，去探寻各种版本的渊源来历，这不仅使长期以来混入版本内的各种错误注记得到清理，而且使各种版本相互间的复杂关系也可以查明。如，他认为《水经注》之所以有善本，是因为校勘诸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不是一个人做的。说《水经注》有善本自清朝的戴东原（震）始，这是因为戴东原校本综合吸取了前人校本精华的缘故。关于戴东原抄袭的问题，王国维经过认真的研究认为，戴本与赵一清、全谢山本语多相合，其原因是三人所据原书相同，这不能作为因袭的证据。王国维的研究成果为后世《水经注》研究者所重视。[1] 在此期间，王国维还写了20多篇学术文章。即使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谈论的主要话题仍然是学术问题。

---

① 参见《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00-403页。

第九章

享誉清华园

1925年，王国维走进了清华园，这里成了他生命里程中的最后一站。

北京的清华学堂是1909年（清宣统元年）清政府以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创立的。1904年至1905年间，清政府向美方提出要求核减退还1901年《辛丑条约》中签署的赔给美国钱款的余额。这样，清政府驻美公使梁诚便向美国交涉，提出用“庚子赔款”的这部分余额作为中国派遣留美学生之用。1907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最终宣布退还一半。于是清政府拟用此款创办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为此特赐皇家专用的清华园作为校址，故而校名清华。由于这段特殊的历史，外人通常称清华为“赔款学校”。学堂地处当时北平西郊，其游泳池、图书馆及科学馆、礼堂均为近代著名建筑。园内荷池碧波，石山起伏，松柏环绕，故曰“水木清华”。1911年学堂

正式开学。开创之初,学校主要是培养留美预备生。学校隶属外交部(门),清政府还成立了游美学务处,正式招考留学生。一些日后著名的文人学士梅贻奇、王世杰、赵元任、胡适、竺可桢等都先后被派往美国留学。1912年改学堂为学校。

几年后,清华学校的教务长张彭春创议在清华创办研究院及大学部。1924年秋,校方即计划改制。此建议经外交部的批准,于是留美预备部停办,不再收中学生至大学预备课程度的留美预备班学生。实际上当时清华校方认为,清华每年有200万左右的进款,经费独立,不受政府经管,又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且基础深厚,所以应当有独特的工作,在学术上有所表现。研究院主任吴宓在研究院开学典礼上所作《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的讲话中,阐述了创设的初衷:一,在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二,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学、哲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底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①] 在这样的思想驱使下,清华学校主持学校大计的一班人在校务会上经过多次研讨,根据当时国内和清华的具体情况,决定在筹建大学部

① 引自《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见《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第284页。

的同时，筹备设立研究院。研究院原拟兼办各科（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后因经费所限，便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另一方面，“在五四新潮之后不久，国学与科学同为当世所重视”，在提倡科学的呼声响彻云霄的同时，整理国故也被世人所重视。于是，研究国学之风此时也在全国兴起。许多大学在“中国办大学，国学是主要的”口号下，争先恐后地办起了国学院、国学系、国学研究社等。北京大学在1922年开办了研究所，这是我国大学设置的第一个研究所。该研究所分四门，而国学门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门。处在这种大背景下，清华校方感到既然要将学校改成国立大学，就应当提倡以国学研究来沟通中西方文化，要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和观念来整理传统文化。于是，清华研究院便应运而生。1925年下半年，清华学校改为大学。与此同时，清华国学研究院也正式成立，开学时间是1925年9月9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在中国教育界可以说是一件创举”。当时的研究院是清华大学的独立研究机构，与大学部的教学没有直接关系。对于办学的宗旨，由清华学校校务委员会通过的《研究院章程》阐释得很清楚，“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着重培养两种人才，一是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研究人员，二是各类学校的国学教师。由于强调高标准，因此收取学生是比较严格的。按照章程规定，入学者必须具有以下资格：一为国内外大学毕业生，或具有相当程度者。二为各校教员或学术机关研究人员，具有学识及经验者。三为各地自

修之士,于经史小学具有根底者。四为清华旧制大一级应届毕业生,如得到学校推荐,可以为“特别学员”。考生首先第一步要进行资格审查,合格者才由研究院发给准考证。第二步进行文化考试。考试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考国学的普通常识;第二部分,作论文一篇;第三部分为专门学科,分经学、中国史、小学、中国文学、中国哲学等8门,考生于其中任意选择3门。考试合格者才能被录取。

要使研究院成为高深的学术机构,师资就是一个关键。当时的校长曹云祥尽管不是教师出身,但十分重视这一问题。曹云祥原任中国驻伦敦总领事。1922年4月,在征得美国驻中国使馆的同意后,他受外交部的任命,出任清华学校校长,在清华任职时间颇久。当决定创办研究院后,曹云祥最初欲仿照美国大学研究院的方法办学,因此他就向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请教如何创办研究院,并商请他制定研究院制度,以及去清华担任国学研究院的导师。胡适,安徽绩溪人,1891年生于上海。原名洪骍、嗣糜,后改名适,字希疆、适之。早年入上海中国公学读书,1910年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官费生,同年进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学农。1915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鼓吹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他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在当时学术界影响很大。1919年他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这是他的成

名作。书中以人名和哲学流派立篇目，每论及一个哲学家或哲学流派，首先考实其人的生存时代、著作的真伪，然后加以评判。尤其是将孔子与诸子并列讲述，突破了传统观念。行文用白话文加标点，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本书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两个月之内又再版。在当时的学术界，胡适是一个勇于创新的风云人物。当然并不仅仅是胡适的学术地位，还在于他有六七年赴美留学的经历，对美国的教育状况比较了解，所以曹云祥才会前去征求他的意见。胡适回答曹说："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① 此时的胡适30多岁，所提到的三人对他来说都是长者，即使其中年龄最小的王国维也要比他大14岁，他们的学术造诣都十分深厚。在这三人中，胡适与章太炎、梁启超都有过学术上的争执，他之所以仍推荐他们，完全是因为对他们学问的推崇，或者更明确地说是推崇他们的传统学问。然而处在当时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历史条件下，胡适对他们还另有看法。胡适在1922年8月的一则日记中这样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

① 《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见《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第268页。

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1] 他在这里所说的"半僵"和"希望"都是针对学术的发展来说的,对王国维的评价最高。正是由于他敬服王国维的学问,因此他竭力主张在由他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的《国学季刊》第一卷(创刊于1923年)上一定要发表王国维的文章。他以为不刊登王国维的论文,不足以为刊物增色。当时习惯于传统竖式书写的王国维对《季刊》的横排印刷颇有意见,曾提出要撤回稿件,后来通过胡适的一再争取,王国维才终于答应发稿。在《国学季刊》创刊第一年的4本杂志中,就刊载了王国维的《五代监本考》、《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序录》、《韦庄的〈秦妇吟〉》、《〈书式古堂书画汇考〉所录〈唐韵〉》4篇文章,还有1篇译著。从中是可见胡适的诚意的。1923年的年末,胡适曾拜访过王国维,那次言谈中,他们较多地涉及了戴震(东原)的学问与哲学的传人问题。次日,王国维回访了胡适。此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关系。正是在王国维的启发下,胡适开始研究戴震,并写了《戴东原的哲学》一书。1924年胡适为了撰写《白话文学史》,先后数次写信给王国维,向他请教词学问题,王国维也都一一谈了自己的看法。论文《词的起源》初稿完成后,胡适又将文稿送交王国维,请他批评指正。当发表时,胡适把王国维的两封信附在这篇文章后面,以表明王国维在他的研究中所起的作用。同时,他在文中也提出了与王国维不同的观点。1928年,

---

① 《胡适的日记》(下)第44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谷永在《学衡》杂志第 64 期上发表了《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的文章，其中就提到胡适创文学革命论受到了王国维的很大影响：

先生(指王国维)之于文学有真不真之论，而胡适有活文学死文学之论；先生有文学蜕变之说，而胡适有白话文学史观；先生推尊《红楼梦》为美术上唯一大著述，且谓作者之姓名与著书之年月为唯一考证之题目，而胡适以考证《水浒》、《红楼梦》著闻于世。……先生论词取五季北宋而弃南宋，今胡适之词选多选五季北宋之作；先生曰："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此可见"，胡适乃与天下约言不用典。故凡先生有所言，胡适莫不应之、实行之，一切之论发自先生而行之自胡氏。

正是由于这种学术上的联系，胡适于章、梁、王三人中，给王国维的评价最高也就不足为怪了。

胡适的推荐为正在筹建中的清华国学院提供了可选择的对象，但推荐是否有效，还要看当事人自己的态度。谈到国学，在当时名气最大的当然是章太炎了。早在清末，章太炎在推翻满清帝制，争取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斗争中，就边革命边讲学。1903 年他因"苏报案"被捕入狱。1909 年他从西牢里放出来，就东渡日本，在东京主编《民报》。同时，应留日学生之请，他在东京牛込区二丁目八番地《民

报》社一间大旧房子内大讲戴段之学。每星期日上午,在陋室中,师生们席地而坐,章太炎滔滔不绝,妙趣横生地讲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当时听讲的学生有钱玄同、朱希祖、鲁迅、周作人、许寿裳等七八人。后又在大成中学教室里另辟课堂,听课的人就更多了,章太炎讲课的内容也由文字学扩大到了诸子学和中国文学史。他在这一时期所著的《庄子解故》、《国故论衡》等书,都是根据自己的讲课内容写成的。五四运动以前,由于辛亥革命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内学术风气也随之大变。乾嘉学派所注重的小学、训诂、音韵此时受到人们的格外重视,特别是在北京大学。这多少也与章太炎讲学东京有关。因为此后有许多章门弟子在北大任职,其中的朱希祖、钱玄同、周作人等就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的成员,沈兼士还是国学门的主任。胡适荐举国学大师,章太炎当然应在其中。但是章太炎对官办学校一贯不以为然,在科举废除不久的1906年,他就不无忧虑地说:如今学校由朝廷设立,入学校学习又会成为新的利禄之途,学术的发展难道还有指望吗?直到1924年他还在说:"究之方闻之士,经世之才,多于大师讲塾,儒人学会得之,次则犹可于书院得之,而正式学校无与也。"[1] 章太炎对官办学校有这样的偏见,他不肯前去清华任教就不足为怪了,所以对他的推荐终于没能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

①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747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在胡适的推荐下,曹云祥校长特派吴宓专程去请王国维。吴宓字雨僧,山西泾阳人。1917 年由清华学校派往美国留学,先入福吉尼亚州立大学学习文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师从白璧德教授,研习文学、哲学等。此时的吴宓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主任,他持曹校长的聘书,到地安门内织染局 10 号王国维的住所,与其商聘到研究院任教一事。此前,清华学校与王国维并无什么联系,曹云祥、吴宓与王国维又素昧平生,因此吴宓前去拜访还带着胡适的一封信,信中说:"清华学校曹君已将聘约送来,今特转呈,以供参考。约中所谓'授课拾时',系指谈话式的研究,不必是讲演考试式的上课。"① 当吴宓步入王家客厅见到王国维时,他首先恭恭敬敬地鞠了 3 个躬,然后再说明来意。吴宓的诚意和得体的举止似乎打动了王国维,使拒聘北大的他答应予以考虑。最终王国维去了清华。后来他曾对吴宓提起过此事,他说:"我本不愿意来此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这番话道出了部分事实,然而其中还另有原委。1924 年,溥仪被赶出故宫,王国维也只好走出南书房。这年北京大学研究所为避免国宝丧失对皇室出卖产业提出非议,并直指溥仪之名,这惹恼了对末代皇帝感恩戴德的王国维,他一气之下辞去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的职务。这样一来他也就失去了每半年 360 元的薪金收入,生活开始拮据起来。而清华学校的

① 《胡适致王国维书信》,见《文献》第 15 辑,第 9 页。

教授待遇优厚,每月工资300至400元,最高的500元,又无其他折扣,每五年还可出国休假半年。因此,仰慕王国维并了解其现状的顾颉刚就向他的恩师胡适谈到了王国维的境况,并要求胡适设法解决王家生计问题。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静安先生清室俸既停,研究所薪亦欠,月入50元,何以度日。曾与幼渔先生谈及,他说北大功课静安先生不会担任,唯有俟北京书局成立时,以友谊请其主持编辑事务。然北京书局不知何日能成立,即使成立,而资本有限,以不能供给较多之薪水。我意,清华学校既要组织大学国文系,而又托先生主持其事,未知可将静安先生介绍进去否?他如能去,则国文系已有中坚,可以办得有精彩。想先生亦以为然也。"[①] 此后,胡适便向清华举荐王国维。然而他的就职也还经历了一些周折。其实学校是十分欢迎他去的,而王国维却颇为犹豫。在吴宓前去送聘书时,王国维就表示过担心,惟恐去清华任教会影响他与清王室的往来。对此,清华校长曹云祥态度很明确:在清华"一切行动均极为自由",以打消王国维的迟疑。胡适也写信劝说,他在信中写道:"先生所虑(据吴雨僧君说)不能时常往来清室一层,殊为过虑。鄙意亦以为先生宜为学术计,不宜拘泥小节,甚盼先生早日决定,以慰一班学子的期望。"[②] 随后胡适又去托溥仪,请其代为劝驾。出宫后

① 《我的父亲顾颉刚》第9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胡适致王国维书信》,见《文献》第15辑,第9页。

的溥仪物质生活已大不如在紫禁城时。在溥仪身边的王国维曾给蒋孟蘋去信说:“现主人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这种现状也使溥仪比较能够体恤王国维的困境。他接受了胡适所托,便命师傅们代为写了一道诏书,要王国维去清华。当时的溥仪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威势和奢华,然而跟随他的那一班人仍在相互排挤倾轧,颇多是非。喜欢清静的王国维对此有些厌烦。所以对于溥仪的谕旨他一方面难以拒绝,另一方面也可“离此人海”,“重理旧业”。这样,王国维最终去了清华园。

1925年4月18日,王国维举家迁居清华园。当时清华教职员的宿舍共分为三个部分。南院位于学校大门外左侧,为二层楼,西式建筑,主要是给年轻学者居住的。西院地处清华园的西北角,建筑古色古香,距学生活动区较远,环境恬静安适,租金也比较便宜。这里住的大都是年龄较长的教授和职员。北院是外籍教师居住的区域。王国维一家居住在西院的两栋房子内,一栋为王国维的书房,另一栋则为全家人饮食起居之所。由于孩子多,居住空间并不宽裕。来到清华,王国维特意将自己的著作《观堂集林》一部六册赠予清华学校图书馆。当王国维抵达学校后,校方曾有意请他担任研究院院长。王国维以院长管理的事务太多而一再推辞,坚持不就。

随后,梁启超也于4月23日到校。与章太炎、王国维相比,聘请梁启超是最顺利的,因为他很乐意来清华教书。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是清末民初

极有影响的宣传家和杰出的学者。他12岁中秀才,16岁成举人,17岁开始接触新学,后拜康有为为师。1895年一同与康有为参加公车上书,倡导维新变法。他鼓吹变法、宣传西学的文字,影响着整整一代人。辛亥革命以后,他一度在北洋军阀政府任职。1917年他声明退出政界,专心从事教育和学术工作。尽管梁启超比王国维后到清华,但他与清华学校的关系远比王国维密切。此前他多次来清华讲演,并进行学术研究工作。特别是一次他在清华学校以《君子》为题的演讲中,引用了《易经》中:"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培养完整人格。后来,清华学校便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校训,希望该校的学生都能成为梁启超所说的"真君子"。来到国学院,梁启超在清华园开设了"诸子"、"中国佛学"、"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等诸多课程。

除了胡适推荐的王国维和梁启超之外,研究院还延聘了学有所专的陈寅恪,长于语言学的赵元任,以及专心于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李济。其中最晚抵达清华的应聘者是陈寅恪,他到清华的时候已是1926年的6月,研究院成立的第二年。此时的陈寅恪在国内知名度并不高,他能受聘于国学研究院完全是由于深知其才能的吴宓力荐的结果,他们曾同学于美国哈佛大学,彼此十分了解。当时梁启超在向校长曹云祥介绍陈寅恪的情况时,对陈寅恪予以极高的评价,他说,我算得上是著作等身了,但总还不如陈寅恪寥寥

数百字有价值。可是,留学归来的陈寅恪并没有获得任何学位,怎么会得到这样高的评价呢?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为清末著名维新人物,皆饱学之士。父亲陈三立为光绪年间进士,是清末旧体诗流派“同光体”的代表人物,可见其家学渊源深厚。1909年陈寅恪毕业于上海复旦公学,后赴欧美游学,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校,研习各国文字。回国的时候,在扎实的国学知识基础上,他通晓世界各国语言30余种,除了英、法、德、俄、西、日等语言外,他还精通蒙古文、阿拉伯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暹罗文、匈牙利文,甚至熟谙中亚地区一些已不再使用的“死文字”。这使他的学术研究处在一个很高的基点上。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后,根据章程的规定,公布了各教授指导的学科范围,陈寅恪的指导范围是: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文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这样的学科范围,如果没有广博的语言知识是无法着手工作的。在那时,国内的学术界,除了陈寅恪还没有第二个人能从事这样的研究工作。

此时的清华国学院以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教授,李济任特别讲师。尽管国学院的所有教职人员加在一起也不过11人,但是王、梁、陈、赵、李5人在当时的国内都是各自研究领域中的顶尖人物,由他们共聚一校,使得清华研究院的学术地位远远

超过了同时代的一批国学院,如中国大学国学系、厦门大学国学院、无锡国学专修馆,甚至还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之上。在办学过程中,研究院借鉴我国传统书院和英国大学的经验,强调教授的主导作用。所设的5个研究室分别由4大教授和李济讲师主持,学生根据自己的研究课题,择定一个教授专门指导。当时国学院采取的方法是,各研究室都摆着各教授所指导范围内的重要书籍,研究院的学生可随时翻阅参考,并与教授接谈问难。这样做,可以增进学生与教授之间的关系,使学生在国学根柢和治学方法上确实有所获益。

清华国学院办了4期,前后共招收了70余名学生,其中有的直接在王国维的专业指导下进行研习,如赵万里、杨筠如、徐中舒、刘盼遂、余永梁、高亨、何士骥、黄淬伯、赵邦彦、姜寅清、朱芳圃、戴家祥等人。有的虽未曾直接向他请业,但在普通讲演的课堂上,乃至平时的学习上也多得到王国维的教诲。学生有什么学业上的困难需要他帮助,他都有求必应。王国维为学生提出的论文题目有:"《诗经》中联绵字之研究"、"古音韵研究"、"历代度量衡研究"、"共和以前历史年代考"等。学生中也有自拟题目的,王国维同样对他们加以热忱的指点。学生姚明达想研究《史记》,多次请教王国维。王国维认为以一部《史记》作研究课题规模太大,需要的时间也过长,因此,他建议姚明达从《史记》的《六国年表》入手,比照《史记》中的列传、世家以及《战国策》,为《六国年表》作笺注,因为他认为

《六国年表》来历不明。一个月后，姚明达完成了《六国年表笺注》，颇有收获。据统计，《六国年表》辑录《秦记》的文字达近百条。王国维为之很高兴。他一再告知姚明达，研究《史记》应注重寻源，这样必有所获。他说："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收获。"[①] 并勉励他多读《诗》、《礼》等书籍，夯实学问根基。另一位学生姜寅清应某杂志之邀，填了一首词。但是他对自己的作品并没有什么把握，于是他去请教王国维。王国维对姜寅清这一不成熟的习作，没有丝毫怠慢，足足花了两个小时修改这首词。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王国维同样恪守着他自己的学术准则，对于自己没有掌握的东西从不放言商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于已获得的学术成就不吹嘘，同时也不保守。国学院学生徐中舒在后来回忆说："予以研究考古学故，与先生接谈问难之时尤多。先生谈话雅尚质朴，毫无华饰……遇有疑难问题不能解决者，先生即直称不知。"[②] 作为一个闻名遐迩的大学者在学生面前能如此坦然，是难能可贵的。他严谨的学风和谦逊的治学态度深深地感染着学生们，并对他们日后的学术之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各教授既指导学生的研究，也开课讲授。王国维最初走上清华

① 姚明达：《哀余断忆》，见《追忆王国维》第 213 页。

② 徐中舒：《追忆王静安先生》，同上，第 203 页。

的讲台是在1925年8月1日清华国学院正式成立前夕。这年7月,暑假期间,王国维受清华学生会之邀向留校学生作《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见之学问》的公开讲演。在这次讲演中,他把二三十年间所新发现的材料,及学者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的结果归为5项:(一)殷墟甲骨文字;(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的简牍;(三)敦煌千佛洞的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内阁大库的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王国维对这5项中的4项都进行过精心的研究和考释,因此他的讲演就格外的明晰。9月,国学院正式开学后,王国维开设的普通讲演课程有:"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仪礼》"等。指导学生进行的专题研究范围是:经学(包括书、礼、诗)、小学(包括训诂、古文字学、古韵)、上古史、金石学和中国文学等。在五大导师中,要数王国维与梁启超对学生进行的专业指导较多。在国学院第一届的32名学生中,根据他们的研究课题,属于梁启超指导范围的有14人,属于王国维的则有16人。第二届学生的状况没有大的变化,王国维与梁启超仍然是进行专业指导最多的两位导师。此外,他的讲课一般一周安排两次,每次一小时。王国维上课时往往不看学生,口操着浙江普通话徐徐道来,尽管其声音较轻,但他所讲的内容仍清晰可辨。而且一如他的治学风格,他的讲课非常严谨,也很细致。王国维开讲的第一课是"古史新证",主要内容是根据殷墟甲骨卜辞和古书资料讲述商代历史。当时前去听课的人很多,其中不但有研究院的学员,而且还有留美预备部的学

生，以及刚进校不久的大学部的学生。他们慕名而来，是为了领略这位国学大师的学术风采。王国维不负众望，这门课的讲授获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在他讲授的一系列课程中，"古史新证"也是他在清华国学院讲得最具学术影响的一课。此课从9月讲授到寒假，讲了整整一个学期。当时，王国维就将其讲课的内容写成讲义，并由清华国学院出油印本。1934年北平来熏阁根据讲义手迹影印出版，《古史新证》遂成为重要的史学名著。王国维在书中的"总论"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事实，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这里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指的是以地下的新材料与文献记载相互补正的一种历史考证方法，更确切地说，是以甲骨文、金文的地下出土材料与流传的文献记载相互验证的方法。由于甲骨文和金文出于当事者的笔录，而且长时期被埋在地下不为人们所知，因此只要甲骨文或金文的记载能与后人编纂的史书相验证，那么它们所记载的历史就是正确的。这种研究方法的提出，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王国维以前，传统的古史研究只注重文献的研究，研究者常常碰到以讹传讹的情况而陷入误区。本世纪的20年代，史学界的疑古风气盛行，人们似乎对一切古史记载都产生了怀疑。随之，王国维首倡的"二重证据法"，为古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他所写的《殷周制度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等文章都是利用地下发现的实物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佳作。此后,史学界都普遍接受了这种研究方法,出版了大批结合古物和文献来进行研究的专著,从而推动了古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除了规定的课程安排,研究院每星期六晚上都要举行学术演讲会,学生自由参加听讲。著名报人徐铸成那时正在清华大学部就读,他曾听过梁启超、王国维的周六演讲。他记叙说,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和中国书法虽然讲得精辟,但听者不多,除了研究生外,大学部和预备班的学生去得不多。相比之下,钱瑞升等教授讲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就特别受学生欢迎,座无虚席。因为他们爱听与时势有关联的内容。不过王国维的专题演讲"新莽量衡"也给年轻的徐铸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演讲中,王国维不仅详细考证出王莽篡位后改革度量衡制度,而且带来了他自己根据考证复制出来的量衡模具。由于内容丰富,又有直观的实物讲解,沉闷的题目却没有使听者感到乏味。徐铸成感慨地说:"这样沉闷的题目,我这样历史知识贫乏的青年,听了也觉津津有味,久久不忘。"①

在清华研究院任教期间,王国维仍然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笔耕不辍。他的《蒙古史料校注四种》、《耶律文正公年谱》及有关辽金元史的论文都在这时完成,学术成就斐然。在这两年的

① 徐铸成:《王国维与梁启超》,见《追忆王国维》第271页。

时间里，他写了50多篇文章，校注了10多本书。1926年4月，他的《蒙古史料校注四种》并附《鞑靼考》和《辽金时蒙古考》各一卷，由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批准付印500本，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丛书的第一种出版。这个决定实际上也是对王国维学术地位的一种充分肯定。

在国学院的教职人员中，王国维寡言笑，性格内向是出了名的，年轻的赵元任夫妇则十分活跃。当时清华教授大都是留学回国的，可教授夫人们多数是旧式家庭妇女，只有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与众不同，她也留过学，敢在众人面前高谈阔论。平日里常常是人未出门，说笑声已传出门外，这种豪放不羁的个性在当时的女性中是难得一见的。但赵夫人一见到表情严肃的王国维，就噤不出声。王国维在清华过50岁生日时，同事们为他办了3桌酒席。当时赵夫人硬是避让着不肯与王国维同桌。果然，王国维坐的那一桌始终默默然，而赵夫人的那一桌则笑语不停。尽管王国维不善交际，但人们都十分尊重他。在国学院的受聘教员中，梁启超、王国维的年龄较大，对于他们，赵元任、李济以后学自居，陈寅恪则以长辈待之。而年龄最大的梁启超也十分尊重王国维，用国学院学生吴其昌的话来说，梁启超“事无巨细，悉自处于观堂先师之下”。凡遇到什么疑难问题，梁启超总是对学生说：“可去问王先生。”当时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在清华的学术地位很高，被人称为清华的“三巨头”，而王国维无疑是这三巨头之首。对于他的学问，陈寅

恪后来曾叹服地这样评价说:“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1]

在清华国学院的一年半时间是王国维一生中最稳定的时期,他有一份优厚的薪金,可以安心地搞学术研究。然而就在这一时候,王国维作出了出人意料的抉择,悄然地离开了他的亲人,他的同事和这个纷繁的世界。

①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第十章

诀别人间

1927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政治风云突变的年份。而对于王国维来说，这一年同样也不寻常，因为正处于壮年的王国维将他生命历程的终点定格在了这一年的风风雨雨中。

1927年的6月2日，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吃完早饭便去了研究院。到校后，他先记起自己忘了把学生们的成绩册带到办公室，于是就让研究院的工友去家中取。此后他遇到研究院办公室秘书侯厚培，便与侯聊起下学期招生安排的话题，他谈了许多自己的设想和建议，过了许久才与侯分手。临别时，王国维向侯厚培提出借3元大洋，但侯正好未带现洋，只能借给他纸币。王国维拿了钱走出校门。在校门口他雇了一辆人力车，要车夫将他拉往离清华园不远的颐和园。到颐和园时，大约是上午10点左右。王国维给了车钱，并嘱车夫在园门口等候，便径直走进颐和园。初夏时节，颐和

园青山绿水,郁郁葱葱。不过临近中午,园内游人稀少。王国维来到排云殿西面的鱼藻轩驻足许久,抽完了最后一口烟,然后纵身跳入昆明湖。当时有一园工(又有说是巡警)正距王国维投水处不远,听到落水声后,急忙跑来解救,也不过约一两分钟的时间,可王国维却已断气了。尽管鱼藻轩前的湖水深不过两尺,但湖底满是松软的淤泥,王国维自沉时头先入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塞住,闻声而来的园工们又不懂急救之法,王国维最终因窒息而死。当园工们将王国维从水中救出时,他的内衣还未湿透,如果能及时施以人工呼吸法营救,或许还可有救,可是这却被贻误了。一代国学大师就这样悄然离去。

时至中午,王国维所雇佣的人力车仍等在颐和园外,家人等他吃饭久久不见人归。下午二时许,家人去学校询问。于是侯厚培到校门口问车夫们,得知载王国维的那辆车去了颐和园,还没有返回。侯厚培立即骑上自行车,前往颐和园找人。此前,王国维的儿子贞明在校门口已打听到情况,赶去颐和园,并于中途遇上那个送他父亲去颐和园的车夫,此时车夫的车上坐着警察,他们正要去学校禀报。因为车夫在颐和园外等候王国维直至下午3点,听说园内有人投水,进园一看,死者正是他要等的那个人。等贞明到了颐和园,证实死者就是他父亲,这时已是下午4点了。

噩耗传到清华园,是日晚9时许,校长、教务长、研究院诸教授、助教及学生约30余人共乘两辆汽车赶到颐和园,其中有王国

维的好友陈寅恪教授和吴宓教授。但此时园门已闭，守兵不允进入，经过再三交涉，才准许校长曹云祥、教务长梅贻琦和守卫处的乌处长入内探视。次日，清华园教职员工、学生及王国维家属众多人又齐赴颐和园。这时王国维的遗体仍停放在鱼藻轩亭内，家人和验尸官从王国维的衣袋中寻出一封遗书，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最后落款时间和签名是："五月初二，父字。"遗书是王国维在死前一天就写下的，临行前装在自己的衣袋内。随后，人们将王国维遗体移送到园西北角门外旧内庭太监下处三间小屋中入殓。当天傍晚七时，王国维的灵柩被送到清华园南部的刚秉庙停灵。这一天到场送行的除王国维家属和清华研究院的学生外，还有清华的教授吴宓、陈寅恪、梅贻琦、陈达，北大的教授马衡，燕大的教授容庚以及梁漱溟等人。

王国维的自沉之举震惊了清华园，更震动了学术界，人们无不为失去这样一位卓有建树的国学大师而感到痛惜。王国维自尽的当日，梁启超已离开了清华，得到噩耗复又奔回清华，亲自参与其后事的料理，并为王国维抚恤金一事向学校、外交部力争。他对王国维之死悲叹至极，他对自己的女儿这样评价王国维说："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①] 当时的青年学者顾颉刚感慨地把王国维的死

①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1145 页。

和同年3月康有为的去世相比较,他说:康长素先生逝世,我淡然置之。我在学问上受他的影响不亚于静安先生,我既是佩服他,为什么对于他的死倒不觉得悲伤呢?因为他的学问只起了一个头,没有继续加工。所以学术界上的康有为,三十六岁就死了。"至于静安先生,确和康氏不同,他是一天比一天进步的。他的大贡献都在三十五岁以后,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一齐变了节,唯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成为中国学术界中唯一的重镇。今年他只有五十一岁,假如他能有康氏般的寿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现在他竟"中道而废",为学术界着想,他的死是一个极重大的损失,说不出代价的牺牲。[①] 梁启超和顾颉刚的话反映了学术界对王国维之死的深深遗憾。6月16日,在北京下斜街全浙会馆举行王国维悼祭大会,人们纷纷送上挽联,梁启超在挽联中特别推崇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尤其提到了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中所作出的突出成就,他写道:"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不仅奇字译鞮,创通龟契;一死明行已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拟鹓雏。"陈寅恪的挽联有着更深一层的感情:"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我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乾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吴宓则在挽联中表达了自己对王国维自沉的看法:"离宫犹

① 《悼王静安先生》,见《追忆王国维》第129页。

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这次悼祭会所收到的数百副哀挽词联尽诉了人们对王国维的悼念和惋惜之情。此外北京的《国学月报》、《国学论丛》以及天津《大公报》等各地报刊还先后刊出《王静安先生专号》、《王静安先生纪念号》、《王静安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等专辑，以示纪念。王国维的死在海外学术界也引起了震惊，日本学者在大阪市召开王国维先生追忆会，王国维的日本友人、学者纷纷到会追忆或著文写诗凭吊。1927 年日文杂志《艺文》(18 卷)的 8、9 两期全部用来追忆王国维的学术工作。法国学者伯希和也写有多篇文章，向读者介绍王国维的成就。他在《通报》第 26 期上撰文说：作为王国维的老朋友，我经常提到他的名字，并很多次引用他如此广博而丰富的成果，现代中国从未产生过走得这般前面又涉猎如此丰富的博学者。① 这一切都表明，王国维以他那巨大的学术成就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

上海作为王国维事业的起步之地，也是他长期生活的地方。这里有他的亲朋好友，也有他学术研究的同道，因此这里的人们也特别的关心他。在王国维自沉不久，由上海开明书店开办的《文学周报》随即出了《王国维先生追悼专号》，专号中的文章既有对王国维死因的探讨，也有对他在古文字学、戏曲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学

① 引自《追忆王国维》第 416 页。

术成就的评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是近代中国历史最久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在这年7月出的最新一期杂志上刊载了王国维的遗像以及他的《曲品跋》手迹,并且发表了清华研究院学生徐中舒的《王静安先生传》,以示纪念。

1927年8月14日,是王国维的安葬之日。家属遵遗命将其茔葬于清华东二里七间房茔地,墓地安置在稍高处的麦陇中,坟以水泥土造成,深六七尺,宽才三四尺,长约丈余,棺柩放置内,上覆石板,垒土成阜。墓葬完全是按照北方习俗进行的。为了追念王国维的学术业绩,清华大学还于1929年在校园内建起了王观堂先生纪念碑。纪念碑由梁思成设计,陈寅恪撰写碑文,林志君书写。1958年清华大学扩建校园,将王国维墓迁于福田公墓,原墓碑已不复存在。1988年秋,北京文物局出资重修"海宁王先生之墓"。

当人们在痛惜之余,心中仍有一个悬念未能解开,那就是王国维为什么要自杀?王国维死前没有作任何说明,死后仅仅留下一封遗书。就此,人们总想从遗书中寻找到自杀之谜的解答。王国维的遗书这样写道: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同,渠又不曾出故门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

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不至饿死也。[①]

遗书中并没有自杀之谜的明确答案，但文中开头的16个字却与王国维的死因有着直接关联。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两点信息：一、他的死与“世变”有关；二、从他在辛亥后的言行看，他如此看重君臣之义，看重所谓的气节，因此，“义无再辱”可以作为说明他殉清的重要依据。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王国维当时面临着的是什么样的世变。其实自1924年北京政变以后，北京的政局就一直不稳。在当时的北京政府中，国民军、奉军、皖系势力之间进行着尖锐复杂的明争暗斗。其他各路军阀，如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等人也没有停止过相互间的利用、倾轧和混战，即使同一派系的军阀内部也矛盾百出，大打出手。连连战火使百姓饱受人间之苦。在军阀纷争的京城，校园当然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这时在西北的国民军倾向于正在全国、尤其是在南方兴起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所以奉军、直军、直鲁军联合向国民军发动进攻，形势对国民军十分不利，为了阻止直鲁军用军舰运送部队和军械，国民军封锁了大沽口。为了援助奉军，日本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并以维护《辛丑条约》为由，将英美法意等国的军舰纠集于大沽口，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

① 《王国维文集》第3卷，第475页。

这种无理的侵略行径激怒了中国民众。3月18日,北京学生和爱国人士3万余人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反对八国通牒,但是他们遭到了段祺瑞政府的镇压,造成了近200人死伤的“三一八”惨案。此后,段祺瑞政府人心丧尽。4月,国民军包围了执政府,段祺瑞及皖系政客纷纷逃入东交民巷,段执政府从此垮台。随后,直奉军阀相勾结共同对付国民军,迫使国民军退出了北京。北洋军阀形成了直系的吴佩孚、孙传芳、冯玉祥、奉系的张作霖四大派对峙的局面。军阀之间的激烈交战,京城政局的多变,使得居住京畿区域的百姓、学人处在围城中,人心惶惶。“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京城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了,清华也未能幸免。吴宓曾在日记中记叙了当时的状况:“三月十九日,星期五,自是日起,以执政府门前枪杀学生惨案,放假,停课。二十八日起,复继放春假一星期,直至四月十二日始上课。在此假期中,校中多数学生互争。当局召集临时教职员大会,举出委员十人,宓亦在其中,应付此局。继有以近畿战事,设紧急委员会。又草拟对外宣言,表示对惨案之愤慨。又追悼韦生杰三。”[①](韦杰三为清华学校大学普通部学生,参加“三一八”请愿活动,被军警枪杀)吴宓的这则日记反映了时局对清华的影响。王国维虽然没有记录“三一八”这段时事,但是4月间,由于战事,京城交通受阻,电讯中断,王国维给罗振玉的信中

① 《吴宓日记》第3册,161页。

诉说在清华园“无日不闻炮声”，并不无忧虑地这样写道：“经月不通音问，在围城中沉闷无似，今日国军退出以后，京津交通想可次第恢复。……今日城门皆闭，城中与郊外电话亦不通，想明日可恢复原状矣。”[1] 话语间充满了对恢复安宁生活的期望。实际上清华园的学人大多如此作叹。吴宓在其日记上也记叙了和王国维一样的感受：“近日战事逼近京城，人心不安，炮声隆隆，重似飞机在空中抛掷炸弹。”“北京政变后，城门关闭数日。近郊多兵士满布。是日，奉军马队追击国民军，战于海甸之北，离本校甚近。逾一二日，海甸、成府等处，皆为奉军驻居，居民颇受兵扰害。于清华有关系之人家，皆移入校内居住云。”[2] 王国维正是在这“近日无日不闻炮声”的书房里，一面著书立说，一面心系时局，企盼着战乱尽快结束，“明日可恢复原状”。就在这时，中国的南方兴起了新的革命狂飙，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大的事变。

1926 年 7 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其目的是要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为民请命，为国除奸”。当时北伐军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先打吴佩孚，再打孙传芳，后打张作霖。北伐军的顺利推进和随之而起的两湖农民运动震撼了全国，同时也震动了清华园里的读书人。梁启超这时在给子女的信中就说：“时局变迁非常剧烈，

① 《王国维全集·书信》第 427 页 - 428 页。

② 《吴宓日记》第 3 册，第 164 - 165 页。

……北洋军阀确已到末日了。将此麻木不仁的状态打破,总是好的,但将来起的变症如何,现在真不敢说了。”[1] 他们无法确切地理解这些政治事变所具有的社会含义,所以也就无法了然它们最终将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从当时同在清华的梁启超、吴宓等人留下的文字来看,他们都心怀忐忑地注视着时局的变化。而对于王国维来说,有两件事使他感到深深的不安。一件是,这时社会上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王国维惟恐他的辫子在“北伐成功中惹事故”,更担心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会因此运动而受辱。另一件是,1926 年北伐军攻克长沙后,镇压了自命前清遗老的叶德辉和王葆心,引得许多清室遗老纷纷“逃难”。浙江又没收了章炳麟的家产。在王国维看来,叶、王、章等和他一样都是学者,北伐既能对付他们,以后对他也会如法炮制,因此他深感他们的命运很可能也就是自己的命运。

尤其是到了 1927 年,国内矛盾越来越复杂化,随着北京局势的日趋紧张,清华园内人心浮动,学者们都准备离开清华另作打算,并时有某某教授带着家眷去了美国等传闻。梁启超在 3 月 21 日写信告诉长女梁令娴:恐怕北京局势的变化会非常迅速,许多朋友都认为应该尽早离开,如果等到一旦局势有变之后,京津之间的交通将会断绝,到那时便欲走不能了。他说:“我现正在斟酌中。

①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1101 页。

本来拟在学校放暑假前作一结束，现在怕等不到那时了。”稍后的5月31日，梁启超在给女儿的另一封信中又说：“这两天北方局势骤变，昨今两日连接城里电话，催促急行。”他预备立即回天津租界的住所，甚至还作好了去日本的思想准备。[①] 吴宓的心情在这时也不轻松，他在4月7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与同事的一番谈话：“宓为《学衡》编者，人多知之。党军到京，宓身甚危，至少亦恐受辱。家中且虞为若辈之徒众捣毁伤害，故宜远避，勿居北京。当俟清华解散之时，即由奉天移家赴大连，而居大连以为作文售稿之事。或可在彼间组织学校等事。总之，北京必不可居，居之殊危。”[②] 日记中所提到的《学衡》创刊于1922年，只是一家带有保守倾向的杂志，与政治毫无关系。它提出的办刊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判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编辑这样的杂志在当时都要成为一种沉重的思想负担，那么王国维的思想负担当然就要更沉重一些了，因为人们都知道他曾是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此时王国维的心绪肯定是不安宁的，但并没有特别地表露出来。他曾与陈寅恪一起去吴宓家中商谈避难事，吴宓要他暑期去日本，陈寅恪劝他把家迁到北京城里，不要出城。王国维却不愿走。6月1日，梁启超终因“北方局势骤

①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120页、第1137页。

② 《吴宓日记》第3册，第328页。

变”,匆匆辞去清华教授一职去了天津。这对王国维来说又是一个不小的刺激。梁启超临行前,在学生为他设的饯行宴上,梁启超仍慷慨陈词,抨击时弊。王国维一如既往,默默无语。事后学生戴家祥认为,实际大家都深知王国维内心很难受,他同情梁启超的遭遇,厌恶战事。他和梁启超一样,认为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比袁世凯、张作霖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学者文人只能在权力和指挥棒下苟延残喘。此外他还担心另一件事,恐一旦战火烧到北京,他的藏书怎么办? 可见世变对他的影响的确很大。

至于王国维遗书中的“义无再辱”四字,让人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他那种浓厚的殉清情结,辛亥以后他悲叹没能够出现为清王朝尽忠尽节的人;当张勋在复辟事败后,声称志在必死,他赞叹不已;北京政变将溥仪赶出故宫,他又试图自杀殉节。直至在清华任教期间,王国维仍然惦念着溥仪。1926 年秋天,他专程赴天津看望溥仪,当他来到溥仪居住的张园,看到园中一片衰败的景象,看到再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去关怀溥仪的安危冷暖了,这使他悲愤至极。回到北京后,王国维因忧伤过度,导致患上了咳血之症。这时距他自杀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从他的这一系列言行看,即使溥仪已没有了皇帝的名号,王国维仍然把他当皇帝看,仍然恪守着君臣之义。由此,他在面对新的世变冲击之下,说出“义无再辱”,其含义就决不是不可捉摸的了。1924 年,他在南书房行走任上,伴着溥仪一同被迫出宫,这被他认作是第一次受辱。在他赴死之前,北

伐军已临近京津地区，王国维以为他与溥仪会再一次地受到伤害，因此他不愿再看到第二次受辱，而自杀殉节。这样的分析是符合他思想的逻辑发展的。1927年9月20日，清华国学院师生在王国维墓前举行悼念仪式，梁启超在讲话中没有明说王国维的自杀是殉清，但他引用了孔子的话："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欤！"并说："伯夷、叔齐的志气，就是王静安的志气。"这意思也是十分明确的。其中提到的伯夷、叔齐是一对兄弟，生于商朝末年，为当时的贵族子弟，因不愿继承父业，一同投奔周文王。以后周武王继位，率领军队讨伐商纣王，伯夷兄弟不愿看到故国遭受战争的蹂躏，前去劝谏，但没有奏效。商王朝被推翻以后，伯夷、叔齐愤而隐居首阳山，拒绝吃周朝的粮食，最终死去。此后历代遗老把他们视为忠节的典范来效仿。民国初年，不少清朝遗老也都以"不食民国之禄"来相标榜，尽管王国维没有如此去申言，但终究没能摆脱伯夷、叔齐式的思维方式，也没有摆脱殉节的结局。

当王国维的死讯传到天津，同为清朝遗老的罗振玉在向溥仪转达这一消息的同时，还送上了一份伪造的王国维临终奏折，文中向溥仪大表忠心，以示殉清之志。当时溥仪看了这份所谓的奏折，大受感动，经与身边的师傅们商议，发了一道"上谕"，赐给王国维谥号"忠悫"，以示加恩，并赏银2000元。一时间这成了王国维殉清的有力佐证。那么罗振玉为什么要如此做呢？原来在王国维生前他们之间已产生了不和，两人多年的友谊也因此而中断。罗振

玉想以此来表示自己的歉意,他后来对人谈起此事,说他当时在处理两人关系上不免有些粗暴,对不起王国维,“但死者不能复生,只好为他弄个谥法。遗折是我替他做的”。[①] 然而,尽管这个临终奏折是假的,却并不能改变王国维死因中的殉清之意。这是当时人们比较普遍的看法。

王国维自沉后,关于他的死因,人们众说纷纭,殉文化说就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一种。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将王国维之死提到了坚持文化气节的高度。他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②] 陈寅恪的这番言语十分精辟,点中了王国维精神上的痛楚。王国维晚年回避谈论自己曾治过西学,并且在1924年给溥仪的那封上书中所显现出对传统文化的眷恋都体现了这一点。然而,造成这种痛楚的原因并不单是由于传统文化日益衰败造成的,还在于清王朝的瓦解,这两者在王国维那里是密切相关的。其实,处在欧风美雨铺

① 《追忆王国维》第552页。但在这段话之前,罗振玉却说:王国维“最后觉得对我不起,欲以一死报知己。”此话显然是不确实的。

② 引自《吴宓与陈寅恪》第53-54页。

天盖地的历史条件下，固有文化的天地越来越小，心仪于此的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把残存的朝廷看作是传统、传统文化的象征，把它当作一种精神依托。因此，在王国维死因的问题上，是很难把殉清与殉文化这两者截然分开的。

除了世变对王国维自沉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之外，他的家庭乃至个人因素都是不容忽视的。就在王国维辞世的前一年，他经历了家庭的重大变故，长子潜明先他而去，使他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王潜明生于 1899 年，为王国维第一位夫人莫氏所生，深得王国维的厚爱。从潜明的就学、工作和成婚，父亲都一一操心，关爱备至，这是其他儿女无法与之相比的。1919 年，王国维在上海为王潜明娶妻成婚，儿媳是罗振玉的三女儿罗孝纯。罗孝纯的父亲罗振玉是王国维学术生活中的良师益友，王国维对他特别敬重。这一结亲，使王国维与罗振玉由朋友成了儿女亲家，相互间原本就很好的关系更加亲密起来。因此，王国维特别看重这件婚事，更加器重长子。同年 10 月，潜明通过考试，获得了在海关工作的职位，王国维由衷地为儿子感到高兴。因为在海关工作会有很好的经济收入，生活有保障。特别是，这次考试的竞争性很强，报考者有二三百人，实际录取仅为 12 人。王潜明靠自己的努力取得了成功，这当然使为父的喜形于色。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信中几次提及此事，并充满希望地说："此儿心地非不灵敏，而执一亦甚，惟于事物尚能努力……此次得一职业，使身有所归来，甚为幸事。但愿此后

循分而进,则一生幸福较我辈为多矣。"可事与愿违,当他于1923年离开上海赴北京后的第四年,即1926年9月,从上海传来潜明病重垂危的消息。王国维闻讯后,心急如焚,匆匆乘车南下。当他满怀焦虑地赶到爱子病榻前时,潜明已无药可救,只能等待着死亡的降临。9月26日,潜明在上海的寓所病逝,年仅28岁。爱子走了,给王国维留下了深深的痛苦。

在王国维还沉浸于丧子的哀痛之际,王罗两家之间出现了矛盾,这不啻雪上加霜。这一矛盾不知是怎么开始的,只是知道在潜明的丧事料理完后,罗振玉竟不与王家商量就带着女儿回了天津。此事使得王国维心中十分不快,他生气地说:"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10月中旬,王国维由上海回北京,途经天津,他没有像以往那样前去拜见罗振玉。回到北京以后,他给罗振玉去信说:潜明对我来说是儿子,对你而言是女婿。哀悼死者,使生者安宁,作为父母,我们的心思是彼此相同的。不料其间产生了误会,但是时间久了这一误会会自行消解的。可实际上,误会并没有像王国维所说的那样,随着时日的推移而消解,相反,他们的关系越来越糟。从王国维给罗振玉的信中所反映的内容来看,主要是在如何处置潜明遗款的问题上,王罗两人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潜明死后留有存款2423元洋银、薪水143元、海关款228元5角、其妻孝纯变卖首饰款206元5角,共计3000余元。王国维认为此款项当归属儿媳,因此请罗振玉代为女儿孝纯经理,或"全权处理"。王国维恳切

地向罗振玉表明心迹:对于钱款,“因维于此等事向不熟悉,且京师亦非善地,须置之较妥之地,亡男在地下当为感激也”。王国维认为孝纯既为王家之媳,即便儿子已不在人世,王家也应承担儿媳的生活费用,若不然,则是有损王家面子的事。他不但汇上如数款项,对其他后事也思虑细微,如孝纯北上回津的旅费和生活零用钱,他也表示“数月后再当奉还”或“亦请暂垫”。并一再对罗振玉解释:“维负债无几,今年与明年间当可全楚也。”表示有支付经济的能力,但这一缓解两家不快和聊以自慰的安排,却更生出令王国维痛不欲生的芥蒂与矛盾。对王国维汇寄的钱款,孝纯声明不用一钱,并要奉还王家。对此王国维似乎焦虑地难以作为,为劝罗氏父女,他甚至连着发信,晓之以理:“试问亡男之款不归令嫒,又当归谁?”“我辈皆老,而令嫒来日方长,正须储此款以作预备。”对王国维的良苦用心,罗氏父女却坚拒不让。王国维感到这已不是一般的谦让,他说:“即便是和舅姑间有所不满,也不见得不满于天理。为何将遗款如此拒绝。”① 并认为这是轻视他故意所为。他指责罗振玉:如再退让,则是让其所不当让,是蔑视他人人格,而蔑视他人人格,也有损于自己的人格。这边王国维感到受了污辱,那边罗振玉仍坚持不收这笔钱,并找借口将钱款寄回,如此往复数趟,两人几十年的友谊毁于一旦。两家十分密切的关系为什么会

① 以上均见《王国维全集·书信》。

在这些家庭琐事上变得如此紧张,这其中的矛盾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在王国维所留下的信件中对此没有作任何说明,据罗振玉的外孙刘蕙孙说,这其中的原因关键在王国维的夫人潘氏,因为她拿了潜明的抚恤金,不给媳妇罗孝纯,这激怒了罗振玉,从而迁怒到王国维,认为王没有管住老婆。王国维一时又说服不了妻子,后来只得回家乡将为数不多的田产卖掉,凑足钱数寄还给罗振玉,但罗不接受,于是两家便不和了。[①]

对于罗王的不和,还出现了不同的说法,并认为正是这种不和导致了王国维的自杀。郭沫若在他的《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说:"罗在天津开书店,王氏之子参与其事,大折其本,罗氏大不满于王,王之媳乃罗之女,竟而大归。这很伤了王国维的情谊,所以逼得他竟走了自杀的路。"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中则叙述了另一种说法,他写道:"据说绍英曾托王国维替我卖一点字画,罗振玉知道了,从王手里要去了,说是他可以办。罗振玉卖完字画,把所得的款项(一千多元)作为王国维归还给他的债款,全部扣下。王国维向他索要,他反而算起旧账,还要王国维补给不足之数。王国维气愤已极,对绍英的催促无法答复,因此跳水自尽。"这两种讲法显然都不符合事实,后一则讲法更带有一种对罗振玉的不满。其中说,王国维完全是为了这种不和而死也同样是言过其实的。其实,

① 《追忆王国维》第515页。

最能说明问题的当然是这一时期罗振玉给王国维的信了。罗在信中说:"弟颇素为知礼,至海关恤款,迟早皆可取出,而公急于领款。小女亦遂仰体尊意,脱丧服而至海关,而复申明绝不用此钱,其存心亦未为不当。惟弟则觉死者尸骨未寒,此款迟早均可往取,何必亟亟轻礼重财是诚有言。此事乃弟与公绝对所见不合处。"[①] 这些文字至少表明他们在处理遗款问题上有着十分不同的意见,而由此导致最终关系的破裂,则其中所包含的因素要远比处理遗款复杂得多。两人的不和确实给王国维带来了很大的震动,因为两人之间数十年的友情曾是王国维最为珍视的。王国维深知,如果没有罗振玉的鼎力相助,他在学术上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成就。可以说,这种震动与失子之痛所造成的精神上的创伤对他最终作出逃避现实的决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王国维的自沉表明他对未来极度悲观,从中人们还可以看到他早年凸显的厌世和悲观主义思想的影子。他的死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王国维的一生,在学术生涯和现实生活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边是勇于突破陈规、探求新知的学术巨人;另一边他却将自己置身于传统社会卫道者的立场。这两方面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有些令人不可思议,然而这种现象又确确实实地存在于那个大

① 引自国学大师丛书·刘烜:《王国维评传》第265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变革的历史年代中。

作为一个与上海这个大都市有着密切关系的著名学者,王国维的学术思想不仅打上了近代上海文化的鲜明印记,而且他所作出的业绩对上海的学术界也有着积极的影响。在上海,尤其是从事上古史研究和古文字研究的后辈学者都从他那里得到了启发,获得了帮助。杨宽,1936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后历任光华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教授,是国内著名的先秦史专家。自50年代起,他相继发表了《战国史》、《中国土法冶铁炼钢技术发展简史》、《古史新探》、《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等多部专著。在这一系列著作中,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当然王国维对杨宽的学术影响绝非始自50年代。早在杨宽的青年时代,王国维就已成了他学术研究之路上的楷模。这从杨宽于大学毕业之后不久完成的《中国历代尺度考》一书中体现出来,此书出版于1938年。在这本篇幅不大的书里,杨宽有十多处引用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并将其作为定论,而且还有大段的引文。其中他尤为推崇王国维对我国历史上尺度变异原因的论述。王国维通过深入的研究后认为:自魏晋以来,由于官府以绢布课税,官吏一方面害怕短缺损耗,另一方面又试图榨取于民,因此尺度由短变长,代有增益,“北朝尤甚”。自金元两朝以后,由于不用绢布课税,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尺度没有什么变化,仍按唐宋时期的旧制。杨宽在

书中说，王国维的研究“至为详尽”，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唐宋以后尺度之所以变化不大，是因为唐宋以后，课税可以折价，因此贪官不必通过增长尺度来盘剥百姓，只要提高折价就行了。从中，我们是可以清楚看到王国维对杨宽在学术上的重要影响。解放后来到上海，后来任上海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李亚农，他的研究方向同样是先秦史，并对甲骨文多有研究，他也从王国维那里得到了学术上的启示。他的力作《欣然斋史论集》就参考了王国维的《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李亚农在《论集》的总序中曾对王国维作了这样的评价：“在这位终身不肯剪掉辫子，以致苦闷得投水而死的王忠悫公的思想中虽然还羼杂着封建的成分，但他所采取的研究方法的确是近代的，因而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番话尽管写于60年代，然而今天看来，其持论仍然比较公允。与王国维关系最密切的当然是曾为清华国学院学生，后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的戴家祥。在清华学习期间，他跟从王国维学习，专修经学、金石学，他的专题研究题目是“卜辞金文之研究”。在此期间，经过王国维的悉心指教，戴家祥不仅在专业学识上有了很大提高，而且也养成了如同老师所具有的那种实事求是、朴实无华的学风。特别是戴家祥在他接近90高龄之际，出版了他主编的《金文大字典》，此书是他与同事经历了十几个寒暑的艰苦努力才最终完成的。书中共收可释金文单字2661个，包括金文拓片原件影印的字头数10万枚。它不仅内容全，而且在编纂的体例和方法上都超越了同类书籍，是

一部十分完备的金文字典。此书为相关的历史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和古气象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工具,同时也为古文字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些学者的研究工作有力地推动了上海学术事业的发展,而从中也可见到王国维的影子。

王国维是一个大学者,后人对他最好的纪念,就是将他的学术思想发扬光大。

[附]

王国维生平简表

1877年

12月3日生于浙江海宁州城内的双仁巷。初名国桢，后改名国维，字静庵(安)，又字伯隅，号礼堂，晚年更号为观堂，又号永观。

1880年　4岁

10月，母亲凌氏病逝，由祖姑母范氏及叔祖母抚养。

1883年　7岁

入私塾读书，受教于潘紫贵先生。

1887年　11岁

跟从陈寿田读书，除常规的学习内容外，每月还规定学习若干

骈散文和古今体诗,是其学作诗文的开始。

1892 年　16 岁

6 月,考中秀才,进入州学深造,已初露才华。常与叶宜春、褚嘉猷、陈首谦等 3 人一起读书论学,被称为“海宁四才子”。这年偶见友人读《汉书》,十分喜爱,便用从幼时储存下来的钱买来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阅读,“是为平生读书之始”。

1893 年　17 岁

8 月,赴杭州应乡试。因无意于科举功名,不终场而归。

1896 年　20 岁

在城内任塾师。关心时事,经常阅读《时务报》,并带给父亲看。

11 月,与莫氏成婚。

1897 年　21 岁

9 月,再次赴杭州乡试,未能考中。最终弃科举而不就。

1898 年　22 岁

2 月,入上海《时务报》馆工作,任书记、校对之职。稍后,一边在报社工作,一边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6 月,因脚气病

严重，回海宁疗养。11月，当足疾痊愈返沪时，《时务报》已被清廷取缔，一时工作无着。经罗振玉安排，仍在东文学社学习，兼管理东文学社庶务。并帮助罗振玉编辑《农学报》，专力翻译日文。

1899年　23岁

在东文学社继续学习，课程除日语外，还有英语及数理化。在日本教员的影响下，萌发研读康德、叔本华哲学之念。

1900年　24岁

因八国联军侵华，形势激变，提前从东文学社毕业。6月，翻译《势力不灭论》（德人赫尔姆霍茨所著的英译本），刊于《科学丛书》第2辑，此为翻译西书的最初尝试。

1901年　25岁

在上海协助罗振玉译编《教育世界》，由于该杂志信息量大，内容不限于教育，还有哲学、文学等多方面的撰述，逐渐为学界所重视。同时《教育世界》也成为其早年发表文字的重要园地。

1902年　26岁

2月，赴日本留学。在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期间颇以学习几何学为苦。数月后因脚气病复发，于当年夏天归国。

1903年　27岁

3月，至南通通州师范学校任教。教学之余，开始攻读康德、叔本华哲学。作有《叔本华像赞》、《汗德像赞》，对二人哲学推崇有加。所写论文有《哲学辨惑》、《论教育之宗旨》等，其中《哲学辨惑》为其第一篇哲学专论。

1904年　28岁

在《教育世界》上相继发表《孔子之美育主义》、《论性》、《释礼》、《红楼梦评论》等十数篇论文。其中《红楼梦评论》一文是作者的第一篇文学批评著作，也是中国近代《红楼梦》研究的第一部系统之作。文中反映了叔本华哲学对作者的浓重影响，同时作者也指出了叔本华哲学的欠缺与不足。

12月，赴苏州，任教于江苏师范学堂。

1905年　29岁

发表《论近年之学术界》、《论平凡之教育主义》、《论新学语之输入》等专论。由于数年来发表的有关哲学、美学、文学、教育学的著述新见迭出，在沪上学界崭露头角。

9月，汇集1904年以来在《教育世界》上刊载的12篇文章，以及数年来所作古今体诗50首，重新刊印，名为《静安文集》。

1907 年　31 岁

春，随罗振玉前往北京，任学部图书馆编辑。

著有《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等论文，治学方向由哲学转向文学。编有《人间词乙稿》，与上年所编的《人间词甲稿》互为姊妹篇。

1908 年　32 岁

辑唐五代词 21 家词，编为 20 卷。并撰成《词录》。《人间词话》在《国粹学报》上连载。

1909 年　33 岁

在戏曲研究中颇有所得。撰定《曲录》，并相继完成了《戏曲考原》、《优语录》、《宋大曲考》、《录曲余谈》等著作。

1911 年　35 岁

2 月，作《国学丛刊序》强调学无新旧、学无中西、学无有用无用之分。

武昌起义发生之后，携家眷随罗振玉东渡，寄居日本京都。

1913 年　37 岁

2 月，完成《宋元戏曲考》，并由上海《东方杂志》连载，名《宋元

戏剧史》。

另著有《明堂寝庙通考》、《释币》、《秦郡考》、《汉郡考》,并编成《齐鲁封泥集成》,治学方向由文学转向经史考据。

1914年　38岁

与罗振玉合作,考释汉晋木简,完成《流沙坠简》。

1916年　40岁

2月,由日本京都返回上海,在哈同花园编辑《学术丛编》。写有《毛公鼎考释》、《史籀篇疏证》、《魏石经考》等著作。

1917年　41岁

相继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等重要论文,在学术界引起轰动。

1918年　42岁

新学年开学,任仓圣明智大学经学教授。

1922年　46岁

8月,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

考研资料：数学、英语、政治、管综、西综、法硕等（整合各大机构）
英语类：四六级万词班专四专八雅思等
财经类：初级会计、中级会计、注册会计、高级会计、税务师、会计实操、证券从业、基金从业、资产评估、初级审
公务员：国考、省考、事业单位、军队文职、三支一扶微信 2270291360
银行：银行招聘、笔试、面试
教师资格：小学、中学、教师招聘面试
建筑：一建、二建、消防、造价
法考：主观题、客观题
多平台网课：涵盖职场、办公技能、编程、文案写作、情感心理、穿搭技巧、理财投资健身减肥摄影技术等优质内容
精选资料：Excel 教程、PPT 模板、简历模板、PS 教程、PPT 教程、素描、烹饪、小语种、CAD 教程、PR 教程、UI 课程、自媒体、写作、计算机二级、钢琴、Python、书法、吉他、kindle 电子书、演讲.....持续更新中...
押题：提供考前冲刺押题（初级会计、中级会计、注册会计、一建、二建、教资、四六级、证券、基金、期货等等），麻麻再也不用担心我考不过了。
资料领取微信：1131084518
行业报告：20000 份+持续更新

英语四六级备考资料	计算机二级备考资料	150 所高校考研专业课资料
两小时搞定毛概马原思修近代史纲	高数(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	素描 0 基础入门教程
教师资格证全套备考资料	普通话考试资料礼包	书法教程微信 2270291360
大学生英语竞赛备考资料	大学生数学竞赛备考资料	1000 份各行业营销策划方案合集
挑战杯/创青春/互联网+竞赛资料	电子设计竞赛必备资料	街舞 0 基础入门教程
托福雅思备考资料	大学物理学科攻略合集	动漫自学教程
SCI 最全写作攻略	TEM4/TEM8 专四专八备考资料	教师资格证面试试讲万能模板
360 份精美简历模板	数学建模 0 基础从入门到精通	100 套快闪 PPT 模板
Vlog 制作最全攻略	超强 PR 模板	42 套卡通风 PPT 模板
PS 零基础教程微信 1131084518	PS 高级技能教程	63 套酷炫科技 PPT 模板
好用到极致的 PPT 素材	128 套中国风 PPT 模板	32 套 MBE 风格 PPT 模板
327 套水彩风 PPT 模板	295 套手绘风 PPT 模板	54 套毕业答辩专属 PPT
196 套日系和风 PPT 模板	82 套文艺清新 PPT 模板	57 套思维导图 PPT 模板
163 套学术答辩 PPT 模板	53 套北欧风 PPT 模板	34 套温暖治愈系 PPT 模板
118 套国潮风 PPT 模板	30 套仙系古风 PPT	126 套黑板风 PPT 模板
114 套星空风格 PPT 模板	192 套欧美商务风 PPT 模板	42 套绚丽晕染风 PPT
50 套精美 INS 风 PPT 模板	56 套水墨风 PPT 模板	137 套清爽夏日风 PPT 模板
98 套森系 PPT 模板	25 套简约通用 PPT 模板	记忆力训练教程
300 套教学说课 PPT 模板	123 套医学护理 PPT 模板	AE 动态模板微信 2270291360
毕业论文资料礼包	教师资格证重点笔记+易错题集	表情包制作教程
吉他自学教程（送 6000 谱）	钢琴自学教程（送 1000 谱）	区块链从入门到精通资料
2000 部 TED 演讲视频合集	Excel 从入门到精通自学教程	单片机教程
230 套可视化 Excel 模板	1000 款 PR 预设+音效	1000 份实习报告模板
手绘自学教程微信 1131084518	单反从入门到精通教程	人力资源管理师备考资料
英语口语自学攻略	粤语 0 基础从入门到精通教程	证券从业资格证备考资料
日语自学教程	韩语自学教程	PHP 从入门到精通教程
法语学习资料	西班牙语学习资料	炒股+投资理财从入门到精通教程
全国翻译专业资格考试备考资料	BEC 初级+中级+高级全套备考资料	大数据学习资料
SPSS 自学必备教程	Origin 自学必备教程	会计实操资料
LaTeX 全套教程+模板	EndNote 教程+模板	小提琴 0 基础入门自学教程
GRE 超全备考资料	200 份医学习题合集	司考备考资料

思维导图教程＋素材	20000 份行业研究报告	一级造价工程师备考资料

上万 GB 教学资料（均全套,非杂乱）免费领取微信 1131084518

《闪电式百万富翁》实战版+升级版

易经+道德经+易学名师全集+风水学+算命学+起名+++等等（全套 1000 多 GB）

心理学+NLP 教练技术+精神分析+亲子家庭教育+催眠+++等等（更新超 2000GB）

大学-已更新至 9333 个课程+高中+初中+小学-全套资料（超过 2 万 GB）

陈安之	曾仕强	马云	杜云生	翟鸿燊	刘一秒	俞凌雄
王健林	余世维	雷军	周文强	安东尼罗宾	董明珠	李嘉诚
徐鹤宁	冯晓强	李践	刘克亚	罗伯特清崎	戴志强	李伟贤
苏引华	史玉柱	李强	俞敏洪	杰亚伯拉罕	周鸿祎	唐骏
梁凯恩	陈永亮	傅佩荣	贾长松	易发久	李彦宏	湖畔大学
李开复	聂枭	悟空道场	魏星	姬剑晶	其他名师全集	其他资料下载
王兴	王智华	智多星	陈文强	周导		微信 2270291360
泡妞	撩汉	泡仔	房中术	性福课	驻容术	泡妞撩汉性福合集

注：太多了，无法全部一一列出。。。

全套专题系列【微信 1131084518】

记忆力训练	形象礼仪	健康养生	企业管理	沟通技巧
演讲与口才	经理修炼	MBA 讲座	时间管理	战略经营
企业文化	销售心理	管理素质	国学讲座	执行力
团队管理	领导艺术	员工激励	潜能激发	谈判技巧
绩效管理	薪酬管理	43 份直销制度	电话销售	人力管理
客户服务	创业指南	市场营销	餐饮管理	保险讲座
品牌营销	酒店管理	汽车 4S 店	众筹资料	销售技巧

兴趣爱好：	钓鱼教程	魔术教学	炒股教学	美术教学	书法教学	
音乐乐器：	萨克斯教学	电子琴教学	小提琴	古筝教学	钢琴教学	
	吉他教学					
体育运动：	篮球教学	足球教学	羽毛球教学	乒乓球教学	太极拳教学	
	围棋教学	高尔夫球				
生活实用：	插花教学	茶艺-茶道	唱歌教学	单反相机摄影	毛线编织	
	小吃+美食					暗号：666
语言学习：	英语					免费领取资料微信
电脑 IT：	办公 office	PS 美工教学				1131084518

微信1131084518
撩汉liaohan.net
最好资源zuihaoziyuan.com



1923 年　47 岁

3 月,学术文集《观堂集林》在沪印行。

4 月,受逊帝溥仪之命,充南书房行走,6 月抵京。

1924 年　48 岁

四五月间,上书逊帝溥仪,认为,西学给中国带来了危害。

11 月,逊帝溥仪被冯玉祥的军队赶出故宫,因有"君辱臣死"之想,欲自沉神武门御河,被家人拦阻。

1925 年　49 岁

2 月,决定接受清华国学院之聘,担任该院教授。4 月,携全家迁居清华园。暑假期间,应清华学生会之请,作《近三十年中国学问上之发见》,论说中国学术的 5 大发见。9 月,国学院正式开学,每周讲授《古史新证》一小时,《尚书》二小时,《说文》一小时。在《古史新证》课中,明确提出著名的"两重证据法"。

1927 年　51 岁

6 月 1 日,清华研究院第二期学生毕业。次日,6 月 2 日早晨,去研究院料理完公事,随后乘人力车赴颐和园,约 11 时,在鱼藻轩处自沉昆明湖。随身留有遗书,其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